

## 兩宋社會菁英家庭婦女佛教信仰之 再思考 (上篇)\*

黃啟江

Hobart and William Smith College 亞洲語言文化系教授

### 摘要

長期以來，中國婦女佛教信仰課題一直未受注意，近十餘年來，學者開始撰文討論，頗能凸顯其重要性。本文是筆者討論兩宋菁英家庭婦女佛教信仰之上篇。在此文中，筆者先討論伊沛霞 (Patricia Ebrey) 在其暢銷書《深閨之內：宋代婦女的婚姻與生活》中的〈虔信之妻〉一節，希望澄清及修正伊沛霞之某些觀點。

由於伊沛霞的〈虔信之妻〉一節，可代表討論宋代婦女佛教信仰生活的先驅之作，其觀點雖然簡略，但已塑造了宋代菁英家庭婦女及其修行佛教之形象。在檢驗伊沛霞之觀點後，筆者發現她的立論過程有不少因誤讀原文及史料運用上不平衡所造成之缺失。故本篇先討論她隨意列舉之 20 位婦女之「佛教生活」，指出其例證之不足，並詳述她們修行佛教之原由及方式。筆者接著於伊沛霞所舉之 14 位北宋婦女信佛事例外，增補了 109 位婦女信佛事例以補充其不足，說明北宋中、上層社會婦女，在不同家庭婚姻之背景下，所作之不同及多樣之佛教修行。並檢視婦女母家及夫家之宗教性向，並以之為脈絡，查考其佛教修行取向，此皆為討論婦女之婚姻及宗教生活之〈虔信之妻〉一節所忽略。在討論伊沛霞之觀點後，本文並以大乘菩薩理想之「六度」或「六波羅蜜」中之「五波羅蜜」為析論架構，詳述婦女虔信程度之高下及修行之多樣性。分析之結果，除「忍辱」一項因同為儒家及道教信仰者共修之德行而不論

---

\* 收稿日期：2007.10.29，通過審查日期：2008.03.19。

外，123 位北宋婦女在其他波羅蜜之修行情況，大致可得以下百分比：布施 12%、持戒 18%、精進 84%、禪定 6%、智慧 22%。雖然此數據未必可精確地表示多樣多彩的北宋婦女佛教生活，但仍可顯示其修行層次深淺高低之不同。此外，本文豐富之例證，可進一步確證北宋婦女在戮力操持繁重家務之情況下，實享有相當程度之宗教自主權。

## 【目次】

- 一、引言
- 二、「虔信之妻」一節評析
  - (一) 賴佛法之助「相夫教子」
  - (二) 自由進出佛寺會聚讀經
  - (三) 自稱創教者以招募信徒
  - (四) 篤信佛教而轉趨內向
  - (五) 處大家庭者尤易信佛
  - (六) 信佛強化賢內助角色
  - (七) 夫婦偶或同時崇佛
  - (八) 夫戒妻勿再信佛
  - (九) 中、晚年悉心嚮佛
  - (十) 隨僧尼與女眷學佛
- 三、北宋婦女佛教信仰與修行
  - (一) 布施波羅蜜
  - (二) 持戒波羅蜜
  - (三) 精進波羅蜜
  - (四) 禪定波羅蜜
  - (五) 智慧波羅蜜
- 四、餘論

**關鍵詞：**宋代婦女、佛教信仰與修行、佛教生活、菩薩理想、宗教自主權

## 一、引言

近十餘年來，中國婦女之宗教信仰，漸受西方「中國研究」學者所注意。各大學之「婦女研究」或「性別／兩性研究」課程，往往設有「中國婦女」或類似科目，而中國婦女的宗教信仰也常為此類科目之一重要主題。自從1993年西雅圖華盛頓大學的伊沛霞（Patricia Ebrey）教授出版其《閨門之內》（*The Inner Quarters*）一書，專闢一節談宋代婦女的宗教信仰後，<sup>1</sup> 同一研究領域的學者也隨後跟進，出版類似著作，兼談婦女之宗教信仰。譬如，哥倫比亞大學巴納學院高彥頤（Dorothy Ko）教授在1994年出版《閨門之師》（*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s*）一書；<sup>2</sup> 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曼素恩（Susan Mann）教授在1997出版的《閨門寶錄》（*Precious Records*）一書，皆是其例。<sup>3</sup> 兩書除就性別問題探討中國明清、社會及文化史外，並大量探討婦

<sup>1</sup> Patricia Ebrey, *The Inner Quarters: Marriage and the Lives of Chinese Women in the Sung Period*. 伊沛霞是西方研究明清以前中國婦女史較早的幾位學者之一，而研究明清婦女史的學者以傅樂詩（Charlotte Furth）及曼素恩（Susan Mann）為較早。前者研究婦女與醫藥，後者研究婦女、家庭與兩性關係。《閨門之內》獲1996年美國亞洲學會的 Joseph Levenson 獎，而作者伊沛霞被認為是傑出的中國社會、文化及家庭史之史學家。其書相當暢銷，有不少美國大學的中國歷史或婦女課都用為教材，最近更被譯成中文，流傳於兩岸三地學府。目前中譯本以「內闈」為名，筆者認為不妥。蓋「闈」通常為「宮中之門」，故有「宮闈」之稱，如唐代宮中之「東、西掖門」；或指宮內后妃所住之內殿，與一般婦女之閨房不同。又「內闈」一詞，古人甚少使用，偶一用之，亦有貶意。譬如，宋仁宗時，監察御史裏行孫沔曾在其〈上仁宗乞每旦親政振舉綱目〉說：「伏惟陛下，纂紹寶圖，務敦淵靜，韜晦英謀，竭伸孝愛。而內闈輔政，朝制弗經，宦寺弄權，海宇側目，女謁交馳，大道不行。」其所謂「內闈輔政」，即指章獻劉太后之「垂簾決事」及保慶楊太后之「與皇帝同議軍國事」。孫沔奏書見趙汝愚，《宋名臣奏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20，頁5a-9b。

<sup>2</sup> Dorothy Ko, *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s Women and Culture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最近她更出版了 *Cinderella's Sisters: A Revisionist History of Footbinding*，可譯為《灰姑娘之姊妹》。其書對婦女纏足之歷史提出「修正」的看法。

<sup>3</sup> Susan Mann, *Precious Records: Women in China's Long Eighteenth Century*.

女在歷史上扮演的所謂「經紀人」(agent)之角色、所遇之束縛與機會、及婦女之宗教信仰與生活。<sup>4</sup> 這種對人生信仰與生活之注意及討論，擺脫歷史研究的侷限性，提醒史家從人性(humanity)的基本層面去了解過去社會被忽略之若干現象，有助於我們對歷史有更深一層之認識。1999年出版的《宋代佛教》一文集，含兩篇涉及宋代女禪師的文章，未嘗不是這種新研究趨勢的具體表現。<sup>5</sup>

雖然《閨門之內》的「虔信之妻」(Pious Wives)一節是為討論宋代婦女的宗教信仰而寫，但其所涉及者，多為婦女的佛教信仰，從宋代佛教史的角度來看，有不少問題值得商榷，所以我覺得本文在討論兩宋社會菁英家庭婦女之佛教信仰前，有先析論其內容及觀點的必要。<sup>6</sup>

基本上，伊沛霞根據其對宋代婦女之一貫認識，先在「虔信之妻」之前各節討論宋代菁英家庭婦女的教育背景，說明其識字、讀書能力的提高，及其所讀之各類書籍。她強調這些婦女除了《女戒》、《蒙求》、《女孝經》、《詩經》、

---

<sup>4</sup> Dorothy Ko 之著作就有透過了解婦女之經驗及兩性關係對歷史重新思考的欲圖，而其觀點也似在中國歷史研究中不斷發酵。見 Jinhua Emma Te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Women' in the Western Academy: A Critical Review," pp. 115-151, 尤其是其最後一節對未來中國婦女研究方向之思考, pp. 141-145。

<sup>5</sup> 見 Peter Gregory et. al., "Images of Women in Ch'an Buddhist Literature of the Sung Period" 及 "Miao-tao and Her Teacher Ta-hui," *Buddhism in the Sung*, pp. 148-187, 188-219。

<sup>6</sup> 伊沛霞以「婦女為經紀人」(woman-as-agent)一觀點為討論婦女地位之基礎，導致不少難以自圓其說之論點，恐非值得效法之徑路。高彥頤就不甚同意用此觀點，而提出婦女所遇之「束縛與機會範圍」(range of constraints and opportunities)之討論，但過份仰賴西方性別理論及婦女主義理論之歷史解釋，也引起「以今視昔」的「時代錯置」(anachronistic)的質疑。見上引 Susan Mann 之文(頁 174)。關於伊沛霞書中所論的婦女與宗教問題，我所見過的較長篇之書評，幾乎都未置一詞。譬如，Robert Hymes (韓明士)在 "Review of *The Inner Quarters: Marriage and the Lives of Chinese Women in the Sung Period*," pp. 229-261 的長文，評論全書相當仔細，但對宗教一節，則無片言隻語，Susan Mann 及 Ann Waltner 之 "Recent Scholarship on Chinese Women," pp. 410-428 亦然。後者評數本有關女性之著作，而對伊沛霞之書則質疑她既認為「母子關係」為宋代家庭最重要之事，為何其書不專談婦女為人母角色，而仍環繞男性談婦女之婚姻問題，有自亂章法之嫌。

《書經》、《論語》及《孟子》等書外，還涉獵內典，誦讀佛書，對宗教表現了強烈之興趣，對佛教信仰尤其熱誠。她又認為，部份宋代婦女為佛教所吸引，也以佛教教義助其完成儒家思想裏賢妻良母相夫教子之任務。而佛教所宣揚之教理，吸引這些婦女，也是因為她們對今生之事不滿，而欲專心求來生之故。

由於伊沛霞所列舉之例證有限，而討論菁英家庭婦女時，並未詳述其身份與所處之時間，雖然能指出若干事實，但總令人覺得有流於表面而未能深入之缺憾。<sup>7</sup> 這當然是因為其書內容太廣，無法兼顧許多細節之故，另一方面也是由於她無此類專題研究可作依傍，而須自己作一聚沙成塔之考查之故。就此點而言其研究成果，可以說她還是有開創之功的。不過，宋代婦女之佛教信仰，若不從佛教史之角度來觀察，必會失之片面；尤其例證若有不足，結論更易失之誇大，有證據與結論不相稱之缺點。為了說明這種可能，筆者擬先討論伊沛霞的看法，先將她的觀點列成標題，說明其資料來源與運用，並視其論述之當否予以質疑、討論與修正。由於伊沛霞所使用之資料，基本上是兩宋社會菁英家庭或中、上層家庭士人對其同階層婦女行為之代言，而這種選擇實是因下層社會婦女之資料不易掌握之故，故本文之討論亦於菁英家庭婦女之佛教信仰為焦點。因篇幅所限，本文須分上、下兩篇撰寫。此外，由於無法獲睹伊沛霞所用各種史籍之同一版本，只能根據個人所能得見之版本立論。幸不同版本間之字義相差甚微，對本文之議題不致產生太大的影響。至於對史料解讀之不同，在所難免，凡遇此情況，本文將盡量做較周延之闡釋。

## 二、「虔信之妻」一節評析

兩宋代婦女受教育者較前朝為多，雖然無可靠數據為證，但以她們在家庭、社會的表現來看，因識字率大為增高，而能讀佛書，應該是不爭的事實。

<sup>7</sup> 高彥頤在前引書中（頁 7）說任何婦女與性別的歷史研究都應該顧及階層、地域和年歲等細節，個人覺得這是起碼條件，其他方面，如家庭環境、身份背景、婚姻對象等，都應考慮。伊沛霞之書的證據不足之處，是前引 Robert Hymes 長文中屢屢評議的。Susan Mann 則雖較含蓄地指證據不足為不尋常、偶犯之失（頁 167），但對某些觀點也直說很少證據（頁 174）。

如本文提出之例證顯示，許多官家婦女，不但熟習儒家詩書，而且涉獵佛老經典，故能引用孔孟、老莊或佛經之語。雖然如此，多半婦女只是能讀佛書，未必都有深悟。畢竟佛典語言與儒書不同，非假以時日，難知其義蘊。此外，有些佛典深奧，有些淺顯。有些卷帙浩繁，有些篇幅甚短，即使有能力閱讀佛典，她們所讀究竟是何經典？理解多少？又如何應用她們之所學於修行及任事？都是問題。再者，婦女之信佛，雖與個人之興趣有關，但也脫離不了與家庭環境、佛教普及與信佛風氣的影響。尤其宋代禪宗及淨土信仰最為流行，必也對婦女信佛之方式發生相當作用。她們是否依禪宗之教法學習禪定或淨土之教法修行淨業？不可不查。尤其，士大夫家庭固不乏信佛之婦女，但伊沛霞所舉之例證，因其論題之所限，難以凸顯信佛婦女的相當數量。另一方面，信佛之風氣雖影響及婦女趨向信佛，但不為「流俗」所動，深信儒學而抨擊佛教信仰之婦女，亦所在多有。且堅決不信者，人數可能更多，與伊沛霞之論點形成反證（antithesis）。更有進者，伊沛霞之書只重個別婦女信佛的事實或外在面相，並未注意到她們實踐其信仰背後的文化氛圍之內在脈絡或邏輯關聯。使我們在閱讀她對若干史料的譯釋時，覺得有不少疑義，而她的某些觀點也就需予澄清或進一步說明。

大致上，伊沛霞研究婦女之所得可以歸納成以下十點：

- （一）賴佛法之助「相夫教子」。
- （二）自由進出佛寺會聚讀經。
- （三）自稱創教者以招募信徒。
- （四）篤信佛教而轉趨內向。
- （五）處大家庭者尤易信佛。
- （六）信佛強化賢內助角色。
- （七）夫婦偶或同時崇佛。
- （八）夫戒妻勿再信佛。
- （九）中、晚年悉心嚮佛。
- （十）隨僧尼與女眷學佛。

這十點中，真正與佛教直接相關者有八，（二）與（三）兩項涉及其他宗教或民間信仰，但因與佛教不無關係，故一併討論。

## （一）賴佛法之助「相夫教子」

「虔信之妻」一節討論婦女與宗教，先指出宋代婦女不乏睿智之賢內助兼良師，她們以佛教教義來助其盡儒家相夫教子之義務。伊沛霞用李綱之岳母黃氏（1063-1121）為例，來說明此事，略謂黃氏嘗於其夫落職於地方時，勸其夫當藉此機會將其所學付諸行事。由於其夫個性剛直，黃氏勸他當知柔軟變通，而且引用佛教「善巧方便」之說為解云云。伊沛霞所根據的資料是南宋李綱（1083-1140）的《梁溪集》裏〈宋故龍圖張公夫人黃氏墓誌銘〉中的這段文字：

龍圖公性剛直，遇事無所顧避，夫人每戒之曰：「釋氏六波羅蜜以般若為宗，貴夫以方便善巧濟一切也。今公欲有為於當世，而不知此，其可乎？」龍圖公深感其言，為之委蛇曲折以行其道，十餘年間，兩路之民受賜多矣。其後以言得罪，夫人泰然無憂色，笑謂龍圖公曰：「公雖知所謂『般若』矣，獨於『能忍』抑猶有未盡乎？」<sup>8</sup>

伊沛霞所述有關黃氏與其夫之對話，大致是此段文字之逐譯。黃氏信佛而能用佛說來勸導其夫，確為黃氏對佛教有相當理解而能「學以致用」的一個明證。伊沛霞指出她以釋氏六波羅蜜的理解來勸其夫，是其應用所學的表現，可謂言之成理。

不過，細讀李綱原文之後，我們發現伊沛霞並未把黃氏所說「公雖知所謂『般若』矣，獨於『能忍』抑猶有未盡乎」一語解釋清楚。而以為「容忍」（tolerance）是般若智慧的一個較高的層次。不知所謂「六波羅蜜」（six *pāramitās*）或「六度」中含「忍辱」（*ksānti*）及智慧（*prajñā*）。黃氏之意實是：「您雖然知道六波羅蜜裏的智慧一項，怎能獨對「忍抑」一項，了解得還不徹底呢？」黃氏既知釋氏六波羅蜜之義，當然是信仰大乘的菩薩理想。不

<sup>8</sup> 見李綱，《梁溪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170，頁9b-15a。

過，她所處的時代是北宋末期，當時江浙地區禪宗及淨土信仰相當流行，黃氏顯然也受到了影響，所以李綱為她所寫的墓誌銘才說：

中年篤好釋氏，世味益薄，獨掃一室，燕坐終日，以禪悅自娛。自龍圖公以罪去，益有厭世意。嘗夢金人長丈餘，以手授之，夫人驚喜而悟，頓若有得，召諸子告戒甚悉。一日晨興，偏詣諸娣姒，若叙別然，且曰：「吾終當夢中逝，不復以疾病煩人也。」夜分，命兒婦具粥食，既而就枕。詰旦，猶顧左右具龍圖公藥餌如常時。少頃，諸子興居，已奄然逝矣，側卧西鄉〔嚮〕，手結印，固不可解。<sup>9</sup>

所謂「燕坐終日，以禪悅自娛」即是參禪打坐之作法，而夢金人及「當於夢中逝」之說，則是佛書中所說信仰彌陀西方淨土之報。可見黃氏浸淫佛法甚久，頗識其中三昧。她能以佛教之說來勸導其夫，絕非偶然。不過，這種例子其實並不多，不能說具有代表性。

## （二）自由進出佛寺會聚讀經

伊沛霞述及佛教對婦女具有吸引力時，特別舉例說明婦女因為信仰佛教，常施財供獻寺院，或獻金造佛像及菩薩像，並請人畫其本人之像置於佛及菩薩像之下。寺院之供養活動，給予婦女理由離家外出，或讓陌生人進出其家，且各階層之婦女都能出入寺廟，有時甚至是成群進出。她還說寺院為婦女集會之所，成為她們讀佛經之處。

關於婦女進出寺院，宋人筆記、平話不乏其故事，當可反映當時現象。伊沛霞之說是根據兩種資料來源。其一為南宋洪邁所寫的《夷堅志》裏〈仇邦俊家〉及〈苦竹郎君〉兩則故事。前一則故事略謂：紹熙五年（1194）六月二十二日，鄱陽城隍王誕辰，「仕女多集廟下奠獻。」後一則故事則說：潭州善化

---

<sup>9</sup> 同前註。

縣苦竹村所事神為「苦竹郎君」，里中余生妻唐氏於乾道二年（1166）邀鄰婦郊行，至小溪茅店飲酒，店旁即是「苦竹郎君」之廟。「酒罷，眾婦人皆入觀。」<sup>10</sup> 此二故事所云之「仕女多集廟下奠獻」與城隍誕辰有關，而「眾婦人皆入觀」所瞻拜的「苦竹郎君」，可能是地方神。眾婦女外出之意原在「郊行」，在茅店飲酒後入苦竹郎君觀，或只是順道參觀，未必與信仰有直接關係。伊沛霞雖然證明他們確能出入寺廟，但未能證明其出入寺廟之行為確為其虔誠之宗教信仰之表現。

另一資料來源為南宋《都城紀勝》一書中的〈社會〉一節，其中有謂：「城中太平興國傳法寺淨業會，每月十七日則集男士，十八日則集女人，入寺諷經聽法。歲終則建藥師會七晝夜。」<sup>11</sup> 伊沛霞根據此段文字認為婦女不但成群進出寺廟，而且不少婦女還集會結社，入寺廟讀佛經。此種解釋，易誤導讀者。因「淨業會」與彌陀淨土信仰有關，是南宋以後流行淨社活動的一種。此淨業會由佛寺舉辦，男女信徒分開預會，誦淨土經並聽寺僧演說彌陀教法，與其他諸寺的經會，性質類似，並非如伊沛霞所暗示，為婦女主動性結社而按月讀一次佛經之活動。此外，南宋都城之類似經會不少，有些經會也確為富家豪族之善男信女鼓吹贊助而成。譬如，《夢梁錄》就說當時府室宅舍、內司府第之娘子、夫人等，建「庚申會」，誦《圓覺經》。這些富家婦女赴會之時，都帶著「珠翠、珍寶、首飾」，儼然赴喜慶盛宴，似乎誦經之初意已質變為炫耀珠寶衣飾以爭奇鬥豔，故時人呼之為「鬥寶會」，實意存譏諷。<sup>12</sup> 雖然如此，此會仍是由寺院主持，而誦《圓覺經》亦為一必要過程。還有所謂「西歸會」，是諸寺庵舍於每月庚申日或八日，集善男信女誦經設齋。或疑選擇庚申之日誦經，與道教三尸之說有關，顯示結社、經會等活動，不是伊沛霞所述那麼單純。<sup>13</sup> 不管如何，富家婦女能自由出入寺院而建會誦經，主要是因為他們都是寺院之大檀越，為寺院主要財源所在。此種集會，固意在誦經聽法，實

10 見《夷堅志》，頁 1034、1627。

11 見耐得翁，《都城紀勝》，《東京夢華錄外四種》，卷 19，〈社會〉，頁 98。

12 見吳自牧，《夢梁錄》，《東京夢華錄外四種》，卷 19，〈社會〉，頁 301-02。

13 《兩浙金石志》，卷 9，〈宋建庚申勝會記〉，頁 1a-2a。

也是主要社交活動之一，被譏為「鬥寶會」，原因不難理解。

### （三）自稱創教者以招募信徒

伊沛霞說偶有婦女因成名而為一教派之首，如 11 世紀的婦女蔡氏，因拒絕成婚，各地婦女遂信奉之並視之為神仙。此一說法是出自晁補之（1053-1110）《雞肋集》的〈安康郡君龐氏墓誌銘〉。墓誌銘中說：「蔡女子于，不嫁，稱師聚徒，傳一世以為僊，自大人顯族爭奔向之。」按原文之意，實說蔡州（今河南汝陽）女子名于者，不嫁而自稱師，並聚集徒眾相傳，號稱神仙，許多大人物及顯貴家族之人，都競相信嚮。伊沛霞誤讀原文，把「蔡女子于」逕讀成「姓蔡的婦女」，而不理會下文的「後于敗」一句。又晁補之在「自大人顯族爭奔向之」一語後，說「夫人獨不然，曰道貴清靜，反此，禍也。」<sup>14</sup>其意在說在穎州的墓主龐氏，深知「道貴清靜」之理，而不為聚徒稱師自號神仙的人所惑，雖蔡女或「世以為僊」，但畢竟因過於招搖而遇禍，如龐氏之所料。伊沛霞強調蔡女因號稱神仙之故，而信徒雲集，但她未能注意到這種自號神仙而擁有信眾之人，往往被地方官府視為左道異端而打壓，難成氣候。蔡于因號稱神仙而招禍，即是被視為左道而打壓的結果。換句話說，婦女因自稱神仙而欲創教立派，易犯官方禁忌而被視為妖道，如同地方神祠之被視為淫祠而遭官府之禁阻，其信仰也是短暫的。至於此不為所惑的墓主龐氏，則是陳琪（1017-1076）之妻，亦即下文所述後山居士陳師道（1053-1101）之母龐夫人（1019-1095）。她崇奉釋氏，修行淨業，對自稱神仙、擁眾招搖之人，自無意苟同。

### （四）篤信佛教而轉趨內向

伊沛霞說宋代婦女傳記充分顯示她們不只是藉宗教活動逃避家庭，而是信佛之後，更趨內向。她引用了以下數條北宋及南宋的資料為證：

---

<sup>14</sup> 見晁補之，《雞肋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64，頁 19a-20b。

1. 宋祁（998-1061）之〈隴西郡君李氏墓志銘〉（《景文集》）
2. 張吉甫〈宋故安平縣君崔氏夫人〔墓誌〕銘〉（《八瓊室金石補正》）
3. 蘇軾（1037-1101）之〈劉夫人墓志銘〉（《蘇軾文集》）
4. 陸佃（1042-1102）之〈邊夫人行狀〉（《陶山集》）

此四篇墓誌銘都出於北宋作者之手。〈隴西郡君李氏墓志銘〉說：李氏（976-1031）深信佛教，「少悟佛諦，多薰祓誦經，率一月常十齋。」<sup>15</sup>〈宋故安平縣君崔氏夫人〔墓誌〕銘〉說：崔氏（999-1067）「平居好佛書，後得《圓覺經》觀之，歎曰：『使我早研悟此理，當終老於家，孰能有行，重結緣彙。』自是思略世事，減徹饌具，戒殺生。」<sup>16</sup>〈劉夫人墓志銘〉說：劉氏（1005-1085）「好誦佛書，受五戒。」<sup>17</sup>〈邊夫人行狀〉說：邊夫人（1025-1093）「日常焚香誦經，持念諸佛名號，數珠為屢絕。」<sup>18</sup>

另兩條資料，一見於南宋文集，一見於出土器物：

5. 張守（1084-1145）之〈宋故孺人邵氏墓誌銘〉（《毘陵集》）
6. 1983年《考古》季刊的〈浙江衢州市南宋墓出土器物〉一文

〈宋故孺人邵氏墓誌銘〉形容邵氏（?-1121）謂：「〔夫人〕誦佛書日不輟，夜諷祕咒，施餓鬼食，風雨疾病不渝也。自書〈觀音偈〉『心念不空過』五字於經行坐臥之地。」<sup>19</sup>〈浙江衢州市南宋墓出土器物〉一文說：某楊氏（?-1271）「為一儒家士大夫之妻，死後以觀音瓷像陪葬於其墓中。」伊沛霞用此例來證明觀音對宋代婦女之特殊吸引力。

根據這些資料說婦女潛心誦經念佛，當不為過，但用這它們來概括宋代婦女因信佛而轉趨內向，則嫌簡略而片面。信佛而避世事之紛擾或轉內向似為自然之事，但並非必然之結果。宋人文集所含類似資料甚多，伊沛霞雖無意詳論，也須有足夠的取樣來作證。此外，伊沛霞使用這些資料時，似乎並未閱讀

<sup>15</sup> 見宋祁，《景文集》，《叢書集成新編》本，卷60，頁813。

<sup>16</sup> 收於陸徵祥，《八瓊室金石補正》，卷103，頁727-28。

<sup>17</sup> 《蘇軾文集》，〈劉夫人墓志銘〉，頁470-72。

<sup>18</sup> 陸佃，《陶山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16，頁17a。

<sup>19</sup> 張守，《毘陵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13，頁17a-18b。

資料全文，辨明這些婦女身份，考查其信佛崇佛之脈絡，是以往往往有顧此失彼之病。譬如，〈隴西郡君李氏墓誌銘〉中之李氏，是仁宗朝官拜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王拱辰（1012-1085）之母，她嫁給王拱辰之父為繼室，處於一個「姻婭數十姓」的大家庭。墓誌說她「少悟佛諦」，可見自少即誦習佛經，相當虔誠，非是為人妻子之後才念佛。此外，她雖念佛，但善於持家，「愛恤饋餉，歲時無虛，夫人以恩意接之，親疏咸有節適。」其夫「晚節官不進，貲產益空」，而她「謹視用度，均一甘苦」，是一位能兼顧家庭及信仰之婦女，並未因信佛而逃避家庭或轉趨內向。又如，〈宋故安平縣君崔氏夫人〔墓誌〕銘〉之崔氏，為仁宗朝以尚書祠部郎中集賢校裏致仕的趙宗道（999-1071）之妻，與韓琦（1008-1075）之妻為姊妹，因其妹關係而受封。她閱讀《圓覺經》，實為親友所知。據說因誦此經，死時「無一語及後事，凝神順化，目瞑不亂。」這種結果，親友皆認為是她「於圓覺之旨，得之心者多矣」之故。《圓覺經》自唐、宋以來，為天臺、賢首及禪宗之徒所習，宋真宗時翰林學士及名儒晁迥（948-1031），更力倡《圓覺經》之旨，曾說：「吾志在《圓覺經》，得普眼上根之觀門；行在《楞嚴經》，得觀音入流之法要。姑務相濟，積習勝緣。」仁宗時參政趙槩（996-1083）曾為之作註釋，並延淨行僧十人至其府上薰裓道場、講誦此經。蘇軾、蘇轍（1039-1112）和黃庭堅（1045-1105）都讀過此經。蘇軾〈念奴嬌〉一詞之「灰飛湮滅」一句，即出《圓覺經》之經文。<sup>20</sup>此經雖然只有一卷，但其中說無明、幻身、離幻、真性圓覺等道理、「無取無證，於實相中實無菩薩及與眾生」、「修多羅教如標月指」、奢摩他、三摩鉢提、禪那三種禪法、二十五種清淨定輪，乃至遠離「作、止、任、滅四種禪病」之旨，都適用於禪門修學，深合修禪士大夫及禪宗學徒脾胃，故自「圭峰

<sup>20</sup> 《大方廣圓覺多羅了義經》，《大正藏》冊 17，第 842 號，頁 914a，有云：「善男子，一切菩薩及末世眾生，應當遠離一切幻化、虛妄境界。由堅執持遠離心故，心如幻者，亦復遠離。遠離為幻，亦復遠離，離遠離幻，亦復遠離。得無所離，即除諸幻。譬如鑽火，兩木相因，火出木盡，灰飛煙滅。」關於晁迥、趙槩等人之讀此經，見晁迥，《法藏碎金錄》，《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8，頁 10a；張方平，《樂全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34，〈宮師趙公圓覺經會贊并序〉，頁 21b-22a；蘇轍，《樂城後集》，卷 21，〈書白樂天集後二首〉，頁 1407-08。黃庭堅，《山谷別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13，〈與胡逸老書九〉，頁 9a。

（宗密）發明此經，造疏教〔數〕萬言，反約於廣博浩繁之中，畧為別本，由唐至今，廣畧並行，西南學徒，家有其書。」<sup>21</sup> 不唯西南如此，江淮吳越之間，經天台學者之鼓吹及義解，形成二家之言，迭有論辯，頗吸引學者。<sup>22</sup> 崔氏浸淫於此經中，當是學禪之故，其能知圓覺了義，臨死不亂，實為禪定工夫之效。伊沛霞所云之「轉趨內向」，不外說明她們內心之傾向寧靜、自覺，然各人工夫深淺不一，其結果亦異。就崔氏而言，她對《圓覺經》之了悟，表現於其修行真定、減去妄想之毅力。

又如，〈劉夫人墓誌銘〉之劉氏，是以草書獨步一時的才翁蘇舜元（1006-1054）之妻，因念佛書，而受五戒，自然過著相當嚴謹之佛徒生活。她病時能「預為送終具甚備，至疾革，怡然不亂」，似於佛教死生空滅之理有所會悟。〈邊夫人行狀〉之邊夫人，是陸佃的母親，她持數珠誦經念佛名號，當為彌陀淨土信仰者。此種信仰，以唸誦為主，以往生淨土為目標，雖未必深識佛理，但釋氏認為其信佛之效與劉夫人類似。〈宋故孺人邵氏墓誌銘〉之邵氏，為奉議郎致仕詹成老（生卒年不詳）之妻，她的念佛也為其親友所周知。但她「夜諷祕咒，施餓鬼食」，行唐代開元期間盛行一時之密教教法，與下文所述婦女行密教法之事例相印證，可見密教滲入宋代各階層社會之情況。邵氏後來獲疾，把婢女支開，謂欲稍事憩息，「遂枕臂側臥而逝」。時當盛夏，而她肌膚如生，且異香襲人，人皆以為好善奉佛之證。<sup>23</sup> 這些伊沛霞未注意到的婦女行為，都可以看出宋代婦女奉佛之多樣性，「逃避家庭，轉趨內向」云云，固為信佛之可能傾向，但既非必然，而程度及結果亦因人而異，不可不查。至於〈浙江衢州市南宋墓出土器物〉一文所述，伊沛霞並未說明清楚。蓋其文所說之南宋墓為 1977 年挖掘的一座南宋雙穴磚室墓。墓主是魏了翁

<sup>21</sup> 〔宋〕居簡，《北磻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5，〈集注圓覺經序〉，頁 8b-10b。

<sup>22</sup> 同前書。居簡所說之「西南學徒」，應為四川地區之禪學者，蓋居簡為潼川人（今四川三台縣），而造《圓覺經》疏及以「華嚴禪」知名之唐圭峰宗密（780-841），也出身四川，加上四川大足《圓覺經變》石刻雕像之豐富，似可證明《圓覺經》最盛於四川。參看向世山，〈以「圓覺經變」石刻造像論宋代四川民間佛教的信仰特徵〉，頁 87-92。

<sup>23</sup> 《毘陵集》，卷 13，頁 17a-18b。

（1178-1237）門下史繩祖（1191-1274）及其繼配楊氏（生卒年不詳）。墓中所藏器物確有「瓷塑觀音坐像」一件，形制如下：「束髮冠帶，額有白毫相，著寬袖交領衣，交手於前，腳踩蓮花，型態豐滿寧靜。」<sup>24</sup> 不過，此觀音女身像，雖可用來證明宋代觀音像多為女身，但置一小觀音瓷像於墓中，未必因觀音之「吸引力」，也可能是因瓷器本身精巧之故。蓋據說其造型「與上海博物館藏宋景德鎮影青瓷像相似。」何況此瓷像置於合葬墓中，未嘗也不是男墓主的藝術蒐藏品。論文作者所說「〔史繩祖墓中〕同出的瓷觀音像、八卦紋銀杯等，表明他同時也是佛教與道教的信徒」，<sup>25</sup> 也言之成理。總之，觀音瓷像見於墓中之原因，未必全與墓主之信仰有關。此外，該論文所錄的〈史繩祖墓誌〉及〈楊氏壙志〉都未提及二人信佛之事。〈楊氏壙志〉為史繩祖所親寫，若其妻信佛或信觀音，當不至於不置一詞。所以用此條資料說明楊氏之信觀音也略嫌勉強。其實，如下文及本文下篇顯示，婦女信觀音之資料甚多，何必依賴此模稜兩可之資料為立論之根據？

## （五）處大家庭者尤易信佛

伊沛霞認為在大而複雜之家庭裏的婦女，尤其容易信佛。她使用下列三種資料作證：

1. 葛勝仲（1072-1144）之〈妻碩人張氏墓誌銘〉（《丹陽集》）
2. 范浚（1102-1151）之〈安人胡氏墓誌銘〉（《香溪集》）
3. 葉適（1150-1223）之〈孟夫人墓誌銘〉（《葉適集》）

此三種墓誌銘之作者，葛勝仲與范浚之仕途生涯跨南北宋，而葉適則純粹為南宋學者。伊沛霞用此三條資料來證明其說，實在不足。

根據〈妻碩人張氏墓誌銘〉，張氏處在「闔門數百指共室同爨」的大家庭裏。她「喜浮屠學，日誦其語。食不擊鮮，奉觀世音尤力，課所謂《大悲咒》者數以萬億計。嘗得寒疾瀕死，觀世音現白衣瓔珞像，升卧榻以楊枝荆芥袪其

<sup>24</sup> 見衢州市文管會，〈浙江衢州市南宋墓出土器物〉，頁 1004-1011 和 1013。

<sup>25</sup> 同前註。

體，尋汗浹，頓愈。」伊沛霞對張氏之敘述，實為此段文字之逐譯。考此張氏為葛勝仲之妻張濩（1074-1122）。葛勝仲二兄因在京為官，而妻子俱逝，子女成群，都由張氏照顧，是以有「闔門數百指共室同爨」的情況。而葛勝仲任官之後，「數以戇直賈禍，流離落漠，而碩人能以義命相譬曉。」可見張氏相夫教子之功甚大。依墓誌銘看，張氏住在汝州臨汝郡（在今河南省）時，因為信佛非常虔誠，疾病中，仍勉力上中嶽嵩山朝拜。歸後，「一夕神識去體」，家人環泣，都「剔股、燬臂、灼頂以禱觀世音像復現。」不久「光相滿室」，而張氏亦於黎明甦醒，於安度四十一日之後不幸去世。去世時「轉識不亂」，論者都認為是累善之報。<sup>26</sup> 葛勝仲自己也信佛，他嘗手抄《華嚴經》，友人參知政事陳與義（1090-1138）曾賦詩贊之。<sup>27</sup> 可見信佛、拜觀音為葛勝仲家族之事，不僅張氏一人而已，這些都是值得注意而為伊沛霞所忽略之現象。

根據〈安人胡氏墓誌銘〉，胡氏（1077-1149）為徽宗朝大觀年間湖州參軍江惇禔（1079-1138）之妻，與江惇禔有堂兄妹關係。墓誌原文所說「時婺之蘭溪，言令姓者，推江、范，而胡亦嚴名宗，三家族屬各千指」，是指婺州蘭溪所住胡氏與江、范二姓都為大族，都有千人以上，伊沛霞謂胡氏所居家庭較張氏更大，為有「千指之數」的家庭，實為誤解原文。又胡氏雖信仰佛教，「旦旦取天竺書誦諷沉研，不忍翦生物」，但她「間却葷血，為伊蒲塞食。」<sup>28</sup> 「為伊蒲塞食」一語，依宋人對「伊蒲塞」一詞之理解，當作「為清信男之食。」<sup>29</sup> 故「間却葷血，為伊蒲塞食」，應是行某種戒齋之法，時而去葷茹素，並未完全斷絕食葷，伊沛霞說她不吃葷，也是誤解。至於胡氏信佛是否因處於大家庭之中，似應多尋同族婦女信佛之例為證，論點方能成立。宋代大家

<sup>26</sup> 葛勝仲，《丹陽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14，頁 22b。

<sup>27</sup> 陳與義，《簡齋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7，〈聞葛工部寫華嚴經成隨喜賦詩〉，頁 4ab；胡穉，《增廣箋註簡齋詩集》，《四部叢刊》，卷 7，〈聞葛工部寫華嚴經成隨喜賦詩〉，頁 1a。關於葛勝仲之信佛，詳見下文。

<sup>28</sup> 范浚，《香溪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22，頁 4b-7b。

<sup>29</sup> 按：宋人謂「清信男」、「施主」、「檀越」為「伊蒲塞」或「優婆塞。」但志磐曾說：「世人末學相傳，指伊蒲便為供食，其謬誤不知義若此！」可見「伊蒲塞」一語常被誤用為供食。志磐語見《佛祖統紀》，《大正藏》冊 49，第 2035 號，頁 330a。

世族甚多，族中有一、二婦女信佛，亦無足怪。但若有數位婦女信佛，而且見於幾個世家大族，則伊沛霞之說就有說服力，可惜她未能顧及於此。

〈孟夫人墓誌銘〉之墓主為仲靈湛（1133-1184）。伊沛霞根據墓誌說她「為一儒家學者及官吏之妻，年輕時曾習儒書，兼讀貞婦烈女之故事，但後來漸為禪所吸引。」這描述當是出自墓誌中所說「自詩書古文，其錄賢婦烈女，莫不備閨閫之義、嚴死生之際，其後世教微闕，雖賢公卿大夫皆寄性命於禪佛」一句。不過此句之原意，實在說當時佛教勢盛，影響所及，公卿大夫都去習禪學佛，何況婦女。並非專描述仲靈湛之詞。事實上，其下文所說「及力不能守其說，則荒憤戀結，禪佛者亦笑之，况婦人女子而能堅勇精進，絕欲輕死，宜其以為奇異希有、高世不倫之行矣」，實上承另一句純粹描寫仲靈湛之詞：

嘗見佛者宗杲，重其明悟，使從其徒曰無著道人妙總，總亦以其所知許之。未三十，即齋居蔬食，除割世欲，晝課經梵，夜習禪觀。指月出之光，自喻其性，以為亘古今不能虧也。將死，子婦等前問細碎，盡酬答申衍契入，照了幻妄，嬉笑如常日，亦異於人矣。<sup>30</sup>

這段文字，也是伊沛霞說明她曾見大慧宗杲（1089-1163），而宗杲安排她入其弟子之門的根據。<sup>31</sup> 唯伊沛霞似不知此段與下段前後相承，故把墓誌作者葉適評論當世風氣的話，當作描寫墓主學問興趣的轉移。身為永嘉事功學派的理學家葉適，對禪佛之說自無好感，故對墓主的學佛習禪不能不表遺憾，但對她能夠專一事佛而不墮其志，也不能不另眼相看。所以他也說「使其負如此之性質，出於非禪佛之世，而以夫專潔從一之操，與詩書古文之稱叅，其賢行豈有高下之差乎！」意謂像仲靈湛那麼能「堅勇精進，絕欲輕死」的婦女，出身在無佛無禪之世，而讀詩書古文，亦必能出類拔萃，不輸那些追求禪佛時尚

<sup>30</sup> 葉適，《葉適集》，頁 233-34。

<sup>31</sup> 關於無著道人妙總，見下文討論。

的公卿大夫。唯伊沛霞舉此仲靈湛之例，並未能支持大家庭婦女更易嚮佛之說法，於其觀點，並無所助。其實，仲靈湛之夫是皇親孟嵩（1134-1177），紹興中以朝奉郎直祕閣浙西安撫司參議官。孟嵩之父少師信安郡王孟忠厚（？-1157），為哲宗孟皇后之兄子，故孟嵩為孟皇后之姪孫。<sup>32</sup> 其母王氏（1096-1149）也出身世家，為元豐年間宰相王珪（1019-1085）之孫女。王氏「自少喜誦佛書，晨香夜燈，不避寒暑，晚益精練。」據說她因信佛而做各種奇夢，至有「感通佛祖，至神交於寢寐之間」之說。此外，她熱心供施佛僧，而至「捐棄金繒，殆無虛月。」並且「持律嚴甚，未嘗殺生物供饌。」<sup>33</sup> 信佛之誠，與其媳婦仲靈湛不相上下。伊沛霞若欲支持其觀點，應進一步查考王氏與仲靈湛姑、媳一同信佛之情況。

## （六）信佛強化賢內助角色

伊沛霞根據以下兩種北宋資料，證明信佛之婦女往往變為更賢淑之妻：

1. 沈邁（1028-1067）之〈長壽縣太君魏氏墓誌銘〉（《西溪集》）
2. 韋驥（1033-1105）之〈德清縣君胡氏墓志銘〉（《錢塘集》）

伊沛霞認為〈長壽縣太君魏氏墓誌銘〉說魏氏（992-1064）因為信佛而更能體諒其夫張沔（983-1060）。由於張沔平生不注意生業，故每回家與母同住，則家用常不足。魏氏能節衣縮食，使張沔不覺家用短缺，此可能是魏氏熟讀佛書之結果。伊沛霞此看法是來自墓誌這段文字：「張公平生廉，不治生業，及以孝歸居於吳，而資養或不足，夫人薄衣約食，不以其不足累於張公，蓋夫人學浮屠通其書之說，故其於窮達之際，能泊然安於命，而不以外物動其心，此士君子有所不及，而夫人能之，賢矣。」<sup>34</sup> 此段文義實在強調魏氏「學浮屠通其書之說，故其於窮達之際，能泊然安於命，而不以外物動其

<sup>32</sup> 關於孟皇后，見《宋史》，卷 243，頁 8632-38；《建炎以來朝野雜記》，頁 33-34。

<sup>33</sup> 孫覿，《鴻慶居士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40，〈宋故秦國夫人王氏墓志銘〉，頁 1a-4b。

<sup>34</sup> 沈邁，《西溪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3，頁 54b-55a。

心。」因為張沔仕途不甚順利，曾經「中廢下遷，流落者十餘年。」魏氏出身顯貴，而能處之如平日，當然不易。她學佛之效，當在能夠知命安貧，而節衣縮食實為這種生活態度的表現之一面，而非全部。又張沔少與楊億（974-1020）遊學，其父張仲仁為楊億之丈人，而其姊為楊億之夫人，與楊億有通家之好。張沔少孤，與魏氏婚後，魏氏頗能事其姑以婦禮，至於「孝愛恭惠，未嘗有懈。」故楊億賢之，常說「魏氏有女，張氏有婦」，對她稱譽有加。如此賢婦，於窮達之際，當知如何自處，不待學釋氏而能。沈邁將其歸諸學浮屠之效，未嘗無借以諷諭當世「士君子」之意。伊沛霞執其一端而說她成為更賢淑之妻，是由於念佛之故，不免有偏。

在〈德清縣君胡氏墓志銘〉中，伊沛霞擇譯了「奉議公罹疾……奉議公疾未愈……〔夫人〕閒則讀佛書，灰心釋慮，不以不幸見於辭色，以傷夫之心」一段，說胡氏（?-1093）因其夫多病而須照料，一有機會則讀佛書以解憂，不欲傷其夫之心，而其臉上未曾露出不樂之色。考胡氏為吏部郎中胡承師（生卒年不詳）之曾孫女、兵部侍郎胡則（963-1039）之孫女、光祿侍卿胡楷（生卒年不詳）之女，也是出身世家。胡氏嫁予左奉議郎致仕石秀之（1017-1093），其翁石待旦為真宗天禧三年（1019）進士，但抱道不仕，隱於越州，在所居十餘里外山水佳勝之石溪一地，創義塾而教育學者。范仲淹治越州時禮聘為稽山書院山長，培養了許多聞人，世稱石城先生而不名。<sup>35</sup> 石秀之弱冠舉進士，授信州貴溪縣主簿。神宗時，他屢授高職而官至奉議郎，後以光祿寺丞致仕。不過他壯歲罹疾，與胡氏婚後六年，即不離湯藥。胡夫人見其夫久病未癒，遂「斥鉛華，薄滋味，朝夕以調護為意，匕藥盃羹，必躬親以進。聞有良醫，則不遠千里，必極力以致之，不效而後已。」所以她多半時間都在調護其夫，為他延醫治療，使其夫終能病癒而取功名（景祐五年乙科）。她長期為其夫療病，雖然只是「閒而讀佛書」，但五十年來，以此度日，始終如一，實有藉讀佛書為其夫祈禳求福之意，信佛之至誠表現無遺。石秀之在胡氏細心照料之下，竟享長壽，且在胡氏死後五月而逝。韋驥為其二女婿，故樂於頌揚其

<sup>35</sup> 關於石待旦之後石氏之興盛，參看陶晉生教授，〈教育與興盛——新昌石氏〉，收於氏著，《北宋士族家族、婚姻、生活》，第11章，頁293-319。

德，認為非常人所能及。了解此一背景，便可知胡氏本即賢慧，不必因「閒則讀佛書」，而變成更賢慧之妻。<sup>36</sup>

## （七）夫婦偶或同時崇佛

伊沛霞指出有夫婦同時崇佛之現象，確實不錯。上述葛勝仲夫婦都崇佛，即是其例，但她並未留意及之。事實上，她所舉之例，僅是北宋四種資料而已，實嫌不足。這四種資料如下：

1. 劉摯（1030-1097）之〈陳仲明墓誌銘〉（《忠肅集》）
2. 劉摯之〈壽安許夫人墓誌銘〉（《忠肅集》）
3. 劉跂（元豐二年進士）之〈夫人龐氏墓誌銘〉（《學易集》）
4. 余靖（1000-1064）之〈宋故殿中丞黃公墓表〉（《武溪集》）

〈陳仲明墓誌銘〉之墓主陳仲明即是陳孝嘗（1015-1082），墓誌上說他是劉摯之舅舅，「少時讀書作文辭，尤刻苦為詩，旁治醫藥、陰陽之學。」後以「風痺臥家」，可能因此而「尤喜佛書，通性宗，蓋有自悟者。」陳仲明深富禪學，「雖禪學老師往往為屈，故恬夷安分，無慕乎外。」<sup>37</sup> 伊沛霞說他好讀佛書，而能與禪師談佛性當本於此。劉摯此銘雖未說陳妻龐氏（1028-1102）信佛，但其子劉跂曾為龐氏寫墓誌，誌中謂龐氏為陳之繼室，陳沒後，她「哀疚感厲，益以節自持，撫視諸子孫，曲有恩意。廉靖不喜游適，屏居寡言笑，雖近親稀見其面。誦佛書，雖有故，未嘗釋卷。」<sup>38</sup> 雖然是夫婦都信佛，但龐氏專意佛書，實在其夫逝去之後。

〈宋故殿中丞黃公墓表〉之墓主黃珙（988-1062），相信「儒術以飾躬，佛法以理性。」他誦《金剛經》至四萬遍，相當虔誠。而劉摯〈壽安許夫人墓誌銘〉之墓主許氏（987-1074）為其妻，亦平生誦佛書十八萬卷。伊沛霞介

<sup>36</sup> 按：此文不見於《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但見《武林往哲遺箬》本。本文用《全宋文》第 41 冊所收，見頁 127-29。關於石秀之，見同書〈石奉議墓誌銘〉，頁 126-27。

<sup>37</sup> 劉摯，《忠肅集》，頁 297-98。孝嘗或作孝常。

<sup>38</sup> 劉跂，《學易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8，頁 17b-18b。

紹黃珙，只敘他談儒術、佛法及誦《金剛經》部份，未說內典亦為其家學。蓋江夏黃珙任諫議大夫，其父黃徘徊（生卒年不詳）「樂道奉佛，中年戒殺，遂絕葷血，鄉曲稱為居士。」而黃珙亦「以清素自勵，兼通內外典，而留意篇詠。」故余靖說他「重奉西教，逾於先君。」黃珙好行陰德，每以善行誨人，常自吟曰：「但將貧作富，祇以道為懷。有欲休持戒，無欺便是齋」，君子謂之知言。其三子黃師旦（生卒年不詳）「深於佛性，棲心事外，有高士之風」，顯然也繼承家學。<sup>39</sup> 劉摯說許氏「性慈仁，尤喜佛事，誦其書凡十八萬卷有奇。平生少疾，將終，神明如常時，言語不亂」，<sup>40</sup> 似於佛理深有所得。值得注意的是，余靖所謂誦《金剛經》「四萬卷」之說，當指四萬遍。《金剛經》約 5000 字，讀誦四萬遍當不難。但一日讀四遍也要二十七年，若一日一遍則歷時更久。至於劉摯所說許氏誦佛書「十八萬卷」之數，當含重複讀誦同樣佛書卷數之總合。蓋宋太宗時期完成雕印的《開寶藏》，亦不過 480 帙，5048 卷。<sup>41</sup> 許氏似不可能讀完所有藏經，應是選擇性誦讀。但誦讀十八萬卷之數，談何容易？非窮以歲月，豈能竟其工？幸許氏甚長壽，或能積窮年累月之力誦讀，而使功德圓滿？

伊沛霞使用這些資料時，並未能明示夫妻同時崇佛之論點，反而指出他們之同時信佛或許只是巧合，這豈不是自亂陣腳？其實夫妻同時崇佛之例不少，不過其原因不一，有因家庭環境，有因相互影響，有妻隨夫志，或夫從妻意，不能說僅是巧合。何況黃珙家世崇佛，其妻、子都做佛事，應是可以理解的。其他夫妻崇佛之例尚多，譬如景祐時拜參知政事韓億（972-1044）之四子、北宋尚書職方員外郎韓繹（生卒年不詳），「晚而為浮屠老子之學，精志勤力，將以悟道而致永年。」而其妻范氏（1036-1067）「聞而閱之，相與一意，戒警不怠。」此是妻受夫影響之例。<sup>42</sup> 韓億之孫、韓綜（1009-1053）之子戶部侍郎韓宗（1027-1097），其夫人聶氏（生卒年不詳）嘗因大病而癒，之後「盡去金

<sup>39</sup> 余靖，《武溪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19，頁 27a-29b；《忠肅集》，頁 301-302。

<sup>40</sup> 《忠肅集》，頁 301-302。

<sup>41</sup> 參看童瑋，《北宋開寶大藏經雕印考釋及目錄還原》，頁 2。

<sup>42</sup> 《彭城集》，《叢書集成新編》本，卷 39，〈金華縣君范氏墓誌銘〉，頁 511。

珠服玩，斥不復用。更為道士服，而誦浮屠書。」而韓宗道之學，「喜論無生，而貴知命」，與妻嗜好相同，故見其妻能知命而以為賢。<sup>43</sup>

當然夫妻各有所好之例，也偶見之。譬如陸佃祖父、尚書吏部郎中贈諫議大夫陸軫（大中祥符五年進士）之妻吳氏（1006-1091），「學佛，雞初鳴，起誦經，至日旰乃已，蓋更數十寒暑，精進如一也。」<sup>44</sup>而陸軫自己則務為清修，篤信仙道，煉丹辟穀幾二十年。晚年專意爐鼎，更煉丹成癖。據說有一日，丹將煉成，吳氏因事而怒，擊碎其丹，不意竟「化為雙鶴飛去。」<sup>45</sup>「化為雙鶴」之說，當為好事者所鋪陳，但怒擊丹藥，則未嘗不無可能。果真如此，則吳氏之心，是否有「海山不是汝歸處，歸即應歸兜率天」的規勸意味？看來陸氏夫婦之一佛、一道固可和睦相融，但偶而因故齟齬，也算人之常情吧。<sup>46</sup>雖然如此，陸軫並非與佛教毫無關係，他在景德初與數位鄉士習業於浙江牛頭山臨江寺。<sup>47</sup>後入集賢為校理，於仁宗景祐年間（1034-1037），他以兵部員外郎出任福建轉運使時，與福州西禪寺之真行大師交遊，有詩唱和，其中〈贈真行大師〉一詩云：「語錄傳來久，所明機妙深。霜天七寶月，禪夕一真心。祇有道為證，更無塵可侵。前溪漚出沒，誰自感浮沈？」<sup>48</sup>似藉贈禪僧之吟詠，寄託其懷抱。慶曆年間（1041-1048），他出守四明，曾與明覺禪師雪竇重顯（980-1052）來往，亦有詩唱和。雪竇之贈詩，以「因思窮萬化，千古更無能」之語形容他所製的《圓明鑑圖》。<sup>49</sup>可見他也未嘗因習丹道而斥禪

43 同前書，卷 39，〈聶夫人墓誌銘〉，頁 518。

44 《陶山集》，卷 15，〈仁壽縣太君吳氏墓誌銘〉，頁 13a-14b。

45 見陸游，《家世舊聞》，頁 175-76；陳鵠，《西塘集耆舊續聞》，頁 6。

46 按：白居易曾留意金丹，燒煉無成，晚年結彌勒上生業，於其〈答客說〉一詩謂：「吾學空門非學仙，恐君此說是虛傳。海山不是吾歸處，歸即應歸兜率天。」（《白氏長慶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36，頁 30ab）。宋人姚寬（1105-1162）評說他「晚年藥術竟無所得，乃歸依內典耳。」此處改「吾歸處」為「汝歸處。」姚寬語見《西溪叢語》，頁 99-100。

47 臨江寺見《浙江通志》冊 12，卷 231，頁 6427。

48 《家世舊聞》，頁 180-81。真行大師生平事迹無可考。

49 見《明覺禪師語錄》，《大正藏》冊 47，第 1996 號，卷 6，〈和陸軫學士夏日見寄〉，頁 710c。《圓明鑑圖》或為道書，恐已不存。

佛，只是較專注於辟穀成仙之道罷了。其同僚對其襟抱都有目共睹，故宋祁於他以集賢校理出守鄉郡時，所贈詩中有「亭餘內史流觴水，路入仙人取箭山」之句，可說是其人之寫照。<sup>50</sup> 由於陸軫夫妻與佛道關係至深，故其子孫或習道、或學佛，實皆家傳。<sup>51</sup>

## （八）夫戒妻勿再信佛

歷代皆有儒家衛道者，宋代雖佛教盛行，但忠於儒家而反對佛者仍多。故夫勸妻勿信佛之例當不在少。伊沛霞所舉之兩例，都是根據南宋文集而得：

1. 劉宰（1166-1239）之〈繼室安人梁氏墓誌〉（《漫塘文集》）
2. 葉適之〈張令人墓誌銘〉（《葉適集》）

伊沛霞根據〈繼室安人梁氏墓誌〉說劉宰之繼室梁氏（1170-1247）來自信佛之家，婚後常私自拜佛唸誦，年年如此。後劉宰告以佛老之害道，她才放棄信佛。此係根據墓誌之文如下：「梁氏故奉佛，君之來，猶私以像設自隨，時若有所諷誦。余既與論釋老之害道，及鬼神之實理，恍然若有悟，自是遂絕。」此段說明梁氏常常唸誦佛經，而非如伊沛霞所說，有什麼年度誦拜之安排。此外，梁氏出身富家，但嫁給劉宰之後，所有嫁妝都因協助劉宰親人而用罄。後劉宰辭官隱居，梁氏告以「今君當賣劍買牛，吾當力蠶繅紡績爾。」此後遂「絕肉食，去華飾，有饋者及餽，餘惟以飫兒女」，過著相當淡泊之生活。梁氏臨病終之前，曾對劉宰說：「君嘗與我論鬼神之禮，以為世俗之說皆大謬，吾有味其言，乃今不幸久疾，瀕死數矣，無幾微有爽於聞君言，其信吾死其天乎！」言訖而沒。可見他與劉宰同甘共苦，患難相持，對劉宰之勸說，深信不疑，故斷絕信佛，毫無悔意。<sup>52</sup> 這對出身富室又信佛家庭之婦女可謂

<sup>50</sup> 《家世舊聞》，頁 177。按：《四庫全書》本《景文集》作「亭餘內史浮觴水」，見卷 14，〈送越州陸學士〉，頁 4b。《兩宋名賢小集》亦同，《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見卷 24，〈送越州陸學士〉，頁 13a。其他宋人詩選皆然。

<sup>51</sup> 此點陶晉生教授亦略有所論，見〈書香世家——山陰陸氏〉，收於氏著，《北宋士族家族、婚姻、生活》，頁 267-292。

<sup>52</sup> 劉宰，《漫塘文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32，頁 15b-19b。

相當不易。梁氏之父侍郎梁季秘（1143-1208）「蚤悟恬靜養生之理」，而且「薄滋味且戒殺」，而其夫人吳靜貞（1146-1220）「亦奉佛持齋」，<sup>53</sup>顯然是一對崇佛之夫妻，故劉宰說「梁氏故奉佛」，實指即其岳家之佛教信仰。伊沛霞既知梁氏來自信佛之家，若能注意及梁氏父母同時信佛之情況，當了解梁氏放棄信佛之不易，也可以為其夫妻同時信佛之說增加一例證。

葉適〈張令人墓誌銘〉之墓主是陳傅良（1137-1203）之妻張幼昭（1146-1195）。她生於儒門之家，「自幼陶染詩禮間事，絕異於他女。」陳傅良與葉適一樣，都是浙東永嘉事功學派的學者，不信佛道鬼神，而其妻從之，「不信方術，不崇釋老，不畏巫鬼，凡其夫所欲向意，行不曲折，倣古不循俗，夫人一切順承，曰：『不如是，是吾不能從其夫。』」可見張氏之不信佛是志趣使然，是夫唱婦隨的表現，沒有因夫之規勸而改宗的事實，與劉宰改變妻子信佛之例不同。葉適之銘說張氏「同其夫之志意兮」，贊她夫妻琴瑟相偕，即是此意。<sup>54</sup>伊沛霞拿梁氏與張幼昭之例相提並論，甚不合適。

## （九）中、晚年悉心嚮佛

伊沛霞根據其所見資料，相信為人妻者多在三十五歲以後開始深信佛教。這方面的資料她蒐集的較多，有下列數種。其中北宋資料有三，南宋有二。

1. 范祖禹（1041-1098）之〈長樂郡君尹氏墓誌銘〉（《范太史集》）
2. 汪藻（1026-1105）之〈夫人陳氏行狀〉（《浮溪集》）
3. 李綱之〈宋故龍圖張公夫人黃氏墓誌銘〉（《梁溪集》）
4. 朱熹（1130-1200）之〈夫人虞氏墓誌銘〉（《晦菴集》）
5. 袁燮（1144-1224）之〈太夫人戴氏墳志〉（《絜齋集》）

伊沛霞解釋此數條資料，往往只見其表面而未能深查其底蘊，使其觀點之說服力大為減弱。譬如，〈長樂郡君尹氏墓誌銘〉說：尹氏（1026-1087）「晚而好禪學，不以事物累其心，宴坐終日，無所思營。及屬纊，不戚不亂，順受

<sup>53</sup> 同前書，卷 34，〈吳夫人行狀〉，頁 7b-10b。

<sup>54</sup> 《葉適集》，卷 14，頁 263-64。

而待。」<sup>55</sup> 伊沛霞根據這段文字，提出婦女晚年信佛之證據。不過，考尹氏家世，可見尹氏不僅「晚而好禪學」，實際上，她的「好禪學」與家庭背景頗有關係。蓋尹氏出於一信佛之家庭，其父尹洙（1001-1047）名重當世，「以文學行義重於一世，天下之士稱尹師魯。」他與歐陽修為兄弟交，在歐陽修眼中是位「為文章簡而有法，博聞強記，通古知今，長於春秋」的學者，也是北宋中期提倡古文運動的健將。他「當天下無事時，獨喜論兵」，<sup>56</sup> 不但頗有文韜武略，而且深負經世之才。韓琦對尹洙之文章，更讚不絕口，曾說：「使我宋之文章將踰漢唐而躡三代者，公之功為最多。」<sup>57</sup> 不過，尹洙雖為古文名家，但亦深於佛學，曾學佛於汝州法昭禪師（生卒年不詳），自謂臨死不亂實賴學禪。<sup>58</sup> 韓琦說他「臨福禍生死曾不少變」，<sup>59</sup> 而范仲淹（969-1052）也說「人皆有死，子死特異，神不惑亂，言皆名理」，並讚他「死生不亂其心」，可以說是富有深意。<sup>60</sup> 尹洙之長女即是此墓誌銘之墓主；她嫁給出身開封名族的集賢殿修撰張景憲（1004-1080）。張景憲之祖父張去華（938-1006）累官工部侍郎，其父張師德（生卒年不詳）官至左諫議大夫，其母李夫人為文靖公李沆（947-1004）之女。李沆在真宗時任宰相，時稱「聖相」，也是個虔誠的佛教徒。故其女及外孫張景憲都有信佛之傾向。尹氏治家有法度，事其姑至孝，待其夫如賓。其夫卒後，「不出閨庭，而士大夫皆稱其嚴整有法，入其門肅如也。」她常戒諸女謂：「事夫如事父，敬而有別，乃可以久。」並告訴她們：「此吾得於汝外祖之言也」，可見她身體力行尹洙之所教。<sup>61</sup> 她從尹洙處所學，當不止於此，所以「晚而好禪學」未必為實錄。很可能年輕時耳濡目染，

<sup>55</sup> 范祖禹，《范太史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39，頁 4a-5a。

<sup>56</sup> 《歐陽修全集》之《居士集》，卷 2，頁 33。

<sup>57</sup> 韓琦，《安陽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47，〈故崇信軍節度副使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尹公墓表〉，頁 1a-7b。

<sup>58</sup> 見契嵩，《夾註輔教編要義》，在《冠註輔教編》，卷 3，頁 38a-39b。汝州法昭禪師見《建中靖國續燈錄》卷 4，《續藏經》冊 136，頁 82a-83b。

<sup>59</sup> 同註 57。

<sup>60</sup> 見《范文正公集》，行政院文建會編之《范仲淹研究資料彙編》，〈祭尹師魯舍人文〉，頁 276-277；〈尹師魯河南集序〉，頁 200-202。

<sup>61</sup> 《范太史集》，卷 39，頁 4a-5a。

即好此道，婚後與其姑志趣相投，自然更加深信。

伊沛霞譯述汪藻〈夫人陳氏行狀〉原文，略說陳氏（1039-1115）少即信佛，而中年之後更加精進。她「晨起齋祓坐誦，雖事顛沛于前不輟。」<sup>62</sup> 陳氏早晨誦佛經，而午後則置酒戲諸孫為笑樂，日以為常，雖年歲高而強健如往，是個樂觀堅韌的女性。她一生崇佛，非中、晚年才開始。事實上，陳氏信佛與其家庭亦有關係。她是汪藻之母、汪穀之妻。汪穀為仁宗皇祐時進士，與范仲淹、韓絳（1012-1088）、王安石雅相知。汪藻為其父作行狀，說他以直道孤立不得意於仕途，棄官之後：

老于故居龍溪之上，治田桑、保墳墓。客至則釀酒擊鮮，劇談竟日，為溫厚長者，無纖介隱衷。然于親疎，曲有禮意，各得其歡心，雖面刺人過，而受者更以為喜。與人說理道成敗，反覆曰：「後當如是。」初若闕疎，事驗皆信服。間則繙詩書鉛槧不釋手，凡經抄錄者，無不精審。<sup>63</sup>

此外，汪穀為人：

尤善攝生，至老精神容貌不少衰。時與壯者角膂力，起步為笑樂，往往多不及。常誦佛書，願脫疾苦。方與親串命酒如平時，神識不謬，俄側身而逝，眾以為獲報。<sup>64</sup>

可見汪穀信佛至深。其妻為尚書屯田郎中陳諮（生卒年不詳）之女，自少即喜佛書，顯然是家庭影響。「母病疾，炷香于臂無完膚。中年尤精確」，與汪穀可謂志同道合，屬夫妻都信佛之例。伊沛霞未查，不知汪穀仕途不順，與陳氏歸臥林壑，兩人以誦佛書為樂，為鄉里所知。

<sup>62</sup> 汪藻，《浮溪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24，頁 26b-29a。

<sup>63</sup> 以上見《浮溪集》，卷 24，〈奉議公行狀〉，頁 22a-26b。

<sup>64</sup> 同前註。

〈宋故龍圖張公夫人黃氏墓誌銘〉之墓主黃氏即是李綱的岳母，已於上文介紹。伊沛霞又用同一資料，引述文中所說「中年篤好釋氏，世味益薄，獨掃一室，燕坐終日，以禪悅自娛」一語，來作為婦人中年之後信佛之證。可惜伊沛霞未注意到李綱也說她：

方幼，穎悟絕人，誦書日數萬言，輒了其義。凡女工之事，不學而能。及長，懿淑端莊，動必依禮，所以事父母者，曲盡其意，識趣高邁，尤深於老莊之書。<sup>65</sup>

李綱之說證明黃氏是個興趣廣泛，好學深思之人。其夫長年休官閒居，而她能「安於岑寂，無半語及榮利事」，未嘗也不是有助她接近釋氏之書的原因。至於她「獨掃一室，燕坐終日，以禪悅自娛」，顯然是個禪宗之信徒與實踐者。

伊沛霞譯述〈夫人虞氏墓誌銘〉說：墓主虞道永（1103-1182），晚年篤信佛教，「一天早上，決定丟棄珠寶放棄食肉，布衣蔬食，終其一生」云云。這是根據原文「晚學浮圖法，一旦脫然若有會於心者，即屏簪珥、卻酒肉，布衣蔬食，以終其身」之語譯成。考虞道永是建陽左宣教郎江琦（1085-1142）之妻。虞氏因與朱熹為鄰，而其二子江明、江嗣少與朱熹遊，故朱熹為她撰墓誌銘。據朱熹說，虞氏「少長聰明識義理，不樂為世俗華靡事。」她婚後侍奉翁姑，頗盡其心，而居家事夫教子，皆有法度，閨門之內，「肅然以莊，雍然以和。」江琦早歿，而其諸子皆幼，虞氏年方四十，頗知遵奉禮法，持守門戶。她還教督諸子，親授經訓，歲時薦享，不論大小，必親自主持，是個典型的傳統節婦。江琦歿後，其姊既老且貧，虞氏還迎之以歸，厚其養給，禮敬備至達十五、六年而不少懈，其為人之慷慨敦厚，可見一斑。朱熹說她「聞人之善，如出諸己。見人疾病困窮，閔惻調護，惟恐不及。」此外：

---

<sup>65</sup> 見李綱，《梁溪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170，頁9b-15a。

性喜觀書，讀易、論語得其大意，下至練養、醫藥、卜筮、數術，無不通曉。平居處事，詳練縝密，與人言必依于孝弟忠信，詞甚簡而理無不足，族姻內外咸高其行、服其言，有疑必就咨焉。<sup>66</sup>

依朱熹之贊詞看，虞道永應是個樂善好施，學問駁雜，而見識超邁的女中豪傑。所謂「資稟高明，器宇恢廓，凜然有烈丈夫之操」者也。果真如是，她興趣廣泛而喜觀各類書籍，那麼閱讀佛書而信佛，似乎就無足怪了。朱子頗攻禪佛之說，也不喜門弟子談禪，但對虞道永則無微詞。他說「世或以佛學稱之，亦淺乎其為言矣。」直認為虞道永之學浮圖法，不過其學問之一端而已。

伊沛霞譯述〈太夫人戴氏壙志〉說：戴氏（1121-1192）年輕時即與兄弟同受儒書，而晚年好讀佛書云云。此是根據原文「〔外祖父〕授以諸經，肄業如二兄」及「晚而好佛，讀其書甚悉，委諸子家事，澹然無營。」<sup>67</sup> 考戴氏為鄞人戴冕（生卒年不詳）之女、〈壙志〉作者袁燮之母。袁燮說她自幼即與外祖父學諸經，肄業如二兄，而不喜遊觀、博奕、聲歌等浮靡之習。她十八歲嫁予袁燮之父，頗能相輔相成，如良師益友。袁之祖父去世，袁父不理家務，都靠其母攻苦食淡，買賣田宅，勤於生理，而得以維持。其母又代父教子教孫，頗盡心力。袁燮對其幼年教育有此描述：

先君教子甚切，太夫人助之。始學則教之書，手寫口授，句讀音訓必審。長則期以遠業，朝夕誨勵。每自抄錄，自古人言行、前輩典型，與夫當今事宜，班位崇卑，人物高下，及民間利病休戚，大抵皆能道之。諸子從容侍旁，議論往復，壘壘不

<sup>66</sup> 朱熹，《晦菴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92，頁19b-23a。

<sup>67</sup> 袁燮，《絜齋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21，頁10b-12a。

厭。教孫如教子，童幼既多，羣嬉成市，夫人頽然堂上，且喜且戒，課以讀書作字，無敢不謹。<sup>68</sup>

這真是個典型相夫教子之寫照。她的為人是「處事必度于義，待物寧過于厚，寬而明、愛而公，其德美未易于悉數。」不但善於待人接物，而且又是個多才多藝的人，「其多能餘事，至於尺牘之工，屬辭措意，為人傳玩。」<sup>69</sup> 雖然袁燮描述其母，必傾全力鋪陳其善，但她與多數不幸寡居之賢妻良母一樣，辛勞大半生，晚年委諸子家事，獻身於佛書，修身靜養，當不難理解。唯戴氏學養本即豐富，又能以所學教育子孫，其讀佛書必求其義，態度相當認真，不僅因寡居無聊，寄情佛書而已。

## （十）隨僧尼與女眷學佛

伊沛霞認為雖有婦女跟禪師學習佛戒，但不過少數幾位。有些婦女則從受邀至其府上傳戒之比丘尼處學得。而多半則從母親、祖母、姨孀處先學得其教。她引用袁采《袁氏世範》警告婦女勿讓比丘尼入府傳戒之說，證明部份婦女之學佛，是受邀至其府上說戒之尼姑所教。這是根據袁采所說：「尼姑、道婆、媒婆、牙婆及婦人以買賣針灸為名者，皆不可令人人家。」<sup>70</sup> 不過，袁氏亦說「凡脫漏婦女財物，及引誘婦女為不美之事，皆此曹也。」袁采強調的是三姑六婆的不良影響，而所謂「不良影響」也含尼姑入人家傳戒或作佛事之舉。宋之比丘尼受請誦經傳戒，當已形成風氣，為嚴厲之儒家學者所深忌，伊沛霞之推論當可接受。不過，尼姑藉佛事之需，穿針引線，為人作嫁之事，筆記小說中也經常反映，譬如《夷堅志》中之〈西湖庵尼〉之故事即是一例。<sup>71</sup>

68 同前註。

69 同前註。

70 《袁氏世範》，《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下，頁 16b。

71 見《夷堅志》，頁 902-03。按：此故事說有一少年慕臨安某官人之妻，因見西湖庵尼從其家出，遂以修建殿宇為名，頻施錢帛於庵，而實為求尼之助俾親近官人之妻。尼遂假「殿宇鼎新，宜有勝會」之由，請官人妻入庵，設酒飲之，使醉臥曲

至於從母親、祖母或姨孀處學習佛戒，伊沛霞係根據韓琦《安陽集》的〈太夫人胡氏墓誌銘〉說：胡氏讀遍佛藏且默記十餘種佛經，因此，她以所學傳授其他婦女於閨門之內。據考胡氏（968-1030）為韓琦生母，為其父韓國華（957-1011）之側室。韓琦幼孤，未及見其父之容顏，而賴其母獨力撫養成人。他親寫母親墓誌，自然是鉅細靡遺，竭力鋪陳。據他說，胡氏「生而淑明，柔德備，善書札，尤精女工，凡點酥、剪綵、擬狀生物，隨手萬態，如出造化」，儼然一多才多能之手工藝家。此外，她「性慈忍，歸信釋氏，歷觀藏典，深達義趣，口能誦者十數經。閨門之內，傳授教誘，人人嚮善。」<sup>72</sup> 可見她不但自己信仰佛教，而且還以此教人。而伊沛霞也以此段文字為證據，說明多數婦女初學佛法或佛戒於其他女居士處，這是很自然的。不過，韓琦所述其母「歷觀藏典，深達義趣」之語，應是較誇張之寫法，只能解為胡氏「閱讀了許多佛典」，不必視為「讀遍藏經。」因韓琦時代的所謂「藏經」即是上文所說的《開寶藏》，有 480 帙，5048 卷之多，而且刊行之數目有限，流傳並不普遍。除非重要佛寺，無法收藏。胡氏或許因韓琦居相位之方便，看了不少佛典，但要如伊沛霞譯成「翻閱了整部佛藏」，衡諸當時情況，實不可能。

以上對伊沛霞在其書中「虔信之妻」一節各觀點之澄清與修正，應有助於了解兩宋菁英家庭婦女佛教信仰之具體情況。筆者認為，若依伊沛霞簡單、片面及印象式的觀點來理解婦女佛教信仰之課題，結論必流於膚淺。伊沛霞所討論的婦女，除少數幾位之外，固然都信奉佛教，但她們信仰的原因與修行的方式未必盡同，常與個人家庭背景、環境、性向、嗜好及婚姻等因素有關。最重要的是，她們只佔兩宋社會菁英家庭信佛婦女的一小部份，不能以她們之例來通論將兩宋婦女信佛之表現。

為了進一步說明她們信佛之志向雖同，但修行之方式互異，筆者將以上述及之婦女信仰及修行之具體表現列於本文篇末之附表 1。除了從夫不信佛道的陳傅良之妻張幼昭（1146-1195）之外，凡有姓名者，列其姓名，名字不顯

---

室。少年先伏於室中，乃得遂其願。唯興奮過度，暴斃於床。官人妻醒後，見一男子臥其旁，乃知為悅己之少年。

72 《安陽集》，卷 46，〈太夫人胡氏墓誌銘〉，頁 11b。按：韓琦（972-1044）之生母為韓父之妾，伊沛霞未說明其身分。

者，以姓氏稱之，並大致依時間先後，分北宋、兩宋之際及南宋三段時期排列。凡生卒年跨越北宋跟南宋之婦女，列入「兩宋之際」之範圍，其姓氏或姓名為粗體者，皆為筆者所加，不見於伊沛霞書中。

由附表 1 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伊沛霞所蒐集的資料中，含 20 位婦女之墓誌或行狀，而她根據這些資料所見婦女信佛之大略，歸納出上述十點，並藉以闡明這些婦女「急於救濟其家人，同時也尋求其個人心裏之寧靜與洞識」之說，筆者覺得未嘗不能作如是觀。而她認為儒家之作者願讚賞她們，是因為「她們之宗教虔誠似能使她們成為更賢慧之妻子與媳婦」，確也反映了若干墓誌作者之意思。不過，詳細閱讀這些傳記資料，我們發現許多婦女之為賢妻或孝媳都在信佛之前，或與信佛無必然關聯。她們的出身、家庭、教育、學養，及丈夫仕途的順逆、家庭的榮枯，及個人的健康等等，都影響她們對人生、信仰的選擇。伊沛霞在解讀她的資料時，只注意婦女信佛與她們所扮演的「經紀人」之角色，忽略了她們信仰的內在因素及文化背景與脈絡之關聯。她急於認定她們信佛之事實與效益之表象，而對於她們為何信佛或念佛誦經之背景、動機與實踐方法則不甚關切，結果往往只見秋毫而不見輿薪。

「虔信之妻」一節，或為兼顧一般讀者之興趣，故雖引用近 30 條資料，述及 20 位信佛婦女，但其論點及印象式之分析與歸納，是根據其隨意抽樣選擇之北宋婦女 14 例，兩宋之際 3 例，南宋 3 例而成。以之而通論整個宋代，固然不足之甚，在研究方法上亦是一大瑕疵。<sup>73</sup> 此外，由於其主題是為人妻子信教之誠，而其思考中心又是婦女之「經紀人」地位，故也無法深入佛教信仰所牽涉之背景、動機、實踐等問題，對了解宋代婦女信佛的情況，雖能概括性的提出一些動人（sensational）的觀點，反而對了解實際情況有礙。筆者之補充，相信足以更具體地說明伊沛霞所論之「虔信之妻」在佛教上所表現的各種形式與特質。以下擬徵引更多實例，以對北宋菁英家庭婦女之修行佛教，作一全盤性的討論。

---

<sup>73</sup> 伊沛霞之書，據她說是為一般讀者而寫，但其實頗具專業性，蓋書中涉及之問題及使用之資料都相當專業，Robert Hymes 之書評也是有鑑於其專業性而為之，見前引氏著，頁 229。

### 三、北宋婦女佛教信仰與修行

兩宋社會、環境持續發生變遷，南方佛教僧團之影響力大為擴張，影響所及，佛教居士的結構和信佛行為與方式也隨之改變，造成南北宋之間某種程度的差異。這種佛教本身所產生的變化與居士信佛行為及方式的不一致性，應該是佛教史研究者所應注意之問題。

從社會階層來看，一般平民婦女信佛，雖有關個案記錄甚缺，估計應相當普遍。但中、上層社會婦女的信佛，比例雖相對地減少，但人數及事迹，遠較伊沛霞之所述為多且複雜。多數資料顯示，中、上層婦女之喜佛或出於天性，或出於學問之欲求，或因家庭環境之影響，或因父母翁姑之薰染，或因婚後寡居，原因不一而足。由於原因不同，信佛之方式也異。出家或在家、布施或持戒、誦經或習禪，全憑個人對佛教之認識、理解及信奉之深淺而異，並無全然一致之情況。個人覺得，欲討論婦女佛教之信仰，除了注意其原因及效益之外，亦應了解其信佛之背景與脈絡，還要注意其信佛方式之多樣性及歧異性，觀察她們如何具體表現信佛之虔誠，及信佛之後，面對生死所持之態度。換句話說，要從她們的信佛方式來查考她們佛教的信仰與實踐，了解他們的「佛教生活」。

理想的「佛教生活」當然是佛教信仰與修行或實踐合一，也應是依菩薩之道，修六度萬行，亦即潛心嚮佛，圓滿實踐菩薩所修行之六波羅蜜，以慈悲利他之心，助人登渡彼岸。大致上，好誦佛書，潛心佛經者多知「六波羅蜜」，也會篤實踐履。上文所述的李綱岳母黃氏，既能勸其夫在「智慧」之外，亦應知行「忍辱」之道，可見她本身或即為認真修行六波羅蜜者。黃氏之外究竟有多少婦女有此認知與修行，墓誌記錄實在無法看出。不過，六波羅蜜之間，密切相關，在理論之認知上言，力行其一，應亦能兼行其他。但觀察個人的實際修行時，就可見選擇性之修行，或重布施而輕定慧，或僅讀誦而未理解。墓誌及行狀作者，多就個人所知或偏見而記錄，也不免有顧此失彼之情形，未必能提供實錄。故在解釋史料時，自不能拘執於墓誌作者之用語，而須深查其敘述對象所表現之言行。至於六波羅蜜之「忍辱」(*ksānti*)一項，亦在儒家德行教

育中，常為一般菁英家庭成員所遵守，成為傳統婦女美德之一。尤其許多士人都有遭遇貶謫奪官或其他艱難困厄之經驗，其家中之妻妾婦孺，亦多能表現忍辱負重之情操，不必全然與信佛有關。如上文之葛勝仲妻張濩、張沔之妻魏氏、郝質之妻朱氏都有「忍辱」之表現，但是否因信佛而如此，則不可斷言。故以下為討論方便，只依大乘佛教菩薩「六度」中的「五度」分類，亦即以（一）布施（*dāna*）、（二）持戒（*śīla*）、（三）精進（*vīrya*）、（四）禪定（*dhyaṇa*）、（五）智慧（*prajñā*）等，來析論菁英家庭婦女之修行情況，一方面求在宏觀的歷史表象中，指出其個別之差異；另一方面在微觀的個別差異上，呈現其近似之處。這種分類解釋方式，雖或有其侷限，但較即興、印象式的歸類與說明有意義得多。

### （一）布施波羅蜜

布施之行有財施、法施及無畏施，舉凡設齋、飯僧、設禪會、建道場等，本文皆視為財施、法施及無畏施之例。北宋上層婦女中，不乏皇室公主信慕佛教，且表現相當虔誠者。若非早年已受薰染，即是婚後崇信。譬如，太宗之第八女荊國大長公主，與其夫婿駙馬都尉李遵勗（988-1038），夫婦兩人都好浮屠法，尤尚禪宗，與楊億、劉筠（970-1030）等為深交之禪友，常延二人及禪師至其宅之「沁園」中，設「禪會」以論宗性。其宅設法堂，公主每逢生日，李遵勗輒於家中設高座，鳴法鼓於堂中，延叢林名德登座說法，而公主於「沁園」之松巒閣設箔觀之。李遵勗死後，公主居夫喪，至於「衰麻未嘗去身」，而且「日誦佛書，有白鷺來巢。服除，不復御鮮華珍麗。」她嘗燕饗於禁中，仁宗皇帝親自為她簪花，公主辭曰：「自誓不復為此久矣！」<sup>74</sup>

<sup>74</sup> 仁宗時，她進為魏國大長公主，見《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170，頁 4085-87；王君玉，《國老談苑》，《筆記小說大觀》本，八篇，頁 261；《湘山野錄》，頁 49-50。按：《續資治通鑑長編》先說吳國長公主為皇第八妹，後又說魏國大長公主為太宗第八女，疑前者應作第七妹。韓元吉之《南澗甲乙稿》（卷 22，頁 28a）亦說魏國為太宗第八女。又按：宋隨漢制，皇帝稱其姊妹為長公主，稱其姑為大長公主。魏國為仁宗姑，故稱魏國大長公主。《續資治通鑑長編》又說：「遵勗賜第園池，為都城第一。所與游集皆一時名士。師楊億為文，億卒，為制服。及知許

又如仁宗第八女齊國公主，據說「生而明秀，自然溫淨。」她常建道場，聞梵唄鑪磬之音，輒有悅色，因此嘗依浮圖，法號為保慈崇祐大師。<sup>75</sup> 英宗第三女壽康公主，與其夫左將軍駙馬都尉張敦禮（生卒年不詳），也以信慕佛法而名於當時。壽康公主先後封有韓國、魏國、冀國、秦國、越國、楚國大長公主之號，其中冀國或越國大長公主之封號較常見於僧史及燈錄。她和張敦禮於神宗時，議請建法雲寺於京師，先後推薦數位名禪大德住持該寺，大力提倡禪宗，與李遵勗夫婦一樣，都是有名的佛教外護。<sup>76</sup>

張敦禮夫婦之信佛或與家庭環境有關，蓋張敦禮之母符氏，即是越國大長公主之姑，屯田員外郎、贈給事中張宗雅（生卒年不詳）之妻，也深信佛教。她雖然被描述為典型的儒門婦女，表現了「慈儉莊淑，得之天性，其事人有禮，居家有法，待物有恩」之美德。又能敦親睦族，「內以輔佐君子，始終順睦，無須臾之失；外以親厚淵族，承上遇下，皆得其歡心。」但於父死之後，「屏棄簪珥，終身不事華靡。日課內典，求真如寂滅之趣，尤以殺生為深戒。」符氏常說：「彼之怖死愛生，其情一也。如之何割而食之？忍人也。遂不復鮮食。」<sup>77</sup> 這種對佛教之執著，於張敦禮夫婦當不無影響。

士大夫之妻，修行布施波羅蜜者甚多，以下略依時間論列：

熙寧、元豐之時，漳南右姓施象（生卒年不詳），出身儒學世家，其母林

---

州，奠億之墓于具茨山，慟哭而返。又與劉筠友善，筠卒，周其家。尤通釋氏學，將死，與浮屠楚圓以偈頌相提警，遺戒無置金玉櫛中。」（頁 4085-87）《國老談苑》亦說：「遵勗為駙馬都尉，折節待士，宗楊億為文。於第中築室塑像，晨夕伸函文之禮，刻石為記。」（頁 261）又說：「遵勗、楊億、劉筠常聚高僧論宗性，遵勗命畫工各繪其像成圖，目曰『禪會』。」（頁 261）可見李遵勗與楊億、劉筠之關係甚深。

75 《樂全集》，卷 38，〈皇第八女追封韓國公主石記文〉，頁 26a-27a。

76 越國大長公主與張敦禮推薦進住法雲寺之禪僧先後有法雲法秀、大通善本及佛國惟白等，都是北宋有名的禪僧。見《佛祖歷代通載》，《大正藏》冊 49，第 2036 號，卷 19，頁 673c-674a，678c-679a；《釋氏稽古略》，《大正藏》冊 49，第 2037 號，卷 4，頁 880b。《建中靖國續燈錄》，《續藏經》冊 136，卷 10，頁 155b；《禪林僧寶傳》，《續藏經》冊 137，卷 26，頁 544b。

77 陳襄，《古靈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25，〈崇國太夫人符氏墓誌銘〉，頁 16a-20b。

氏（1011-1082），年方三十，即「悟生理不足恃，誦佛書，欲其鄉人為善，語因緣感應事以動之。」林氏以佛書因緣感應事勸人為善，前後凡四十年，可見其此修行「法施」之毅力。她死時年七十二歲，而自謂所得多矣，「勢數當往」，遂遺言告其子孫說：「惟為善為能立」，然後沐浴易衣而化。<sup>78</sup>

約在同時，朝議大夫黃某之妻許氏（1009-1084），「自奉養甚約，而周施無所顧惜。奉佛尤專。」<sup>79</sup>

哲宗朝左班殿直監杭州餘杭縣楊安持（生卒年不詳），夫人張氏（1047-1088）據說「資靜淑，尤謹於事佛，樂善好施，姻族內外貧者必歸焉。」<sup>80</sup>楊安持生於江西右族，其祖父以來，貲累鉅萬，而父子不以一毫入其胸次，「飯蔬飲水，與遺世絕俗之士遊。卒能坐亡立逝，無怛於死生之變。」所謂「坐亡立逝」，是宋人傳言信奉淨土往生之效。龜山楊時（1053-1135）所撰的墓誌銘，說安持祖父「有高世之行，得無生忍法於善知識。」「無生忍法」或「無生法忍」者，《大智度論》所謂「於無生滅諸法實相中，信受通達，無礙不退，是名無生忍」也，亦是淨土法門得入往生之果。<sup>81</sup>楊安持之父為建昌居士，顯然仍承襲家業，與子、媳齊奉佛法。

泰州司馬姜仁惠（生卒年不詳）之媳、試將作監主簿姜諤（生卒年不詳）之妻史氏（1022-1077），雖貴為淮甸富室之婦，但御己甚約，而愛人甚周。她常為親族之貧者賙其生，並收其孤而為其安排婚嫁：

鄉邑饑則賑以金粟，寒則給以綈袍，不幸則脯以棺斂。至於興建剎廟、橋衢，與夫修崇西方之名山勝地者，不可勝數。<sup>82</sup>

78 黃裳，《演山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34，〈夫人林氏墓誌銘〉，頁4b-6a。

79 孔武仲，《孔武仲文集》，收於《清江三孔集》，〈仁和縣君許氏墓誌銘〉，頁307-308。按：墓誌說朝議大夫黃公，出衡陽黃氏，「立身以道，時列王庭，出守方郡。」筆者迄未查出其名。

80 楊時，《龜山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30，〈張氏墓誌銘〉，頁2b-4a。

81 《大智度論》，《大正藏》冊25，第1509號，卷50，頁417c。

82 胡志忠，〈宋故史夫人墓誌銘〉，見《全宋文》冊45，頁781-82。

史氏輕施樂善，修建佛寺無數，顯然是位篤信佛教之居士。她的布施之行，深為所居海陵鄉曲所敬慕。墓誌說她自兒子姜德化（生卒年不詳）成長後，不復問世事，「日誦佛書以自適」，顯然是賡續過去誦佛書之力，更求精進之表現。

婦女修行持戒者，亦多兼行布施，墓誌之記錄，往往語焉不詳，只述及一端。譬如，餘杭朱有安（生卒年不詳）之妻周氏（1000-1055），據稱「靜柔淑祥，性酷嚮佛，朝不茹葷，逮暝弗變，遺命諸子，鬻奩中所有以飯浮屠。」<sup>83</sup> 此種遺命施財飯浮屠之舉，實亦可能是平素施財飯僧之延續。其實，兼行布施與持戒，似成慣例，下文持戒一節可以為證。此處再舉一例：眉山進士、永康司法參軍家定國（1031-1094）之母楊氏（1019-1090），出身眉山著姓。楊母侯氏「尤深浮圖氏之學，諸講師聞其言，皆闐然服，自以弗及。」楊氏躬儉，素衣疏食，敝服破衾，家人請易之而不許。她性好佈施，約己以趨親戚之急，往往欲善待之惟恐不至。然未嘗伐其德，「日誦佛書以祝子孫，雖寢食不廢。」<sup>84</sup> 侯氏、楊氏母女都好浮屠氏之書，表現精進之心，而楊氏兼修持戒、布施之行，未嘗也不是秉承其母家訓之表現。

## （二）持戒波羅蜜

持戒之義，在持守戒律，自反自省，避去惡業，清靜身心。其最具體之表現當是出家為尼。北宋時期，皇室之公主及嬪妃多早年信佛、出家之例。譬如太宗之女，即有兩位生性嚮佛，志願出家。其一為太宗三女邠國大長公主，於「太平興國七年為尼，號員明大師。」<sup>85</sup> 其二為太宗之第七女衛國大長公主（真宗時封吳國，後改申國公主），於大中祥符二年（1009）出家為尼，號報慈正覺大師，所居之處曰崇真資聖禪院。估計兩位公主之出家年齡都不大。尤

<sup>83</sup> 強至，《祠部集》，《叢書集成新編》本，卷 35，〈汝南周氏夫人墓誌銘〉，頁 533-34。

<sup>84</sup> 《范太史集》，卷 40，〈長壽縣太君楊氏墓誌銘〉，頁 1a-2b。

<sup>85</sup> 《宋史》，頁 8773。

其衛國公主，據說平生不茹葷，於端拱初，隨太宗幸延聖寺，即抱對佛而發願捨身為尼。太宗崩後，公主之皇兄真宗即位，她即表示寧願出家事佛。真宗問她為何不效諸妹享受厚賜湯邑，並築外館以尚天姻，而寧願出家。她說是「先帝之願」，而堅乞出家。從端拱初到咸平初約有十年，她至多十餘歲，可說是早年即信嚮佛法。隨她出家者，還有「藩國近戚及掖庭嬪御」凡三十餘人，大概都是太宗嬪妃，因太宗宴駕而出家。<sup>86</sup> 後來各帝之公主，都尚天姻，並無出家為尼者，顯示太宗之女出家，情況甚為特殊，很可能受太宗崇佛之影響。<sup>87</sup>

北宋皇帝擁有三至十餘后妃不等，后妃較多之皇帝，一旦宴駕，其嬪妃何以度日？上文已略述太宗死後，嬪妃隨其女出家之情況。太宗有十三后妃，除死於太宗前之皇后，及明德李皇后享年稍長外，其餘於太宗薨後出處不明，似無如後唐李克用（856-908）如夫人陳氏為其落髮持經、出家為尼者。<sup>88</sup> 不過，雖不出家為尼，但誦經念佛以銷永晝者，則間或有之。譬如，宋仁宗有后妃十七，仁宗崩後，周貴妃「日一蔬食，屏處一室，誦佛書，困〔暈〕則假寐，覺則復誦，晝夜不解衣者四十年。」<sup>89</sup> 她雖未出家為尼，但與獻身佛門實無二致。

北宋初，公卿大臣家之婦女也偶有出家為尼者，如太宗宰相趙普（922-992）死後，其二女皆志願為尼，太宗再三諭之，而不能奪其志，只好賜長女名志願，號智果大師，次女賜名志英，號智圓大師，讓其出家為尼。<sup>90</sup> 二人

---

<sup>86</sup>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72，頁 1631；《宋史》，頁 8774；《宋會要輯稿》，頁 7864；文瑩，《湘山野錄》，頁 17-18。按：《續資治通鑑長編》說此公主為「皇第八妹」，而文瑩說她為太宗第七女，《宋史》亦列為第七女。疑《續資治通鑑長編》誤，見下文註。

<sup>87</sup> 關於太宗之崇佛，見筆者，《北宋佛教史論稿》，頁 31-67。

<sup>88</sup> 《舊五代史》，卷 49，〈后妃列傳第一·魏國夫人陳氏傳〉謂李克用大漸之際，陳氏侍奉醫藥，垂泣而言曰：「王萬一不幸，妾將何託？既不能以身為殉，願落髮為尼，為王讀一藏佛經，以報平昔。」後李克用既死，陳氏果落髮持經，法名志願。

<sup>89</sup> 《宋史》，頁 8623。關於北宋皇帝后妃人數，見 Priscilla Ching Chung, *Palace Women in the Northern Sung*, pp. 18-23。太宗與仁宗雖有較多后妃，但非終其一生如此，而是平均某段時期內有四、五位與他們同時生活。

<sup>90</sup> 《宋史》，卷 256，頁 8939-8940。

為何堅持出家，原因不詳，但獻身佛門，畢竟非常例。亦有如仁宗周貴妃，雖不出家為尼，但終身不嫁，獻身佛書者。譬如，湖州歸安少府章存道之姊，事佛蔬食不嫁，全由章存道之妻葉氏（1045-1069）奉養。<sup>91</sup>

持戒之道亦表現於不殺生、不茹葷。宗室家庭婦女（宗婦）持此戒者例子甚多。譬如，宋太祖四世孫，左驍騎大將軍趙世謐（生卒年不詳）之妻安氏（1029-1065），十四歲即嫁與其夫，不久夫死，遂獨力奉養其姑，婦道甚備。其子早亡，安氏亦於三十七歲即死。據張方平說：「〔安氏〕既傷其夫，而哀其姑，又悼其子，於是口不茹葷，手不釋佛書，痛自勉約，如是積年，竟先其姑而亡。」<sup>92</sup> 東頭供奉官趙叔驍（生卒年不詳）之妻方氏（1069-1103），「性柔淑，在家勤女工，既嫁事舅姑盡禮，順承其夫，睦若賓友。喜誦佛經，能行其所戒。」<sup>93</sup> 兩人都是持戒及精進波羅蜜之奉行著。

將臣之妻、女，亦有持戒甚深者。譬如，仁宗、英宗朝之名將郝質（生卒年不詳）之妻朱氏（1014-1088），深信釋教，敬修梵行，「深心回嚮，持誦戒律，手不釋卷。」而且「屏葷惡殺，得大清淨、慈悲解脫之果，超然不以世故為累。」其夫在世之日，官位漸顯，榮祿益厚，侍妾日多，朱氏仍燕笑其間，不失其歡。及其夫既死，則所敬益勤，所愛益厚，十年之間，不渝其志，<sup>94</sup> 顯然於持戒之外，兼修忍辱、精進及智慧之德。

宋初勳臣秦王王審琦（925-974）曾孫、西頭供奉官成州團練使王堯善（生卒年不詳）之妻張氏（1026-1094），雖貴為宗室魏王之岳母，但平居持蠶菲食，「縞衣蔬食，齋戒從浮圖法」，<sup>95</sup> 其修行持戒之道，昭然明白。王審琦之五世孫、贈太師慶國公王克詢（生卒年不詳）之女，為贈少師賈偁（生卒年不詳）之夫人，為徽宗顯恭皇后之妹。王氏（1054-1128）「雖席貴處富，而志

<sup>91</sup> 《演山集》，卷 34，〈夫人葉氏墓誌銘〉，頁 2b-3b。

<sup>92</sup> 《樂全集》，卷 38，〈左驍衛大將軍世謐夫人仁壽縣君安氏墓誌銘并序〉，頁 23b。

<sup>93</sup> 慕容彥逢，《摛文堂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14，〈宗室東頭供奉官墓誌銘〉，頁 26b。

<sup>94</sup> 《八瓊室金石補正》，卷 105，〈武安軍節度使郝質妻朱氏墓誌〉，頁 742b-743b。

<sup>95</sup> 按：王堯善有女為神宗弟魏王之妻，封潭國夫人，故為宗室之姻親。見畢仲游，《西臺集》，卷 14，〈延安郡太君張氏墓誌銘〉，頁 11a-13a。

謝芬樂，好觀天竺東來空寂之說，祁寒盛暑，不少懈，所得祿賜，隨以施浮屠氏，使修佛供，及班諸親族之貧者。」<sup>96</sup>顯然於持戒之外，兼修布施、精進之行。

士大夫家庭之婦女，修行持戒者更多，以下大略依時間先後舉證：

真宗朝名相王旦（957-1017）之次女王氏（987-1041）為贈工部侍郎蘇耆（987-1035）之妻，亦即名詩人蘇舜欽（1008-1048）之母、神宗朝翰林學士韓維（1017-1098）之岳母。<sup>97</sup>王氏少與其父學孝經、白居易詩及詞賦數百篇。其夫蘇耆早逝，王氏「哀怛遇疾，遂不茹葷，日誦浮屠書，委家政於子婦。」<sup>98</sup>雖然如此，王氏「嚴重有識，素賢其子」，媳婦都親自挑選。蘇耆之長子、祠部員外郎蘇舜元（1006-1054）之妻劉氏（1005-1085），即是因此而入蘇家。劉氏與其姑一樣「好誦佛書，受五戒，預為送終具甚備。至疾革，怡然不亂。」<sup>99</sup>可見劉氏不但嚴持佛戒，而且深悟佛理，其臨死而能「怡然不亂」，亦是修持「智慧」波羅蜜之表現。

真宗朝衛尉寺丞贈虞部郎中穎川陳昌謨（生卒年不詳）早逝，其夫人段氏（988-1049）年方三十二，孀居在家，「奉姑益謹，訓子愈嚴。」而且不御鉛華，廢棄聲樂，「惟鹿衣蔬食，一志佛事，日誦竺典，以齋潔自飭」，<sup>100</sup>同時表現了堅毅持戒之行及誠懇精進之態度。

曾於仁宗朝拜相的晏殊（991-1055）之媳婦、祠部郎中晏成裕之妻張氏（1013-1069），為太祖時工部侍郎張去華（938-1006）之孫女，她「晚喜佛書，不飲酒食肉。」<sup>101</sup>同朝司法參軍萬延之（生卒年不詳）母朱氏（982-

<sup>96</sup> 胡寅，《斐然集》，卷 26，〈吳國太夫人王氏墓誌銘〉，頁 578-79。

<sup>97</sup> 據《歐陽修全集》之《居士集》，卷 1，〈太尉文正公碑銘并序〉，頁 160-163，王旦有四女，「長適太子太傅韓億，次適兵部員外郎直賢集院蘇耆。」按：蘇耆為蘇易簡之子。

<sup>98</sup> 韓維，《南陽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30，〈太原縣君墓銘并序〉，頁 1a-3a。

<sup>99</sup> 《蘇軾文集》，〈劉夫人墓誌銘〉，頁 470-71。

<sup>100</sup> 清·葛蔭南，《壽州志》，卷 32，〈宋段氏墓誌〉，頁 1a-2b。按：段氏守寡三十年後才去世，據此推算其夫陳昌謨之任官時間應在真宗朝。

<sup>101</sup> 《彭城集》，卷 39，〈永安縣君張氏墓誌銘〉，頁 517。

1064)，性好浮屠書，終日持誦不懈。或遇有不通之處，則默記在心，以為因此能明白不疑，是宿習之結果。朱氏中年後遂不御葷血，垂三十年，以至於終。<sup>102</sup> 兩人都堅行持戒與精進波羅蜜。

仁宗朝尚書工部侍郎韓瀆之繼室楊氏（1005-1054）「為人慈和，淵靜不喜聲味。自少及長，家人伺其動靜語默皆有常度，未嘗移也。」她三十九歲喪夫，此後三年食不茹葷，閉閣深居，日誦佛書，不復有自娛樂之意。<sup>103</sup> 尚書吏部郎中（1033-1095）之母孫氏（1001-1087），自少「崇佛甚謹，雖白首猶躬自滌濯、具香火，然非有所怖而求福也。」<sup>104</sup> 兩人也都是持戒與精進之奉行著者。

屯田郎中石君瑜（1011-1062）之妻李氏（生卒年不詳），封南陽縣君。其子石蒼舒（生卒年不詳）以草書名於世。她深達書史，為人婦姑，則「跬步以禮，閨帷矩範，鄰里矜法。」其夫死後，李氏「不復御文繡，日蔬食，誦佛書，治家嚴嗇，訓子孫益不容自放。」<sup>105</sup>

朝散郎李公車之妻王氏（1049-1104），「其事尊嫜尤謹飭，烹飪縫紉，非身為之不以進。其待族屬，雍睦有禮意，童御未嘗見其忿厲之色。喜誦佛書，持殺生戒甚嚴。」她甚至見「服飾有禽魚諸物象」，都會為其感傷而不服戴，甚為少見。<sup>106</sup>

尚書比部郎中張奎（生卒年不詳）之妻王文淑（1025-1080）為王益（993-1038）之女、王安石（1021-1086）之妹、尚書左丞張若谷（生卒年不詳）之媳婦。據說她「工詩善書，強記博聞，明辨敏達，有過人者。循循恭謹，不自高顯。」顯然深受儒家教育薰陶。不過，她「晚好佛書，亦信踐

<sup>102</sup> 沈遼，《雲巢編》，《四部叢刊》之《沈氏三先生文集》本，卷 9，〈萬府君夫人朱氏墓誌銘〉，頁 1a-3a。

<sup>103</sup> 司馬光，《傳家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78，〈玉城縣君楊氏墓志銘〉，頁 14b-15b。

<sup>104</sup> 《陶山集》，卷 16，〈孫氏夫人墓誌銘〉，頁 7b-8b。

<sup>105</sup> 文同，《丹淵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36，〈屯田郎中石君墓志銘〉，頁 1a-7b。

<sup>106</sup> 《學易集》，卷 8，〈朝散郎李公安人王氏墓誌銘〉頁 16a-17b。

之」，而且表現「衣不求華，食不厭蔬，慈哀所使，不治小過」之美德。<sup>107</sup>她既通儒家詩書，又讀釋典，儒釋兼攝，身體力行，頗為傑出。

以上諸人，或兼行布施、持戒，或戮力持戒、精進，充分表現對佛教信仰之虔誠。最特殊之例，見於仁宗朝潭州寧鄉主簿徐成甫（1035-1075）之繼室蔡氏（1037-1075）之行。蔡氏十四歲即嫁同郡環生，成禮十六日環生即死。蔡氏雖年少，但居喪之時，事奉其舅，孝謹如成人。不久，其舅又卒，蔡氏「為之斬衰、蔬食、誦佛經」，無復更嫁之意。其母與諸兄弟至環生之家奪之，認為她十四適人，十六日而夫死，為夫守喪三年，為舅守孝又三年，已盡為人婦之道，若不再嫁，於理實說不過。且環生父子俱亡，雖欲守節，將誰與居？蔡氏被奪返家後一年，歸高郵首富徐成甫，夫婦相處甚洽，豈料徐君不久又病故，蔡氏萬念俱灰，無意再生，遂購砒霜自服，家人求解藥欲救之，為其所拒，遂於徐君死後兩日去世，卒年三十九。蔡氏原生於大族之家，而所適又皆富贍之族，金繒服玩，取足於身，「餘輒以散親族作佛事，無一毫愛惜。既死，篋中索然。」據蔡氏之女婿秦觀（1049-1100）之說，徐成甫「頗涉傳記。陰陽、醫藥、算術之學，無所不窺。晚節尤厭人事，思與佛侶、處士杖屨相從，蔬食清淡為忘年之計。」而「蔡氏節行益奇，君病殆時，至取毒藥自引，後君二日卒。」顯然夫婦兩人都蔬食誦佛，實踐持戒、精進之行，又好善樂施，志趣相投。<sup>108</sup>

### （三）精進波羅蜜

精進之義在好讀佛書，上進不懈，不屈不撓，以求善法。出家為尼之公主，當亦知精進之道，而未出家者，亦多有好佛求精進者。北宋宗室家庭，不乏好佛之宗婦。譬如，太祖長子德昭（951-979）之第五子、太祖三世孫、永

<sup>107</sup> 王安石，《臨川文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99，〈長安縣太君王氏墓誌〉，頁 7b-8a。按：王安石於文末稱「兄安石為誌如此」，故知此為安石之妹。

<sup>108</sup> 秦觀，《淮海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36，〈蔡氏夫人行狀〉，頁 12b-14a；同卷，〈徐君主簿行狀〉，頁 10b-12b。按：徐君名不詳，成甫為其字。其家為高郵右族，「金錢邸第甲於一鄉」。

清節度觀察留後趙惟和（978-1013）之夫人馮氏（987-1053），喜誦浮屠書。其女五人，三女以疾廢，為比丘尼。<sup>109</sup> 太祖四世孫右監門衛將軍趙世智（生卒年不詳）夫人鄭氏（1036-1054），「為人孝謹節儉，喜誦浮圖書。」<sup>110</sup> 另一太祖四世孫右監門衛將軍趙世覃（生卒年不詳）夫人郭氏，「聰明孝謹，能讀書史，善書畫，喜浮圖之說。」<sup>111</sup> 左龍武衛大將軍信州團練使、延州觀察使安國公趙從古（生卒年不詳）夫人宋道柔（1004-1064），熟習「音律之法，詩書之言」，同時也「喜觀浮圖書」而「奉度儉節，無珠玉纂組之玩。」<sup>112</sup> 他的第四女，未及出嫁而於十五歲病卒，據說「天資端秀，異於群兒，性復穎悟，所學輒善，組訓餘力，尤好筆札。日事薰衮，誦金仙書，慕習其教。」<sup>113</sup>

其他宗婦好讀佛書而歸依佛教者亦多。譬如，右武衛大將軍康州團練使趙士競（生卒年不詳）之妻江氏（生卒年不詳），既深好佛書又悟苦空之理，與其夫志趣相似。她常「緝室異處，外世事、屏紛華，以清靜為樂。」<sup>114</sup> 宋宗室右監門衛大將軍趙叔羈（生卒年不詳）之妻翁氏（生卒年不詳），「柔婉明惠，知好佛書。」<sup>115</sup> 其同輩堂兄弟成州防禦使趙叔象（生卒年不詳）之妻胡

109 《歐陽修全集》之《居士集》，卷 2，〈雍國夫人馮氏墓志銘〉，頁 95。按：趙德昭因其叔太宗疑其謀反而自刎。

110 《歐陽修全集》之《居士集》，卷 2，〈右監門衛將軍夫人東陽縣君鄭氏墓志銘〉，頁 98。

111 《歐陽修全集》之《居士集》，卷 2，〈右監門衛將軍夫人武昌縣君郭氏墓志銘〉，頁 97-98。

112 王珪，《華陽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54，〈宗室延州觀察使夫人京兆郡宋氏墓誌銘〉，頁 12a-13b。

113 《樂全集》，卷 38，〈左龍武衛大將軍信州團練使安國公從古第四女道娘石記文〉，頁 35b。按：趙從古為太祖第四子德芳之孫，為德芳第三子趙惟能（979-1008）之長子。

114 同前書，卷 45，〈右武衛大將軍康州團練使妻安平縣君江氏墓誌銘〉，頁 15b-16b。按：太宗五世孫有「士」字輩者多人，趙士競當為太宗五世孫，唯其生平事迹不可考。

115 王安禮，《王魏公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7，〈宋宗室右監門率府率叔羈妻翁氏墓誌銘〉，頁 5ab。按：宋於東宮置右監門率府，率府率及副率。翁氏之夫應為魏王廷美之「叔」字輩曾玄孫。仁宗時，趙叔韶為率府右領軍衛將軍、文州刺史。《續資治通鑑長編》說：「叔韶嘗獻所著文，召試學士院入優等，特遷之。入謝，命坐賜茶，謂曰：『宗子好學無幾，爾獨以文章得進士第，前此蓋未有也。』」

氏（1049-1103），「晚喜釋氏，持誦不懈。」<sup>116</sup> 另一同輩堂兄弟濮州防禦使趙叔干（生卒年不詳）妻彭氏（1046-1103），「喜誦釋氏書，朝夕靡懈。」<sup>117</sup> 太祖六世孫右千牛衛趙子綸（生卒年不詳）娶駙馬都尉王誨（1048-1104？）之女為妻。王氏「居務簡儉，專誦釋氏書。」<sup>118</sup>

當然許多獻身佛教、端重自持之婦女是因孀居之後歸心釋氏、寄情佛書，但其精進之心，與生性好佛者時有過之而無不及。譬如宋宗室英國公趙惟憲（979-1016）之夫人和氏（992-1047），守寡三十餘年，病故時年方五十六歲。據張方平說，其夫捐館之後，和氏「晝哭過哀」。她常好文翰，通曉音律，但自此之後置之不問。但習稱未亡人，「誦貝葉書，奉金僊之教。」<sup>119</sup>

宗室右屯衛大將軍趙仲參（生卒年不詳）之妻楊氏（1041-1090），十六歲即出嫁，與其夫相敬如賓，事舅姑以孝聞。年方二十，其夫即逝。楊氏甫孀居，其母憫其孤兒寡母，欲奪其志而為婚嫁。楊氏泣而不許。此後「屏簪珥、斥鉛華，衣服無文采，晨起掃一室，薰潔誦佛書。柔日必齋素，孀居三十年，終老而不厭」，充分表現持戒與精進之力。更可貴者，楊氏修行佛教，並不忘教其釋兒讀書，而且還為他們晝誦夜講，遇有日課稍怠者，必「嚴顏色而訓之。」<sup>120</sup>

士族家庭之婦女，歸心釋氏者較宗室家庭為多。她們不乏也在寡居之後信佛者，但多仍與子女同居，盡其為婦為母之道，鮮有削髮為尼，或逃避家庭之

---

朕欲天下知屬籍有賢者，宜勿忘所學。」叔韶頓首謝。既退，又出九經賜之。後以圖書賜正刺史已上，叔韶不當得，獨賜及之。叔韶，德恭之曾孫也，會要以叔韶為宗室召試之始。」見《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166，頁 4001。趙叔韶是趙廷美長子趙德恭（962-1006）之曾孫，為最傑出宗室之一，能以文章詩賦得進士。趙叔韶與叔韶為同輩，但不詳為廷美諸子中之何支。

116 《摛文堂集》，卷 14，〈義和郡君胡氏墓志銘〉，頁 24ab。

117 《摛文堂集》，卷 14，〈故德安縣君彭氏墓志銘〉，頁 21a-22b。

118 尹洙，《河南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48，〈右千牛衛將軍妻仙源縣君王氏墓志銘〉，頁 6b-7a。

119 同前書，卷 38，〈徐國太夫人墓誌銘〉，頁 19b。按：趙惟憲為太祖第四子趙德芳（959-981）之次子。

120 同前書，卷 51，〈右屯衛大將軍妻吉安縣君楊氏墓誌銘〉，頁 15b-17b。按：趙仲參為太宗玄孫，生平事迹無可考。

舉。她們寄情佛書，往往通達佛理，即或理解不深，也仍表現精進之態度。

太宗朝澧州錄參軍贈太常博士劉延宇（生卒年不詳）夫人、真宗朝直集賢院劉隲（生卒年不詳）母親趙氏（914-1005），於其夫死後，誓志撫養諸孤，雖四壁蕭然，但「躬機杼以給伏臘」，十五年內將子女撫養成人。她雖「家世儒素」，但「雅性奉佛，深通內典。女工之暇，唯誦金言。寡居以來，殆廢膏沐。」<sup>121</sup> 可見她不僅虔誠奉佛，而且深通內典。

真宗朝宰相章得象（978-1048）之父無祿早逝，母親張氏（952-1032）「茹未亡之痛，教忠勉學，更繫慈壺」，而「其咨訓圖史，審音徽越，組紉箴解之細，鮮麟筆涪之法，莫不造詣精極，垂為家範」，是個天資甚高，手藝甚工，烹調藝術亦精之婦女。她也「早探釋部，居常薰苴，高情了識，絕死生之怖」，<sup>122</sup> 不僅表現精進之誠，而且充滿佛慧。

仁宗朝司封郎中孫錫（991-1068）之妻莊氏（990-1039），為元豐朝翰林學士之孫洙（1031-1079）之母，她「性好佛書，讀之能通其義。」據說孫洙之兄弟孫泳（生卒年不詳），「嘗病啗不能言，醫治萬方不愈」，而莊氏為他齋菹心禱〔禱？〕，仰天祝而呼之，孫泳遂「應聲能言。」<sup>123</sup> 此事雖涉神異，有誇張莊氏信佛效益之嫌，但同時也說明莊氏精進之表現。

仁宗景祐朝刑部郎中直昭文館陳貫（968-1039）之妻李氏（995-1038），出身世家，為丞相李迪之妹。她「通釋氏書，性慈恕，不妄語言。」<sup>124</sup> 大理寺丞費文（生卒年不詳）之妻魏氏（995-1074），「好佛書，知緣報大略，特加崇信。」<sup>125</sup>

仁宗景祐時，曾知明州、衢州和湖州等地的名詩人鮑當（景德二年進士）

<sup>121</sup> 楊億，《武夷新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8，〈劉氏太夫人天水縣太君趙氏墓碣銘〉，頁 23a-26a。按：楊億與劉隲同修起居注，交情不錯，故為其母撰銘。

<sup>122</sup> 《景文集》，卷 60，〈故贈太師章公夫人追封鄧國太夫人張氏墓誌銘〉，頁 20a-25a。

<sup>123</sup> 《彭城集》，卷 39，〈孫氏母莊夫人墓碣并銘〉，頁 514-15。

<sup>124</sup> 《河南集》，卷 14，〈故永安縣君李氏墓誌銘并序〉，頁 3a-4b；卷 14，〈故朝散大夫尚書刑部郎中直昭文館上柱國賜紫金魚袋陳公墓誌銘并序〉，頁 10b-14a。

<sup>125</sup> 呂陶，《淨德集》，《叢書集成新編》本，卷 27，〈仁壽縣太君魏氏墓誌銘〉，頁 292-93。

之妻陳氏（983-1056），好讀古史，能疾書，每日草書萬餘字，而見者不知其為婦人之筆札。陳氏以節儉自律，衣珥皆守舊法，不因時之好尚而改易。平居常服大疏袍，每日僅食一盂飯，「誦浮圖書，用此終身。」<sup>126</sup>

職方員外郎孫准（生卒年不詳）之妻許氏（1001-1072），為佛教外護、兵部郎中許式（生卒年不詳）之女。她「雅好事佛，有所祈輒若有物告之。」沈括為她作墓誌銘，說「其行足以有所感，且然歟？」似有讚其事佛甚謹之意。<sup>127</sup>

國子監丞葛寔（嘉祐元年卒）之妻尹氏（1002-1061），雖其夫久試不第，但未嘗戚戚，「觀世之休悴，初不經慮，益喜浮屠書，頗知其指歸。」<sup>128</sup> 比部郎中王荀龍（生卒年不詳）之夫人趙氏（1019-1079），「平居寡笑語，御家有法，事至雖煩而徐應之必申理。日誦佛書以為常。性寬而正，故人或以欺而不能以妄說之也。」<sup>129</sup>

蘇頌（1020-1101）之長妹（1031-1072），先嫁給亳州司法呂昌緒（生卒年不詳），三年後夫死守寡。後又嫁穎州萬壽縣令張斯立，七年後又寡。乃回歸其母家，除每日侍候家人膳食外，居處皆以其夫之未亡人自處，不復接外事，「惟閉閣冥心誦佛書而已」，即使親戚間，亦少有見其面者，充分表現潛心嚮佛、精進佛法之志。<sup>130</sup> 據蘇頌之孫蘇象先說，蘇頌重視釋氏《四十二章經》，又喜禪宗，與達觀曇穎（989-1060）相交尤契，或有可能影響其家人、子孫。下文所說之蘇悌，是蘇象先之兄弟，而其夫人空室道人，為禪林女傑。蘇象先之女即本文下篇無著禪師妙總（1095-1170），為蘇頌之曾孫女，應稱空室道人為叔母或伯母。<sup>131</sup>

<sup>126</sup> 鄭獬，《郎溪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22，〈職方郎中鮑公夫人陳氏墓誌銘〉，頁 8b-9b。

<sup>127</sup> 沈括，《長興集》，《四部叢刊》之《沈氏三先生文集》本，卷 27，〈萬年縣君許氏夫人墓誌銘〉，頁 5b-7b。

<sup>128</sup> 《蔡忠惠集》，卷 39，〈尹夫人墓誌銘〉，頁 723-24。

<sup>129</sup> 同前書，卷 14，〈仁壽趙夫人墓誌銘〉，頁 303-05。

<sup>130</sup> 蘇頌，《蘇魏公文集》，卷 62，〈萬壽縣令張君夫人墓志銘〉，頁 951-52。

<sup>131</sup> 有關蘇頌喜禪宗之記載，見其孫蘇象先之《魏公譚訓》（附於前引《蘇魏公文集》後），頁 1170。又無著禪師妙總為蘇象先之女，當為蘇頌之曾孫女，諸禪史除《佛祖歷代通載》外，《大正藏》冊 49，第 2036 號，頁 700b7-8，皆誤為蘇頌孫

越州山陰望族傅璟（生卒年不詳）之父，因其族蕃衍日大而以不足于養為憂，遂買廢田數百頃於童山以種稻，又得浪港廢塘數百畝以養芻葷，由其庶夫人周氏（1006-1070）主之。周氏與其夫謀畫經營，十之三四，都出其意，且不久即告生事就緒，歲有餘入，使其夫無內顧之憂。慶曆與皇祐之間，其夫及嫡夫人相繼去世，周氏仍居山中十餘年，至白首而歸家，其後「謝去生事，而誦浮圖之書以永日。」<sup>132</sup>

殿中丞錢緯（生卒年不詳）之妻高氏（1001-1095），喜讀書，通音律。她不但好卹孤貧，樂施與，而常不問有無餘貲。她深信佛法，「平生誦佛書，不一日輟也。」<sup>133</sup>

長沙李竦（生卒年不詳）之妻杜氏（1019-1098），出身貴家，其父杜杞（1005-1050）於仁宗朝任天章閣待制，號為名臣。李竦雖曾屢使諸部，且於神宗時任職方員外郎權發遣梓州路轉運副使，但因無所附麗，終不能大顯於世。他家貧不治生事，都是靠杜氏「均節其有無以濟。」李竦死後，杜氏寡居不再嫁，「乃歸心於佛，奉其教，讀其書，若有所得焉。」<sup>134</sup>

仁宗朝太常少卿鮑軻（生卒年不詳）之女，尚書屯田郎中侯（生卒年不詳）正臣之妻鮑氏（1024-1092），「晚年自奉益簡儉，視世味甚薄。每晨興，惟誦佛書，雖久弗懈。病且革，合掌焚香，稱諸佛名號乃卒。」<sup>135</sup>

神宗朝永興軍乾祐縣令姚奭（生卒年不詳）妻李氏（1023-1069），以節儉自處，不因資用之不足而有難色。她「晚年篤信事佛，終日齋居，焚香誦其

---

女。前引“Images of Women in Ch'an Buddhist Literature”一文亦沿其誤，而視空室道人為妙總之嫂，見該文頁 158。

<sup>132</sup> 《陶山集》，卷 16，〈周氏夫人行狀〉，頁 15a-16a。按：傅璟之父當非傅珪（1016-1096）。有關傅珪，見卷 14，〈傅府君墓志銘〉，頁 16a-18a。《宋人傳記資料索引》（頁 2981）「傅珪」條誤周氏為傅珪之繼母。其實，傅珪有夫人錢氏，亦有繼室周氏，死於其前。而傅璟之父有嫡夫人孫氏，及庶夫人周氏，死於其後。

<sup>133</sup> 王瑜，〈宋故殿中丞錢君夫人壽昌縣君高氏墓誌銘〉，見《全宋文》冊 50，頁 326-27。

<sup>134</sup> 張耒，《張耒集》，〈福昌縣君墓誌銘〉，頁 886-87。

<sup>135</sup> 《陶山集》，卷 16，〈鮑氏夫人墓誌銘〉，頁 2b-4a。

書，頗得清靜之旨。故專意淡泊，益厭浮華紛麗也。」<sup>136</sup>

汀州寧化縣主簿俞備之妻陳氏（1024-1083），自少奉佛，中年益篤，多不茹葷，而持誦終日，與人無忤。她見善如不及，於親屬之意趣不同者，皆能和會之，得其歡心。終能棄緣而歸，於家人團聚之間，「笑聲既闌，酒杯未乾」，委然順化，長寐不覺。<sup>137</sup>

哲宗朝通直郎檀宗益（生卒年不詳）之母樂氏（1020-1093），年二十二歸建德（今杭州建德縣）檀某，事舅姑及夫，恭順勤儉，接內外宗族，敬而有禮。夫死之後，獨力奉養舅姑，撫養諸子甚嚴，而誨勉必於文學，故諸子皆不失為善士。她「平居好誦佛經，於物無所玩，於財無所蓄，有淑行、有令名，母之賢德，久而益著。」<sup>138</sup>

仁宗朝觀文殿學士張觀（大中祥符七年狀元）之媳、尚書職方員外郎贈左正議大夫張仲莊（生卒年不詳）之妻王氏（1025-1091），「少好內教，老而彌篤。晨起具服焚香誦佛書，視外物翛然。」雖然如此，她侍奉翁姑，動循法度，深為張觀所讚賞，以為其家「有婦如此，可以無慮矣！」<sup>139</sup>

哲宗朝，朝散郎知成州李旻（1035-1093）之妻趙氏（1035-1110），嫠居二十年，「誦佛書精進不倦」。後得疾，告諸媳曰：「火風將息，吾何以逃？」以其嫁時奩篋中物遺子孫，翌日終於正寢。<sup>140</sup>約在同時，淮南節度推官知州上饒縣事李介夫（生卒年不詳）之繼室吳（1035-1084），少從其祖母曾氏習詩書，故通文字，「尤喜讀佛書及唐人歌詩。」<sup>141</sup>

朝議大夫郭瑑之妻周氏（1040-1113），「日誦佛書常數十百過。」四十餘歲喪夫後，孀居至七十四歲而終。她臨終前，自感壽至古稀之年，且較其夫多

---

<sup>136</sup> 姚輝，〈宋故度支郎中姚府君夫人崇德縣君李氏墓誌銘並序〉，見《全宋文》冊46，頁282。

<sup>137</sup> 《演山集》，卷33，〈夫人陳氏墓誌銘〉，頁11b-13b。

<sup>138</sup> 《古今圖書集成》，〈閩媛典〉，卷24，〈檀婦樂氏〉，頁8-9，引《建德縣志》。

<sup>139</sup> 同前書，卷42，〈壽昌縣太君王氏墓誌銘〉，頁11a-13a。

<sup>140</sup> 李昭玘，《樂靜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28，〈逢萊縣君趙氏墓志銘〉，頁13a-15a。

<sup>141</sup> 《孔武仲文集》，〈吳氏夫人墓誌銘〉，在《清江三孔集》，頁308。

活一紀，深覺死無遺憾，「猶誦佛經以歿」。<sup>142</sup> 其精進之心，比之寺院僧侶，毫無遜色。

蘇軾的侍妾王朝雲（生卒年不詳），常從比丘尼義沖學佛法，據說也「粗識大意」。她臨死前，「誦《金剛經》四句偈以絕」。此四句偈即是《金剛經》所說的：「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因作如是觀。」所以蘇軾為她寫墓誌銘，有此數句：「浮屠是瞻，伽藍是依，如汝宿心，惟佛之歸。」點出佛法為是朝雲「宿心」之所寄。<sup>143</sup>

汪穀長孫、汪藻姪兒、知全州汪愷（1071-1142）之母王文（1051-1124），自其夫歿後，即致家政於其媳婦，而「終日晏坐，誦佛書，求出世間法，雖寒暑不置。」<sup>144</sup> 其專意於佛法之態度，為精進波羅蜜之充分表現。

紹聖中，丹陽進士吳磐（生卒年不詳）之夫人穆氏（?-1095），婚後七年，其夫即歿，穆氏年方二十八歲，雖夫家或有勸其再嫁者，穆氏拒之，遂「屏嫺黨不接」，並「日夜誦佛書，躬箴縷以杜外事。」她於誦佛書之外，獨力教養其子吳敏修（生卒年不詳），凡所得異書典籍，含陰陽術數之類，無不教授其子，故吳敏修遂以好文修潔稱於四方。<sup>145</sup>

徽宗朝，徽州新安郡處士崔光弼（生卒年不詳）之妻、汪藻之岳母吳氏（1058-1114），自少受其父吳瀚（生卒年不詳）之教，即工詩書又善筆墨、女工，人皆爭聘之。後歸崔光弼，助成家業。其夫仕途不順，而諸子就學困難，亦皆吳氏辛勞維持。她「晚喜釋氏書，薰苾精甚，或日一食，門內之治，絕不經意。間用聲樂自娛，若淡然于世無情者。」她盡心佛法，寡居七年後告終，求仁得仁。<sup>146</sup>

<sup>142</sup> 程俱，《北山小集》，《四部叢刊續編》本，卷 31，〈朝議大夫郭公宜人周氏墓誌銘〉，頁 11a-13b。

<sup>143</sup> 《蘇軾文集》，卷 15，〈朝雲墓誌銘〉，頁 473-74。關於朝雲之死及東坡之心情，參看黃啟方，《東坡的心靈世界》，頁 21，51-52。

<sup>144</sup> 《浮溪集》，卷 28，〈安人王氏墓誌銘〉，頁 16b-18b。

<sup>145</sup> 《雞肋集》，卷 65，〈穆氏墓志銘〉，2b-4b。

<sup>146</sup> 《浮溪集》，卷 28，〈吳夫人墓誌銘〉，頁 16b-18a。按：宋·祝穆，《方輿勝覽》，卷 16，錄有新安郡，屬徽州，見頁 82。

以上諸位婦女，或在婚嫁之前，或在寡居之後，或在晚年，其親近佛法，雖動機不一，但焚香誦經、專意念佛所表現之虔誠與精進，大致未因不同年齡階段或人生經驗有異，唯所得所悟互有差別，當是相當明顯的。至於其親近佛法時間的長短，往往與家庭之風氣有關。譬如家有長者信佛，則子女親戚自易受濡染而信嚮，而演成一門數位婦女都尚釋氏之書，精進佛法之情況。譬如，韓億（972-1044）之繼室王氏（984-1027），為宰相文正公王旦之長女。王旦以奉佛知名，其女「性本閒約，所衣不過綈紵，經歲未嘗有所更製。」生活甚為節儉，而「晚節尤以清澹自樂，日誦浮屠氏書」，與其妹、即上文蘇耆之妻相似。<sup>147</sup> 韓億之第三子參知政事韓絳（1012-1088）之妻范氏（1015-1067），為范質之曾孫女。韓絳以流言中傷去官，罷知蔡州，范氏在蔡州得疾，後「乃著道士服，讀釋老書，盡以服玩施浮圖氏，家事總綱領而已。」<sup>148</sup> 韓絳之弟刑部郎中韓鎮（1019-1097）之妻程氏（1020-1068），與其姑、嫂一樣，也「喜誦佛書，一志不怠，凡有血氣之類，未嘗身踐也。」<sup>149</sup> 韓絳之另一位弟婦，即上文所說的韓絳妻范氏，和其兄韓綜之媳、韓宗道之妻聶氏，也都信佛。一門數位婦女，或姑媳、或娣姒，都好讀佛書，兼行布施之道，似乎聲氣相通，志同道合。

這種一門數位女性信佛之例不少，上文所說之陸佃母親邊氏，「平居自奉儉薄，不服犀玉珠貝之飾。日常焚香誦經，持念諸佛名號，數珠為屢絕。」<sup>150</sup> 其祖母吳氏，即是上文所說與其夫陸軫於道、佛各有所好者。陸軫學道鍊丹辟穀，而吳氏則學佛，每於雞初鳴，則起誦經，至日旰乃已。陸佃之伯母王文慧，亦即陸琪之妻，與其姑吳氏感情甚深，其「為家有統紀，執術不煩，薰然孝慈，而衆行從之，故其卒也側臥而蛻，如佛所謂吉祥睡者」，似乎也是學佛

---

147 《蘇學士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15，〈太原郡太君王氏墓誌〉，頁 1a-3b。

148 《彭城集》，卷 39，〈樂安郡君范氏墓誌銘〉，頁 512-13。

149 同前書，卷 39，〈韓刑部妻程氏墓誌銘〉，頁 516-17。

150 《陶山集》，卷 16，〈邊氏夫人行狀〉，頁 16a-18b；卷 15，〈仁壽縣太君吳氏墓志銘〉，頁 13a-14b。

之效。<sup>151</sup> 陸佃之嫂，朝奉大夫陸佖之繼室吳氏（1038-1101）也學佛，陸佃說她臨死時，「如寓得歸，脫然就駕，蓋學佛之力然。」<sup>152</sup>

又有家世信佛之婦女，於佛法特別精進。工部侍郎葛宮（992-1072）之妻孫氏（996-1055），持生簡約，使其夫能專意公事而無後顧之憂，是個賢內助。她「喜誦浮圖書，將終，遺戒薄葬祭之具，神情如平生，無有悲怛。」<sup>153</sup> 1978年後江陰考古發現的葛氏家族墓群，有孫氏（四娘子）之墓，墓中保存有許多佛經，含木版雕印之《觀音經》一卷及《金光明經》一部四卷。後者每卷卷尾都有墨書「孫氏女弟子經」六字。又有《金剛經》一卷，卷尾有墨書題記曰：「瑞昌縣君孫氏四娘子僅捨淨財權贖此經，永世供養。至和元年十一月。」這都可為孫氏之崇佛提供佐證。<sup>154</sup> 其實葛氏家族信佛者不乏其人，譬如葛宮之叔祖葛誘（942-？）年七十二歲時，以將仕郎江陰軍助教之身份發心雕印《觀音經》一藏五千四百卷，以「穰災集福」，並「普勸十方信士，同結殊〔緣〕。」孫氏墓中所存之《觀音經》，即因此而來。又如，葛宮之姪女、中大夫京西轉運副使徐安道（生卒年不詳）之妻葛氏（1045-1117），也「崇信釋氏，日課其書，且奉其齋戒。」逢其親人之忌日，必「日蔬食閱經以資其福，盡齒不懈。」而死時，「屬纊不亂，呼子與婦，執其手曰：『吾訣矣』，泊然而瞑。」<sup>155</sup> 葛宮之姪兒、自號虛遊子的朝奉郎致仕葛書思（1032-1104），平生「篤信釋氏，奉其戒律，晨興香火，持誦不輟。」其父草堂逸老通議大夫致仕葛密（葛宮弟）捐館之後，他「日誦大藏經以追冥福。」<sup>156</sup> 葛宮姪孫、葛書思之子太中大夫葛次仲（1063-1121），「晚節尤信內典，日課般若，泊屬纊，

<sup>151</sup> 同前書，卷 15，〈王氏夫人墓志銘〉，頁 14b-15b。

<sup>152</sup> 同前書，卷 15，〈會稽縣君吳氏墓誌銘〉，頁 12b-13a。

<sup>153</sup> 蔡襄，《蔡忠惠集》，卷 39，〈瑞昌縣君孫氏墓誌銘〉，頁 707-08。

<sup>154</sup> 參看朱瑞熙，〈一個常盛不衰的官僚家族：宋代江陰葛氏家族初探〉，在《中國近世家族與社會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111-137。關於葛宮之生平事迹，亦見該文。

<sup>155</sup> 《丹陽集》，卷 14，〈徐太令人葛氏墓誌銘〉，頁 19a-20b。按：「同結殊」後有缺字，疑為「緣」。

<sup>156</sup> 同前書，卷 15，〈朝奉郎葛公行狀〉，頁 1a-9a。

神爽不亂。」<sup>157</sup> 葛次仲之弟，即上文所說之葛勝仲，「尤喜釋氏書，調與吾儒同道。究其奧旨，每宴坐，凝然終日，或至夜分不寐。」他嘗為〈觀音讚〉，文行於世。他在元祐五年（1090）十九歲，奉其父至開封任官時，丁內艱而嘗誦萬壽經藏。崇寧三年（1104）又居父喪，「終喪未嘗飲酒茹葷，居苦廬、閱釋氏所謂大藏經者，盡其卷帙。」重和元年（1118），他再閱大藏，為其父母追福。也就是因閱讀藏經，故所著述多闡明佛理。譬如，他有〈誦金剛經滿二藏偶作〉一詩，中有「我誦大智度，非疾無日空」、「凡諸有為法，實如幻泡夢」、「妙理端會心，筌蹄那復用」之句，說明他對般若大智、諸法性空、萬法唯心之理會。〈次韻工部兄除夕見寄三首〉有「麥秋時節搖歸棹〔棹〕，禪榻相從話苦空」，說明他喜禪悅，好談苦空之理。又有「晚持禪悅惟三白，曉簇春盤又五辛」、「淡飯且安禪悅食，儲錢更買奇礪石」之句，說明他雖奉佛茹素，志於禪修，平日粗茶淡飯，以「三白食」度日，但每逢年節，並不避食五辛。葛勝仲臨終之夕，數聞異香，「索水盥手，合爪掌跏趺，端坐久之，乃北首右脅而卧，薨於正寢。」行狀作者以為「合夫釋典所為如來涅槃相者。」<sup>158</sup> 其妻張濩信佛至篤，未嘗不是氏家族多人奉佛之影響。

又吳越武肅王錢鏐後人及姻親，亦多信佛者。神宗朝寶文閣待制錢暄（1018-1085），為前吳越王錢俶（929-988）之孫、仁宗朝樞密使特贈侍中錢惟演（962-1034）之第三子。其妻胡氏（1015-1090），篤信釋氏，晚年「深究性理，惡殺生，未嘗鮮食。」臨終之日，方晝寢，忽告左右將其扶起，遂「正坐，奄然而化。」<sup>159</sup> 神宗朝任德化縣尉清逸居士潘興嗣之妻錢氏（1026-1072）為吳越王之後。年及笄而歸潘興嗣。潘得官不赴，其妻同其志而不慕榮華。事姑教子之餘，「因讀佛書，默然有解。」楊傑說她「生死之際，脫然不

<sup>157</sup> 同前書，卷 15，〈太中大夫大司成葛公行狀〉，頁 9a-13b。

<sup>158</sup> 以上見《丹陽集》，卷 24，〈文康葛公行狀〉，頁 1a-19a；卷 16，〈誦金剛經滿二歲偶作〉，頁 11b；卷 10，〈題佛本行經〉，頁 6a；卷 20，〈次韻工部兄除夕見寄三首〉，頁 11ab；卷 18，〈道祖見和復賦一首〉，頁 26b-27a。按：「三白」係對「五辛」而言。佛家指乳、酪、白米為「三白食」。

<sup>159</sup> 《范太史集》，卷 42，〈安康郡太夫人胡氏墓志銘〉，頁 1a-4b。按：錢暄為仁宗時樞密使錢惟演（962-1034）之子。

疑。」<sup>160</sup> 潘興嗣自己曾問道於黃龍慧南（1002-1069），獲其印可。嘗曰：「我清世之逸民」，故自號清逸居士。隱居豫章東湖上，以琴書自娛，顯然與妻子都崇佛法。又朝散郎張升卿（生卒年不詳）之妻錢氏（1030-1081），為前吳越王錢俛（錢俶之兄）之子錢易之孫女、錢彥遠（994-1050）之女，為「相夫教子」之典型。蘇頌描述她婚後之行事，在持家方面，「其主饋也，內肅閨門，外奉賓祭。」而其夫起初官資微薄，她則「躬率節儉以周其乏，無少慊者。」在教子方面，她「手繕經籍而授大義，漸勸誘導，至於成人。」她為人「內恕而外通，平生未嘗有疾言大色。」其夫因事奪官罷免，親友皆駭異而不知所措，但錢氏處之泰然，不改常時，間與母親相見，也是「惟談內典，論性理，相顧怡然。」據說她重病時，母親為她和湯藥，她內不自安，遂「潔誠精禱於浮屠曰：『蕞爾之驅（軀？），死不足吝，故念一旦先沒，必貽親累。願稽延歲月以盡太夫人餘年，則瞑目無憾矣。』」結果病癒。後幾年，得其母疾報，即涕泣料理家事，整然有序。蘇頌說她「因閱曹溪《壇經》，忽若有省，悉召家人輩語之曰：『是不堅體，妄幻非實。』家人輩竊怪其語不類，未幾訃至。」<sup>161</sup> 錢氏深信佛教，能論性理，又讀《六祖壇經》有省，知生死之幻妄非實，可謂深入佛理。

北宋末學者方淇（1051-1100）與其夫人錢氏（1048-1110）皆好佛。錢氏為吳越國王錢武肅王六世孫錢育（生卒年不詳）之女。錢氏既歸其夫，眾皆以為夫婦之關係「雖琴之與瑟，黃鳥之與灌木不足以喻其和也。」方淇「善佛學，悟性理」。而錢氏則自出己財以施於所居處之數十梵剎。方淇死後，錢氏哀毀過度，日夜號哭無絕聲，次年即病故。她臨死之前，語其子所患之疾非藥石所能治，勿再延醫，「莫若做佛事以資我正念。」<sup>162</sup>

另一錢氏（1068-1126）為武肅王之五世孫錢承（生卒年不詳）之女。她十八歲歸吳越同鄉鄭絳（生卒年不詳）。鄭絳後仕至尚書吏部員外郎，因一意

<sup>160</sup> 楊傑，《無為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14，〈故錢夫人墓誌銘〉，頁 8b-9a。

<sup>161</sup> 《蘇魏公文集》，卷 62，〈彭城縣君錢氏墓志銘〉，頁 952-54。

<sup>162</sup> 清·楊亨泰，《慈溪縣志》，卷 50，〈方府君并夫人墓誌銘〉，頁 11a-12b。按：原文「佛事」前有缺字，疑為「做」。

公事，二子之就學、教養皆錢氏為之張羅。她治家以勤儉為本，積累為功，而所經畫皆中理，故鄭絳未嘗過問。鄭絳捐館之後，二子亦已出仕，錢氏每以其夫為吏之施設教其二子，對家事則益加整飭，故其家小大肅離無敢怠慢。她家事之暇，「日誦佛書有常課，已則蕭然危坐。」並時以古詩授諸孫，或閱讀圖史，而略知其大旨。<sup>163</sup>

以上韓氏、陸氏、葛氏及錢氏家族成員多人信奉釋氏，可以說是入宋以來逐漸形成的「佛教家庭」之代表。

宋以來，西方淨土信仰日盛，念佛者多念阿彌陀佛，或誦觀音名號，修西方淨土。婦女信西方之說者甚多，上文已略有所述，今再舉數例，作為精進波羅蜜之證。

仁宗朝樞密副使胡宿（996-1067）之母李氏（969-1043），歸心釋氏，深信淨土。胡宿說她「持禮由于繩墨，用心過於丹青。黎明以興，盛服而坐。習知四諦之苦，歸信一乘之法。神珠百餘，誦觀音名號，持《般若心經》，像前焚香。」據說她臨終時，「神色如常，初不怛化。顧視諸子」，並以手握胡宿之臂良久，然後合掌加額曰：「願汝無忘善性！」諸子以有為之法，乞營佛事，頷而許之，言訖而終。<sup>164</sup> 李氏既數珠稱觀音名號之，又持《心經》於觀音像前焚香，其堅信淨土之誠，充分表現無遺。或許是李氏之影響，胡宿亦與浮屠遊，而其女及孫女都深信佛教。<sup>165</sup> 其女為蔡祥（生卒年不詳）之母（生卒年不詳），「好佛言，棄其生平所樂而學之。」據說因此而「能忘喜愠，視生事泊如，臥而不夢者十有七年以卒。」<sup>166</sup> 其孫女即是下文所述李之儀妻胡文柔。

興國軍（在江州）錄事參軍李處道（治平四年進士）之繼室龔氏，擅文學，讀書通大義，賦詩、書字皆過人。晚年事佛，誦《蓮經》皆千遍。據龔氏姪孫五休居士龔明之（1091-1182）說，她嘗問法於圓照禪師，但龔明之未說

<sup>163</sup> 《北山小集》，卷 32，〈宋故尚書吏部員外郎鄭公安人錢氏墓誌銘〉，頁 2b-4b。

<sup>164</sup> 胡宿，《文恭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40，〈李太夫人行狀〉，頁 12a-14a。

<sup>165</sup> 《歐陽修全集》之《居士集》，卷 2，〈贈太子太傅胡公墓誌〉，頁 77-79。按：胡宿之父凡三娶，李氏為第三任妻子，胡宿為其次子。

<sup>166</sup> 《長興集》，卷 26，〈蔡孝廉母胡氏墓誌銘〉，頁 4a-5a。按：蔡祥生平事迹不詳，只知為沈括友。

明此圓照禪師究係何人。根據張耒（1054-1114）所撰墓誌銘，李處道曾任姑蘇學官，時間當在治平間中進士之後，正逢雲門宗禪師圓照宗本（1020-1099）住蘇州瑞光寺而而聲名正盛之時，故龔氏所參之圓照禪師，可能即是圓照宗本。李處道年高而宦不達，龔氏頗能安之，不愧圓照禪師賜名「守安」之初意。她年幾七十先其夫二年而卒。得疾之時，「即屏藥餌，書《佛頂呪》，焚灰、丸之」，並以「燃燈法」授其子李援（生卒年不詳）曰：「我死，置灰丸懷中，燃燈如法也。」遂起坐，誦大士名號，久之而化。小殮之時，其手指屈結皆成印相，佛徒歎服，以為不可及。<sup>167</sup> 此《佛頂呪》即是《大佛頂陀羅尼楞嚴呪》，根據《首楞嚴經》所說，「有能自誦若教他誦〔此呪〕，當知如是誦持眾生，火不能燒、水不能溺、大毒小毒所不能害，如是乃至龍天鬼神、精祇魔魅，所有惡呪，皆不能著心得正受。一切呪咀、魘蟲、毒藥、金毒、銀毒、草木蟲蛇、萬物毒氣，入此人口成甘露味。」<sup>168</sup> 龔氏可能讀《首楞嚴經》而信《佛頂呪》之功，但書此呪後焚成灰丸，令死後置於懷中，卻誦觀音大士之名號而坐化，則寓意不明。不管如何，龔氏之盡心佛事，確非常人可及。

哲宗朝國子博士、後山居士陳師道之母龐氏，是仁宗朝宰相龐籍之女。龐氏「晚奉釋氏，修淨土行，後獲疾，「自疾至臥，必西向，病不知人，誦彌陀不絕」，顯然深信彌陀。<sup>169</sup> 陳之摯友晁補之描述其「往生」情況時，說她將逝之際，「西向臥，諷彌陀不絕口。」<sup>170</sup> 晁補之母楊氏，也修西方淨土，故陳師道為她寫輓詞有「百年積慶鍾連璧，十念收功到淨方」之句。<sup>171</sup> 晁補之

167 龔明之，《中吳記聞》，《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4，〈祖姑教子登科〉，頁 13b-14a；《姑蘇志》，《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57，頁 31a。張耒有〈李參軍墓誌銘〉，敘李處道事迹甚詳，墓誌中說處道先娶林氏，龔氏為其繼室。有三子，李援為其第三子。見《張耒集》，卷 60，頁 883-84。按：關於圓照宗本入蘇州時間，見《禪林僧寶傳》，〈慧林圓照本禪師〉，頁 500ab。關於龔明之與其先人之信仰，鄧小南在其〈龔明之與宋代蘇州的龔氏家族〉一文中，稍有述及。該文收於《中國近世家與社會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81-109，尤其頁 91-92。

168 《大佛頂首楞嚴經》，《大正藏》冊 19，第 945 號，頁 137a。

169 陳師道，《後山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16，〈先夫人行狀〉，頁 20a-22b。

170 《雞肋集》，卷 64，〈安康郡君龐氏墓誌銘〉，頁 19a-20b。

171 陳師道，《後山詩註》，《四部叢刊》，卷 6，〈楊夫人挽詞〉，頁 13b。

自己平生於書無所不窺，少即好讀莊老之書，而自以為未至，乃學於佛，求之於其心而有所得。其母（即上文晁端友之妻楊氏）死後，補之為修水陸供於金山，並受《大寶篋陀羅尼經》於真覺長老志添（生卒年不詳），交其妹婿臨江軍錄事參軍陳琦書寫，命工刊印，以為父母俱亡者作為敬奉供養之用。<sup>172</sup>

哲宗之皇叔荆王趙頴（1056-1088）夫人王氏，歸依無量壽佛，潛心西方淨業。隨緣居士黃策（1070-1132）說她不僅嚴事西方，最精恪端潔，不捨晝夜。而且要求給侍奔走之人，皆隨其深信，勿有異念。荆王之妾，懈慢不勤，夫人訓示之曰：「我盡室皆勤，唯爾怠墮，不從人告，幻惑在會，恐失道心，不可在吾左右也。」其妾悚悟悲悔，精進思惟，淨念相繼。久之，謂同事之妾曰：「吾其行矣！」遂無疾而終，而一夕異香遍室。同事之妾遂告夫人言，昨夜夢化去之妾，託致起居云：「夫人訓責我勤修西方，今獲往生感德無量。」後王氏於其生日，秉爐爇香，望觀音閣而立，子孫左右方具獻壽之儀，而王氏則已立化。<sup>173</sup> 此種嚴行淨業，歸心彌陀，臨終坐化或立化，常為宋以來淨土信仰者大事宣揚為淨土信仰之果報。

最值得注意的是歐陽修第二位繼室薛夫人（1017-1089）之信佛。據葉夢得（1077-1148）說，他在汝陰訪歐陽修三子歐陽棐（1047-1113）時，方入其門，即聞「歌唄鐘磬聲，自堂而發。」隨即見歐陽棐手持數珠，諷佛名而出，並對葉夢得表示歉意，說其府上正逢齋日，與家人共為佛事。並說，歐陽修生時，其夫人薛氏已如此，歐陽修並未禁之。及其死後，薛夫人更率全家，無論尊卑悉行諷誦之事。葉夢得此說，直接得自歐陽棐，應為實錄。可見歐陽修雖視「佛為中國大患」，認為「千年佛老賊中國，禍福依憑羣黨惡」，並抨擊佛教不遺餘力，但對其夫人之持數珠、誦佛名、設齋做佛事，亦不置喙，乃至葉夢得有此一說：「歐陽氏子孫奉釋氏甚眾，往往尤嚴於它士大夫家。」<sup>174</sup>

<sup>172</sup> 《張耒集》，卷 61，〈晁無咎墓志銘〉，頁 900-03；《雞肋集》，卷 70，〈題大寶篋經後〉，頁 8b-9b。

<sup>173</sup> 《樂邦文類》，《大正藏》冊 47，第 1969 號，卷 3，〈荆王越國夫人往生記〉，頁 189c-190a；《龍舒淨土文》，《大正藏》冊 47，第 1970 號，卷 6，〈宋荆王夫人〉，頁 269ab。

<sup>174</sup> 見《石林避暑錄話》，《宋元人說部叢書》本，卷 1，頁 6b-7a。按：歐陽修元配胥

其他誦經念佛之中、上層社會婦女甚多，但其時間、身份不詳，只能依資料來源之時間視為北宋婦女。譬如，全州推官朱袞之母王氏（生卒年不詳），為名孝子朱道誠（生卒年不詳）之妻，日誦十句《觀音心咒》，然年方四十九而疾篤，家人正預備為她治後事，而王氏夢青衣人告以誦《觀音心咒》時，應於咒語之外多誦「天羅神，地羅神，心離難，難離身，一切災殃化為塵」等十九字以延命。王氏因不識字，青衣命其強記之。王夫人醒後，疾遂癒，後年至七十九歲而終。<sup>175</sup>《觀音心咒》，應指《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尼經》內之咒語，即宋人俗稱的《大悲咒》，在唐中期以後即相當流行，至宋更受重視。<sup>176</sup> 上文的葛勝仲妻張漢，即念此咒至「萬億遍」。

又有似在中、上層社會，但其夫身份與經歷都不詳者。譬如，海鹽縣蔣念二（生卒年不詳）之夫人，每日誦大乘佛經，斷除嗜欲。忽一日，洗漱、更衣、燒香、念佛、書頌而終。頌曰：「看過蓮經萬四千，平生香火有因緣。西方自是吾歸路，風月同乘般若船。」<sup>177</sup> 這位蔣夫人能誦經作頌，當是士人家出身。從她所書之頌來看，可見她常誦《法華經》。若「萬四千」指所閱次數，則一日誦完蓮經全部七卷一遍，要三十八年才能誦完一萬四千遍。若她從

---

氏（1017-1033），年十七即喪。其繼室楊氏（1017-1034），亦早逝，死年方十八。薛氏為歐陽之第二繼室。「千年佛老賊中國」一語，見〈讀張李二生文贈石先生〉，《歐陽修全集》之《居士集》，卷1，頁10-11。

<sup>175</sup> 王鞏，《聞見近錄》，《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頁38ab；《宋史翼》，卷33，頁3a-4b。按：朱道誠以孝聞，少失怙而家貧，孝事其母俞氏。然其母多病，「道誠截髮求醫，母卒，廬墓下，旁有冬筍生，有司以狀聞，詔賜絹十疋、米一斛，勅本州以時存問，及卒郡守趙昕表其墓曰朱孝子墓。」見《續資治通鑑長編》，卷120，頁2829；《廣西通志》，《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82，頁2b-3a。又，朱道誠有二子，長子為朱冕，官至宣教郎。次子為朱袞，履歷不詳。二人皆與王鞏遊，疑王鞏所說之全州推官若非朱冕即是朱袞。

<sup>176</sup> 按：據近人研究，唐代譯有十三種有關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之密教經典，其中西天竺沙門伽梵達摩（Bhagavadharma）所譯者，名曰《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尼經》，《大正藏》冊20，第1060號，通常簡稱為《大悲心陀羅尼經》，為唐以來最流行之此類佛經。此經內之咒語即俗稱《大悲咒》。參看 Chün-fang Yu, *Kuan-yin: the Chinese Transformation of Avalokiteśvara*. pp. 59-69。筆者認為，宋人稱《觀音心咒》者應即是《大悲咒》。

<sup>177</sup> 明·陶宗儀，《說郛》，《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116，頁40ab。

十五歲開始誦經，則誦完一萬四千遍時，已五十三歲，此種「因緣」與佛門僧徒又相差幾何？<sup>178</sup> 宋仁宗康定間（1039-1040），范仲淹的僧友錢塘善昇入杭州，居天竺山日觀庵，不下山者十餘年，誦蓮經一萬過。<sup>179</sup> 蔣念二夫人之「看過蓮經萬四千」，絲毫不讓善昇專美於前。

又如濰州昌樂人張行婆，出身軍人之家，幼即為繼母出售至尚書左丞范公家，為其女之婢，隨范女陪嫁至泗州人三班借職金士則（生卒年不詳）。後於范府遇生父，遂歸家事奉父母，直至其雙亡。之後嫁里人王祐為妻，而王祐早卒，乃獨力撫養諸孤成人，並為其完婚。張氏寡居未再嫁，但愛浮屠之法，欲居里中廢寺。里人敬其節義，捐獻錢財以助其修寺使居之。遂棄家而居其中，並戒其子毋得至寺，謂寺有衆人之財，係用以興佛事，一毫不敢私之。元豐中，張氏以「故時主家」不可忘，自濰州至泗州省金氏夫婦，又徒步千里由泗州到陝西探望金士則之妹。金氏遂於園門之傍置一室讓其獨處，張氏「日一蔬食，讀佛書」。金士則妹為司馬旦（1006-1087）之妻、司馬光之嫂，故司馬光深知張氏之事迹。<sup>180</sup> 司馬光不喜佛，常說「不好佛老者正謂其不得中道，可言而不可行故也」。但他「雖不習佛書」，但深知佛教清儉寡慾、慈惠愛物之教理。<sup>181</sup> 認為張氏能行佛之教，亦能行儒家之道；「世之服儒衣冠、讀詩書以君子自名者，其忠孝廉讓能如張氏者幾希」，不能以其微賤而忽之。

<sup>178</sup> 按：唐以來流傳之《法華經》為一部七卷，故有「蓮經七軸」或「七軸蓮經」之說。見唐·齊己，《白蓮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10，〈贈持法華經僧〉，頁 6b 有句云：「蓮經七軸六萬九千字，日日夜夜終復始，乍吟乍諷何悠揚……。」李之儀，《姑溪居士前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4，〈送宣上人遊方〉，頁 5a。元·尹廷高更說「七卷流傳自李唐」，見氏著，《玉井樵唱》，《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上，〈蓮經放光〉，頁 18a。又宋人抄寫《法華經》，都是一部七卷，參看筆者，〈論宋代士人的手寫佛經〉（上），頁 60-102；同篇（下），頁 36-83。又宋初詔每歲試童行，通「蓮經七軸」者，給祠部牒披剃。見《古今圖書集成》冊 494，頁 42，引《續文獻通考》。

<sup>179</sup> 《范文正公集》，行政院文建會編之《范仲淹研究資料彙編》，卷 7，〈天竺山日觀大師塔記〉，頁 211-12。

<sup>180</sup> 見司馬光，《傳家集》，卷 72，頁 8b-10b。司馬光所說故尚書范左丞，不詳為誰，但筆者查考結果，可至少知非仁宗時的尚書左丞范雍。

<sup>181</sup> 《傳家集》，卷 63，〈答韓秉國書〉，頁 1a-4b；卷 71，〈秀州真如院法堂記〉，頁 10a-11b。

#### （四）禪定波羅蜜

修習禪定，在對治亂意，使心神安定。宋世士大夫信佛參禪，蔚然成風，不少婦女亦受影響。蘇軾曾說：「近歲學者各宗其師，務從簡便，得一句一偈，自謂了證，至使婦人孺子抵掌嬉笑，爭談禪悅，高者為名，下者為利，餘波末流，無所不至，而佛法微矣！」<sup>182</sup> 蘇軾之語，實在批評當世禪法，如醫師治病之「不由經論，直授方藥」，造成禪法之膚淺。但他說的婦人孺子「爭談禪悅」，雖是誇張之詞，但實為心有所感之故。雖然如此，婦女之好談禪者，實不乏其人。其有深味禪悅者，臨死不亂，往往為人所稱讚。上文所述陸氏家族之婦女，可見一斑，以下復舉數例，以申其說。

神宗朝宰相呂惠卿（1032-1111）之弟升卿，有妻陳氏（1046-1073）「篤信釋氏，誦其書，遵其教，精進持其所聞。禪宗頓教、見性成佛，思而索之，寢食都廢。一日忽自喜曰，吾得之矣，未幾，被病以故，臨沒不亂。」<sup>183</sup>

哲宗朝太子中舍張景儒（生卒年不詳）之妻楊氏（1036-1095），在其夫捐館之後，自奉儉薄，盡屏棄珠璣簪珥之飾。平日則閱讀佛書，並以教訓子弟為事。至其晚年，「默悟禪觀，頗達其宗旨。」一心翛然焚香宴坐，不為外務所擾。<sup>184</sup>

黃庭堅（1045-1105）之繼室謝氏（1055-1080），為詩人謝景初（1020-1084）之女。<sup>185</sup> 她二十歲歸黃庭堅，二十六歲即卒，中間「常脩禪學定，而不廢女工，能為詩，而叔妹不知也。」<sup>186</sup> 庭堅之叔母章氏（1037-1098），為

<sup>182</sup> 《蘇軾文集》，卷 66，〈書楞伽經後〉，頁 2085。

<sup>183</sup> 同前書，卷 14，〈故仙源縣君陳氏墓誌銘〉，頁 4a。

<sup>184</sup> 張岫，〈宋故壽陽縣君楊夫人墓誌銘〉，見《全宋文》冊 39，頁 556-57。

<sup>185</sup> 謝景初，字師厚，為詩人謝絳（希深）之長子，詩人梅聖俞妻兄之子。黃庭堅是在其原配孫氏死後再娶謝氏。孫氏封蘭溪縣君，為孫覺（1028-1090）之女。

<sup>186</sup> 《山谷內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8，〈黃氏二室墓誌銘〉，頁 9b。「叔妹」即是小姑，黃庭堅之妹。按：黃庭堅之母李氏生有四女，長女（1046-1070）嫁洪民師（生卒年不詳），死於庭堅娶謝氏之前，庭堅曾撰〈毀壁詩〉悼念之。故此處所說之「叔妹」，當為其他三妹。其中之一嫁王世弼（生卒年不詳），庭堅在大名

洪州分寧縣人處士章積之（生卒年不詳）之女。章氏三十四歲之時，其夫捐館，二子二女還幼，章氏獨力孝養其夫之生母，並為二子築室治生。嘗因其弟章楚材（生卒年不詳）之引導，聞黃龍祖心禪師（1025-1105）死生之說。臨病終時，問其次子黃回曰：「吾今日百骸欲潰而不得脫，其病安在？」命取《圓覺經》來誦之，黃回誦至「地、水、火、風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章氏遂止之，召婦女告以後事，即命掩室而化。<sup>187</sup> 黃龍祖心禪師是江西名禪，為臨濟黃龍系創始人黃龍慧南（1002-1069）的法嗣，黃庭堅與其師徒都彼此相知，而且還遊於祖心門下，並與祖心法嗣靈源惟清（?-1117）及死心悟新（1043-1114）尤篤方外之契。他與惟清之遊，遠在惟清受業於延恩法安（1024-1084）之時，也曾於吉州太和解官時赴武寧訪法安。<sup>188</sup> 謝氏之信佛，或多或少與黃庭堅之熱衷佛法有關。蓋黃庭堅於熙寧元年（1068）二十四歲在汝州葉縣任官時，與在洪州南昌的黃龍慧南有書信來往，詩中「十二姻〔因〕緣無妙果，三千世界起秋豪〔毫〕」、「截斷眾流尋一句，不離免角與龜

---

期間，常與之唱和。謝氏封介休縣君，其生卒年不甚確定，此處暫依鄭永曉，《黃庭堅年譜新編》之考證，見該書頁 46、58、94。又參看黃啟方，〈黃庭堅父黃庶事迹考〉一文，收於《黃庭堅研究論集》，頁 47-95。

<sup>187</sup> 同前書，卷 8，〈叔母章夫人墓誌銘〉，頁 18b-20a。按：黃庭堅有叔父數位，中有兩位叔母姓章，其一為黃序之妻（1016-1082），為處士章慶之之女，庭堅曾為之作〈章夫人墓誌銘〉。此位信佛之章夫人，其父章積亦為處士，其夫身份雖不詳，但有可能為黃庶之弟。據黃啟方，〈黃庭堅父黃庶事迹考〉一文查考，黃庭堅之父黃庶（1918-1058）有同父異母弟黃廉，及堂兄弟黃庠、黃序、黃龐等，疑黃龐或為此章氏之夫。按：章氏為分寧著姓，處士章慶之與章積之似為兄弟，各將其女嫁與黃庠、黃龐兄弟，亦不無可能，但黃龐之有關資料太缺，無法斷定是否即此章氏之夫。按：《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冊 9，《萬曆新修南昌府志》誤黃龐為黃庠之子，而謂黃龐字富善，「好學尚氣節，皇祐元年進士，為京兆法曹，謁府，不肯參拜庭下，即解冠歸隱於芝臺書院。」而章氏之夫「平日大率常醉，或使酒嫚侮，夫人承之未嘗不以禮也。」據說章氏嘗於其夫不甚醉時諫曰：「君終日如是，使諸子皆法象，何以為家？」而庭堅叔父曰：「吾兄弟之子多賢，克家者自當不法我而法彼也。」此種浪漫不羈之行徑，是否可視為掛冠求去，退隱書院的黃龐性格之表現？

<sup>188</sup> 庭堅〈贈鄭交〉有「不逢壞衲乞香飯」、「開徑老禪來煮茗」之句，說明他訪靈源惟清及延恩法安師徒，卻只見師父而不遇徒弟。見宋·任淵等集，黃寶華點校本，《山谷詩集注》，頁 14-25。

毛」等句雖有戲謔之意，但「庭前柏樹祖師意，竿上風幡人者心。草木同霑甘露味，人天傾聽海潮音」卻表現了對禪宗正法之認識。<sup>189</sup> 他在熙寧七年（1074）三十歲時在河北大名（今北京）與謝氏結婚，而此後六年直至謝氏去世為止，頗閱讀佛書，所作之詩時引用佛語，及禪宗典故，於禪佛之興趣甚深，謝氏耳濡目染數年，自亦有所領會。<sup>190</sup> 至於章夫人之聞法於祖心禪師，據庭堅之說法，是其弟章楚材促成。章楚材之生平事迹不詳，但聞法於祖心門下不假，祖心所寫之〈答章楚材二首〉，可以為證：

從來有病方與藥，妄起還因說有真。

妄病若忘真藥盡，洞然明白舊時人。（其一）

若存明白翻成病，萬法融通始是真。

曲直方圓不相到，擬將何法付何人？（其二）<sup>191</sup>

神宗朝天章閣待制馬仲甫（生卒年不詳）之繼室楊夫人（1033-1081）為其原配亡妻之妹。楊氏博學多能，「居有餘力，則誦經史諸子，閱醫藥、陰陽、算術之書至數千萬言，皆通其大義。」但她雖博學，卻不喜為辭章，而「尤深佛學，悟性命之妙。年未三十，絕人事、屏葷血，晨夕躬治佛事，汲水焚香，誦經禪寂，積二十年無少懈。」年四十九而終，死前泊然不亂。<sup>192</sup>

姑溪居士李之儀（元豐間進士）之妻胡文柔（1053-1110），出身世家，其祖為胡宿，父為胡宗質，都位居顯要。根據李之儀的描述，她智慧超凡，博聞

<sup>189</sup> 見黃庭堅〈戲題葆真閣〉、〈戲贈惠南禪師〉及〈寄新茶與南禪師〉等詩，《山谷詩集注》，頁1242-1243。

<sup>190</sup> 譬如，〈題山谷石牛洞〉有「司命無心播物，祖師有記傳衣」之句；〈次韻蓋郎中率郭郎中休官二首〉有「世態已更千變盡，心源不受一塵侵……黃公壚下曾知味，定是逃禪入少林」之句；〈阻風入長蘆寺〉有「福公開百室，不借鄰國權，法筵森龍象，天樂下管絃，我來雨花地，依舊燻薰煙」之句。見《山谷詩集注》，頁16、24、657和730。

<sup>191</sup> 見《黃龍晦堂心和尚語錄》，《續藏經》冊120，頁241b。

<sup>192</sup> 桂邦傑等撰，《民國江都縣續志》，卷15，〈楊夫人墓志銘〉，頁1a-2b。按：馬仲甫為仁宗時工部尚書馬亮之子。

強記，學問淵博，「上自六經、司馬氏史，及諸纂集，多所綜識。于佛書則終一大藏。作小詩、歌詞、禪頌皆有師法，而尤精于算數。」誠屬多才多藝，不讓鬚眉。故李之儀說「沈括存中，余少相師友，間有疑忘，必邀余質于文柔，屢歎曰：『得為男子，吾益友也！』」沈括（1029-1093）高才博學，於天文、律曆、醫藥、卜算無所不通。他如此看重胡氏，可見胡氏過人之處。胡氏自始蔬食，至老而不少輟，雖疾病亦不改。「食無鹽酪，纔糲屬饜爾。隨禪者力行，受圓照宗本師記。」所謂「食無鹽酪」，「糲屬饜」，是指胡氏只求粗食飽腹而已，不講究飲食之豪華。圓照宗本（1005-1087），即是熙寧中為蘇、杭二州競相爭取之禪門大宗匠。據李之儀說，宋「京師新闢禪刹，召名師主之，學者至奔走天下，然一方猶未全信。文柔著壞色衣，一飯不粥，隨諸學者參問，而所謂明師者，皆印其可。上自宗室公御家往往化之，倫類中遂為領袖，而名聞京師，天下叢林至今稱之，文柔亦以是為己任。」可見她參禪甚有所得，而知名於叢林之中，為參學禪眾之領袖。李之儀所謂的京師「新闢禪刹」，即是神宗元豐中，將大相國寺六十四院闢成之八院之二。其中慧林禪院即是由圓照宗本主持。胡文柔為宗本之入室弟子，自當為叢林名禪所印可。李之儀仕宦不偶，胡氏常勸他說：「通塞自有其數，苟不偶于今日，則合眼再開來，必無佳處。要須于向上事精進，當能必致其佳。既到此，尤甚自策。一報緣中，不昧者有幾？」於是「一意佛事，朝暮禮觀音懺不懈」，還邀李之儀共修行之。胡氏病革，「兩手結彌陀印而逝。」李之儀說當時值二月，氣候已溫，而猶停靈七日以待其子。「甫就木，顏色光潤如笑。」就此描述看，胡氏既參禪，又行觀音懺法，修西方淨土之業，奉佛之誠，超越時人。<sup>193</sup>

贈朝奉郎晁端友（生卒年不詳）早逝，其妻楊氏（1029-1095），布衣蔬食，教子讀書，皆登進士第。楊氏生性慈儉，篤信佛事，誦《金剛經》二十年。晚年更讀《圓覺經》，至「以幻修幻」處云：「火出木盡，灰飛煙滅，以幻修幻，亦復如是。」又云：「我知木因幻生，火從幻出，幻滅無餘，而不滅者

<sup>193</sup> 《姑溪居士前集》，卷 50，〈姑溪居士妻胡氏文柔墓誌銘〉，頁 1a-7b。關於圓照宗本及神宗闢大相國寺為二禪院及六律院事，見《禪林僧寶傳》，《續藏經》冊 137，〈慧林圓照本禪師〉，頁 500a-501a。

常寂也。」此後每言其義，而信彌篤。臨死之時，猶合掌斂容如諷佛狀。後七日，其子晁補之，詣金山供佛，遇真覺大師志添。志添出做佛事，常人祈請多不往，但卻自求至其母柩側，閉目趺坐，音如金石，忽起而言曰：「汝母無苦，凡吾宣揚無塞滯者，皆無苦也！」似從其母口中出，補之即跪奉金帛，真覺大師不受，人人皆以為此係其母淨信所致。<sup>194</sup>

直龍圖閣范珣（生卒年不詳）之女，幼聰慧，樂于禪寂。初嫁丞相蘇頌之孫蘇悌（生卒年不詳），後厭世相，欲祝髮為尼，但為其父所拒，只能在家清修。後父母雙亡，因從其兄范涓（生卒年不詳）守官豫章之分寧，遂參黃龍死心悟新禪師（1043-1114）於雲巖，既于言下領旨，死心之法門昆仲靈源惟清（?-1117）賜號空室道人，法名智通，於是知名於叢林。<sup>195</sup> 政和間范氏隨兄移居金陵，東歸之前，靈源惟清曾致書謂：「久客乍歸，活業零落，卻須決烈打辦精神，苦切修持，方能作得家主」，對她鼓勵至深。<sup>196</sup> 到金陵後，圓悟克勤（1063-1135）及佛眼清遠（1067-1120）禪師都住蔣山，遂與二名禪遊，因機語相契，二師甚稱賞之。後遂於姑蘇西竺院薙髮為尼，改法名為惟久。宣和六年（1120）趺坐而終，有《明心錄》一書傳世，佛果禪師為之序，而靈源、佛眼皆有偈贊之。范氏謁死心之前，曾因讀《法界觀》有省，連作二偈見意。其一曰：「浩浩塵中體一如，縱橫交互印毘盧。全波是水波非水，全水成波水自殊。」另一曰：「物我元無二，森羅鏡像同。明明超主伴，了了徹真

<sup>194</sup> 杜紘，〈宋壽光縣太君楊氏墓誌銘〉，收於《全宋文》冊 42，頁 276-278。原文所說《金剛般若經》即是俗稱之《金剛經》。又所說《大圓覺》，即俗稱《圓覺經》。按：杜紘與晁補之是姻親，故所說真覺大師事，與下文晁補之所說合。不過「金山」《全宋文》誤為「全山」。

<sup>195</sup> 按：「空室道人」當為正確名號，前引“Images of Women in Ch'an Buddhist Literature”亦述及此人，但誤作「道人空室」。死心曾有〈與空室道人〉偈曰：「空空室室空不空，不空空處徹真空；混同塵世非塵世，只在塵中塵不同。」見《死心悟新禪師語錄》，《續藏經》冊 120，頁 256a。又《嘉泰普燈錄》誤范珣作范岫。見《嘉泰普燈錄》，《續藏經》冊 137，頁 165b。

<sup>196</sup> 見《靈源和尚筆語》（據宋淳祐甲辰〔1244 年〕刻本刊印）。按：此書日本現藏和刻本數種，分別在大東急文庫，國會圖書館，成實堂文庫，龍谷大學，禪文化研究所，及東大總圖書館。筆者所用為禪文化研究所藏本，在此要感謝該所的前田直美小姐借供影印。

空。一體含多法，交參帝網中。重重無盡意，動靜悉圓通。」<sup>197</sup> 二偈所說即是華嚴「波水一而不礙殊，水波殊而不礙一」及「一燈入千燈，千燈入一燈」之「一入多」與「多入一」的「一多相容」之道，可見她於華嚴之說有所省悟。她既出於死心禪師門下，又見賞於當時叢林「三傑」之二的圓悟克勤及佛眼清遠，可謂禪門中之傑出婦女。<sup>198</sup>

### （五）智慧波羅蜜

智慧之表現當在對佛經之義理會甚深，人生之真諦領悟甚明，生死之際，視若常時，無所罣礙。此類婦女甚多，如上文所述張敦禮之母符氏不僅深戒殺生，而且日課內典，求真如寂滅之趣，其智慧固非常人可及。其他著例如下：

神宗朝參知政事張方平（1007-1091）之母嵇氏與其父張（985-1067），「夫婦奉佛」，因為一直未能生子，夫妻相與精禱，而結果「夫人夢天人乘空而降，捧一嬰兒授之」，遂生張方平。當然，祈禱生子之驗未必可信，但念佛祈禱當是張方平父母精進信佛之方式。根據張方平好友趙槩之印象，其父早就「已得諸根清淨，得大善寂力，住無生法忍，入甚深智慧。」<sup>199</sup> 其母既與其父同時念佛，自亦深受濡染。張方平因受教於其舅嵇穎（天聖年間進士），大概受其奉佛之影響而學佛。他通《楞伽經》，有相當佛學修養，故夫人馬氏（生卒年不詳），亦通佛理，而時人以為她「婦道順而正，母德慈以均，晚年明性理，其歿也有異。」馬氏為仁宗慶曆朝終太常少卿馬絳（974-1048）之女，頗有學識，蘇轍說她「晚通至道，游心空寂，啓手即化，容如平生，登證

<sup>197</sup> 《羅湖野錄》，《續藏經》冊 142，頁 962b-963a。按：死心與靈源都是黃龍晦堂祖心（1025-1100）之徒，為師兄弟。死心出世之後，初住雲巖。圓悟克勤於政和末年移住金陵蔣山。范珣，《宋史》無傳，《續資治通鑑長編》有范珣提舉兩浙常平事之記錄，見《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292，頁 7130，其餘事迹不詳。又按：《四庫全書》本《羅湖野錄》作龍圖梅珣（964-1041）之女，但梅珣官職未至龍圖，且有子無女，年壽甚長，不似為此女之父。又，《嘉泰普燈錄》誤惟久為永久。見《嘉泰普燈錄》，頁 166a。

<sup>198</sup> 關於叢林「三傑」之說，見《僧寶正續傳》，《續藏經》冊 137，頁 596a。

<sup>199</sup> 《樂全集》，卷 40，〈皇考金紫光祿大夫太子少師墓誌銘〉，頁 1a-5b。

妙果，古人是似。」顯然與張方平夫唱婦隨，心嚮釋教。<sup>200</sup>

神宗朝因附王安石而拜相的「筌相」陳升之（1011-1079），母親竇氏（883-1070）「嗜佛書性理之說，猶曉音律。」陳襄（1017-1080）為她作墓誌，說她「居處恭儉，而履尚介潔，不為華靡之費，有餘則分遺諸舊，而繼之散施。」<sup>201</sup>

神宗朝舒之翰之妻李氏（1056-1078），出身大族為將門之後，十九歲歸舒家為冢婦，生子不久後，子即夭死。李氏因而「感生死之變若此其不足恃也」。她常誦佛書，而且也「頗識其理」。<sup>202</sup>

元祐間，前參知政事趙抃（1008-1084）之弟、湖北轉運使秘閣校理趙揚（生卒年不詳）之妻蘇氏（?-1097），凡吐納鍊氣服餌之術，皆通曉之。晚年更探究性相寂滅之理。她將奄棄之時，「疊足屈指若釋氏結印狀，神色凝定」，故家人後七日乃敢殮。<sup>203</sup> 蘇氏為仁宗朝廣西轉運使贈禮部侍郎蘇安世（996-1054）之女，少即喜誦詩書黃老之言。既歸趙揚，力輔其夫教養子女，使不得荒怠。而平居喜賑濟周急，故家無餘資。可見她除了打坐參禪深悟性理之外，也慷慨好施，與人為善。

神宗朝由朝請大夫輦運累官至尚書都官郎中之褚瑄（生卒年不詳），夫人張氏（1014-1080）「旦輒蔬食，讀西方之書，見其理。」死前一日，「筆句偈于金榜之上，以謂佛須心解，而經不必多讀。」臨死時，「嗒然坐逝，無所畏怖。」<sup>204</sup>

熙寧時天章閣待制俞允（1033-1081）之母辜氏（1017-1070），晚年「喜讀釋氏書，其於性命之理頗自以為得。若乃世俗之玩，皆非所好。」<sup>205</sup> 俞允父早死，其母欲使子女毋墮先人之志，日夜教子讀書，終至有成。

---

<sup>200</sup> 同前書，〈附錄〉，王鞏撰〈行狀〉，頁 46b；《樂城集》，卷 26，〈記永嘉郡夫人馬氏文〉，頁 540。

<sup>201</sup> 《古靈集》，卷 20，〈秦國太夫人竇氏墓志銘〉，頁 20b-23a。

<sup>202</sup> 張端，〈宋舒氏冢婦李夫人墓誌銘〉，見《全宋文》冊 35，頁 526-27。

<sup>203</sup> 清·王昶，《金石萃編》，卷 141，〈宋仁壽縣君蘇氏墓誌銘并序〉，頁 5b-6a。

<sup>204</sup> 《陶山集》，卷 15，〈壽安縣君張氏墓誌銘〉，頁 17a-18a。

<sup>205</sup> 《華陽集》，卷 57，〈臯氏墓誌銘〉，頁 17b-19a。

光祿寺丞任孜（遵聖）之妻呂氏（1017-1094），為其夫之誼友。當其夫未第之時，以祿養為憂，忽忽感恨，呂氏戒以但求其父之志，慎其所履，勿逐不義之富貴，而獲罪於名教。至於升斗之祿，非其歡戚所繫。任孜逝後，呂氏獨力育子，二十年有成。她「晚歲好佛書，知緣果大略，怡然若有所得。」又熟讀《金剛經》而能背誦，於去世之前日，閉目誦《金剛經》二遍，而竟無一字舛謬。<sup>206</sup>

神宗朝穎昌府臨穎縣令劉弇（1048-1102）之母周氏（1024-1088），出身巨室。其夫疏財厚義，但仕宦不偶，周氏時以簪帨質錢維持生計。其夫死時，周氏年方四十餘，既未再婚，亦未問生業，但「收書萬卷以授諸子，使畢力於學」，故諸子皆中進士第。周氏晚年「多讀佛書，讀《金剛般若經》，得如實三昧，日誦十餘返。左右以朱墨積數，至盈巨軸。」病歿之前，還對家人說：「夜夢贊唄，鏗鏘迎我梵天，梵天何足道？此吾壽已夫！」<sup>207</sup>

神宗朝比部員外郎杜君某之妻崔氏（998-1069），平居好讀經史佛書，又曉其意，必終身行之。杜君因感疾多年，手足不能自舉，飲食盥櫛皆有以賴之。死後崔氏居喪，哀毀動人。她年壽甚長，臨終使家人備斂送之具，遂「瞑目誦佛而逝」。<sup>208</sup>

哲宗朝婺州觀察推官林師醇（生卒年不詳）之妻程氏（1061-1092），歸林家為婦十年，侍奉其夫及其姑甚勤，使其家內外整肅有序。程氏「間喜讀書，一覽輒成誦。尤篤信內典，渙若有得者。」不幸三十二歲得疾不起，但病中與其夫語，皆超詣名理，死時，「神色不少變」。<sup>209</sup>

朝請郎致仕陶舜卿之妻林氏（1073-1120），不僅能觀書，也「略能誦

<sup>206</sup> 《淨德集》，卷 27，〈夫人呂氏墓誌銘〉，頁 6a-8a。

<sup>207</sup> 劉弇，《龍雲集》，《豫章叢書》點校本集部 3，附錄卷，〈周夫人墓志銘〉，頁 375-76。按：按佛家之說，得「如實三昧」可「以三昧力莊嚴其心，即得見佛意之所念。」或「以其三昧嚴心力故，憶念過去阿僧祇阿僧祇劫，如來所修一切功德。」如目連及大迦葉，見《大寶積經》，《大正藏》冊 11，第 310 號，頁 351a 和 362a。

<sup>208</sup> 范純仁，《范忠宣公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12，〈比部杜君夫人崔氏墓誌銘〉，頁 14a-16b。

<sup>209</sup> 鄒浩，《道鄉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37，〈夫人程氏墓誌銘〉，頁 4b-6a。

說」，並以其所誦說授諸子，勸之力學，故諸子皆為學者，相繼舉進士而任官。林氏資質聰慧，晚年益喜佛學，而深達其要，至能「不以喜怒哀樂累其心」。<sup>210</sup>

靖康年間拜相的徐處仁（1062-1127）之妻陳氏（1070-1123），「性通悟，于出世間法得其指歸。疾病，精爽如平時，謝醫巫不問。屬纊之夕，猶起坐若有所言，于生死蓋超然者。」<sup>211</sup>

其他中、上級官吏及士人之妻，亦多有喜釋氏書而深達性理、能表現智慧者。唯這些官吏及其夫人之生平事迹均不甚詳。譬如，仁宗時贈衛尉卿梁某之夫人李氏，「喜釋氏書，且深探其理，能頹然委順，不惑于生死之際。」<sup>212</sup>又某楊姓太常少卿之夫人王氏，「達佛理，故死無怛惻。」<sup>213</sup>這類婦女究竟為數多少，仍待學者進一步探討。

## 四、餘論

以上對北宋菁英家庭婦女修行「五波羅蜜」之詳細情況，可以文末之附表 2 來補充。因為許多婦女同時兼修二種以上波羅蜜，藉附表示意，較為明白可見。也就是說，附表 2 除簡示個別修行之情況以見其差異外，同時兼示單修一種波羅蜜或兼修多種波羅蜜之情況。根據此示意表來分析上述婦女修行五波羅蜜之情況，可約略觀察各波羅蜜修行婦女之比例：布施 12%，持戒 18%，精進 84%，禪定 6%，智慧 22%。此比例之算法見附表 2 後之附表 3。

附表 3 之比例，雖只能代表大略情況，但足以顯示婦女以誦佛讀經表現精進波羅蜜為其佛教信仰與實踐之主要作法。至於為何傾向或選擇其中之一、二作法，如上文所析，原因複雜，不必偏執其一。伊沛霞之〈虔信之妻〉中，有若干婦女是在寡居後信佛或崇道，但她並未特別注意及說明。本文雖舉不少寡

<sup>210</sup> 《長興集》，卷 30，〈宋故壽安縣君林氏墓誌銘〉，頁 1a-2b。

<sup>211</sup> 《浮溪集》，卷 28，〈吳國夫人陳氏墓誌銘〉，頁 23a-25b。

<sup>212</sup> 《祠部集》，卷 35，〈贈衛尉卿梁公夫人李氏墓誌銘〉，頁 537-38。

<sup>213</sup> 同前書，卷 35，〈太常少卿楊公夫人福昌縣君王氏墓誌銘〉，頁 538-39。

居之後信佛之事例，但也證明有不乏早年即信佛者，如張景憲妻尹氏、汪穀妻陳氏、孟忠厚妻王氏及劉宰妻梁氏都是。而寡居之後或晚年始獻身佛教之例甚多，如韓琦生母胡氏、韓瀆繼室楊氏、傅璟之庶母周氏、蘇頌之女蘇氏、蘇耆之妻王氏、李竦之妻杜氏、陳仲明之繼室龐氏、吳磐之妻穆氏、汪愷之妻王文麗、石君瑜之妻李氏等都是寡居後信佛之例。晚年才信佛者，如韓億之妻王氏、葛寔之妻尹氏、晏成裕之母張氏、陳師道之母龐氏、姚奭之妻李氏、劉弇之母周氏、張奎之妻王文淑、崔光弼之妻吳氏、李處道之繼室龔氏及張方平之妻馬氏等等。此外，許多宗婦，多在夫死之後信佛，彷彿成了一種風氣，為南宋所少見。如趙惟憲之妻和氏、趙世謐之妻安氏、趙仲參之妻楊氏等等。另外，北宋公主及宗婦崇佛之現象，為南宋所少見。至少從可見之記錄看，南宋宗婦信佛者，筆者只見一例，見下篇討論。

到了兩宋之際及南宋，早年或中年信佛婦女，似較以往為多，如下篇之楊朝散妻薛氏、陳堯文母杜氏、季陵妻上官氏、孫鎮妻曹氏、錢觀復之妻徐溫、張孝祥妻時氏、潘師仲妻朱氏、袁說友妻惠道素、蘇瑒妻孫氏、向子寵妻張氏、章君表妻陳氏、張應運妻卞妙覺、李綱岳母黃氏、孟嵩妻仲靈湛、蓋經妻章氏、岳珂母陳氏等等，都是早、中年信佛者。晚年信佛者，如張廷傑妻李氏、趙公賓之妻李洞安、虞璠妻郎氏、李文炳母田氏等等。孀居之後信佛者則如下篇之劉從遠妻唐氏、楚通叔妻朱氏、趙公恃妻郭氏、江安行妻賀氏都是，比例上較少，容於下篇析論。

大致上，菁英家庭之妻女雖然信佛，但大多善於相夫教子、持家理財，其為賢妻良母，似與其信佛並無直接關聯。伊沛霞舉了少數例子說明信佛使婦女變成更賢淑之妻子，顯然輕忽了儒家賦予大家世族媳婦的角色。這些婦女一旦嫁至大族，就擔任起中流砥柱之任，侍奉翁姑，相夫教子，履行賢慧主婦「事舅姑以孝順、奉丈夫以恭敬、待娣姒以溫和、接子孫以慈愛」之責任與義務。<sup>214</sup> 若不幸丈夫仕途困難，或不善治生，或不幸早逝，她們就須學會修行忍辱之道，撙節開支，度過困窘。或典賣嫁妝，維持生計，或買賣田畝，貨殖增財。這種例子甚多，伊沛霞所討論之婦女，多半為具有這種美德之媳婦或母親，即

<sup>214</sup> 元·鄭太和，《鄭氏規範》，《叢書集成新編》本冊 33，頁 171。

令墓誌撰寫者多有過譽之處，她們之為賢媳良母，多半與信佛無直接和密切之關係，或有關係，亦難評量。

以上筆者於伊沛霞所述之 14 位北宋菁英家庭信佛婦女之外，另加補述 109 位婦女之佛教信仰及實踐，以五波羅蜜之範疇來分類討論她們修行之表現形式，使其誦經、持戒、施齋、飯僧、佈施、念佛、深究佛義、通達性理、參禪論道、念彌陀、觀音、修西方淨土等等行為，昭然可見。其不足者，並列表示意，以求詳盡，俾與下篇討論兩宋之際與南宋後之詳情，做一客觀之比較。

[ 附表 1 ]

	姓氏 (名)	生卒年	關係人/ 關係	信佛方式	資料來源
<b>北宋</b>					
1	胡氏	968-1030	韓琦/生母	歸信釋氏、歷觀藏典	安陽集
2	李氏	976-1031	王拱辰/ 生母	誦經吃齋	景文集
3	許氏	987-1074	黃珙/妻	喜作佛事、誦佛書 18 萬卷	武溪集/ 忠肅集
4	魏氏	992-1064	張沔/妻	熟讀佛書通其義	西溪集
5	崔氏	999-1067	趙宗道/妻	讀圓覺經	八瓊室 金石補正
6	劉氏	1005-1085	蘇舜元/妻	念佛持戒	蘇軾文集
7	吳氏	1006-1091	陸軫/妻	學佛、雞鳴起誦經至日旰	陶山集
8	邊氏	1025-1093	陸佃/生母	彌陀淨土信仰	陶山集
9	胡氏	? -1093	石秀之/妻	閒而讀佛書五十年	錢塘集
10	尹氏	1026-1087	張景憲/妻	性好禪學	范太史集
11	龐氏	1028-1102	陳仲銘/ 繼室	夫死後讀佛書不釋卷	忠肅集
12	范氏	1036-1067	韓繹/妻	隨夫學佛	彭城集
13	聶氏	不詳	韓宗道/妻	大病後誦佛書喜論無生	彭城集
14	陳氏	1039-1115	汪穀/妻	自少晨起齋祓誦佛終身不輟	浮溪集
15	黃氏	1063-1121	李綱/岳母	菩薩乘、禪、淨土	梁溪集
16	邵氏	? -1121	詹成老/妻	施食惡鬼秘咒	毘陵集
17	張濩	1074-1122	葛勝仲/妻	誦佛書念觀音大悲咒	丹陽集
<b>兩宋之際</b>					
18	胡氏	1077-1149	江惇滉/妻	誦佛書間卻筆血	香溪集
19	王氏	1096-1149	孟忠厚/妻	自少喜誦佛書，晚益精進	鴻慶居士集
20	虞道永	1103-1182	江琦/妻	學問駁雜，晚學浮圖法	晦庵集
21	戴氏	1121-1192	袁燮/母	晚年好佛、讀其書甚悉	絜齋集
<b>南宋</b>					
22	仲靈湛	1133-1184	孟嵩/妻	齋居蔬食誦經習禪	水心集
23	吳靜貞	1146-1220	劉宰/岳母	奉佛持齋	漫塘文集
24	梁氏	1170-1247	劉宰/繼室	婚前念佛， 婚後因夫勸而止	漫塘文集
25	楊氏	? -1271	史興祖妻	念觀音？	衢州出土墓

〔附表 2〕

\*五波羅蜜之修行一欄數碼分別代表（1）布施，（2）持戒，（3）精進，（4）禪定，（5）智慧。

	姓氏 (名)	生卒年	關係人/ 關係	五波羅蜜之修行*	資料來源
1	趙氏	不詳	宋太宗/ 三公主	出家為尼（2）（3）	宋史
2	趙氏	不詳	宋太宗/ 七公主	出家為尼（2）（3）	續長編、 湘山野錄
3	趙氏	不詳	宋太宗/ 八公主	好佛、深信禪宗、設禪會（1）	續長編、 湘山野錄
4	趙氏	不詳	宋仁宗/ 八公主	建道場、依浮圖、受法號（1）	樂全集
5	趙氏	不詳	宋英宗/ 三公主	好禪宗、議建禪寺請禪師住（1）	佛祖歷代 通載等
6	王氏	不詳	荊王趙顥 /妻	歸無量壽佛，潛心淨業（3）	樂邦文類
7	符氏	不詳	張敦禮/ 母	日課內典，求真如寂滅之趣 （4）（5）	古靈集
8	趙氏	914-1005	劉延宇/ 妻	信奉佛教，深通內典，暇時誦佛書 （3）	武夷新集
9	張氏	952-1032	章得象/ 母	早探釋部，居常薰衲，高情了識 （4）（5）	景文集
10	胡氏	968-1030	韓琦/ 生母	歸信釋氏、歷觀藏典（3）	安陽集
11	李氏	969-1043	胡宿/ 母	焚香誦觀音名號，持般若心經（3）	文恭集
12	李氏	976-1031	王拱辰/ 生母	誦經吃齋（2）	景文集
13	朱氏	982-1065	萬延之/ 母	性好浮屠書，終日持誦不懈（3）	雲巢編
14	陳氏	983-1056	鮑當/ 妻	日食一盂飯，誦浮圖書，用此終身（3）	鄖溪集
15	竇氏	983-1070	陳升之/ 母	識佛書性理之說（5）	古靈集
16	王氏	984-1027	韓億/ 妻	晚節以清淡自樂，日誦浮屠書（3）	蘇學士集
17	王氏	987-1041	蘇耆/ 妻	夫死後日誦佛書，家政委子婦（3）	南陽集
18	馮氏	987-1053	趙惟和/ 妻	好誦浮圖書（3）	歐陽修 全集

19	許氏	987-1074	黃珙/妻	喜作佛事、誦佛書 18 萬卷 (3)	武溪集/ 忠肅集
20	趙氏	不詳	趙惟和/ 三女	出家為尼 (2) (3)	歐陽修 全集
21	段氏	988-1049	陳昌謨/ 妻	鹿衣疏食，一志佛事，日誦竺典 (3)	壽州志
22	莊氏	990-1039	孫錫/妻	好讀佛書，能通其義 (3) (5)	彭城集
23	和氏	992-1047	趙惟憲/ 妻	夫死後誦貝葉書，奉金仙教 (3)	樂全集
24	魏氏	992-1064	張沔/妻	熟讀佛書，通其義 (3) (5)	西溪集
25	魏氏	995-1074	費文/妻	好佛書知緣報大略，特加崇信 (3)	淨德集
26	孫氏	996-1055	葛宮/妻	喜誦浮圖書 (3)	蔡忠惠集
27	崔氏	998-1069	杜君/妻	平居好讀經史佛書而曉其義 (3) (5)	范忠宣 公集
28	崔氏	999-1067	趙宗道/ 妻	讀圓覺經 (3)	八瓊室 金石補正
29	周氏	1000- 1055	朱有安/ 妻	性酷嚮佛，朝不茹葷，變產飯僧 (1) (2)	祠部集
30	孫氏	1001- 1087	喬執中/ 母	崇佛甚謹，至老猶焚香拜佛 (3)	陶山集
31	尹氏	1002- 1061	葛寔/妻	晚益喜浮圖書，頗知其指歸 (5)	蔡忠惠集
32	高氏	1001- 1095	錢緯/妻	平生誦佛書，不一日輟 (3)	全宋文
33	宋道柔	1004- 1064	趙從古/ 妻	喜觀浮圖書 (3)	華陽集
34	趙氏	不詳	趙從古/ 四女	日事薰祿，誦金仙書，慕習其教 (3)	樂全集
35	胡氏	不詳	蔡祥/母	好佛書，棄生平所樂而學之 (3)	全宋文
36	張行婆	不詳	王祐/妻	住佛寺，蔬食讀佛書 (2) (3)	傳家集
37	楊氏	1005- 1054	韓瀆/繼 室	夫死後閉閣深居，日誦佛書 (3)	傳家集
38	劉氏	1005- 1085	蘇舜元/ 妻	好誦佛書，受五戒 (2) (3)	蘇軾文集
39	周氏	1006- 1070	傅璟/庶 母	夫死後誦浮圖書以永日 (3)	陶山集
40	吳氏	1006- 1091	陸軫/妻	學佛、雞鳴起誦經至日旰 (3)	陶山集

41	許氏	1009-1084	黃朝議/妻	周施無所顧惜，奉佛尤專（1）（3）	孔武仲文集
42	林氏	1011-1082	施象/母	誦佛書四十年，以因緣故事勸善（3）（5）	演山集
43	張氏	1013-1069	晏成裕/妻	晚誦佛書，不飲酒食肉（2）（3）	彭城集
44	張氏	1014-1080	褚理/妻	旦則蔬食，誦西方書能知其理（2）（5）	陶山集
45	朱氏	1014-1088	郝質/妻	敬修梵行，深心回嚮，持誦戒律（1）（2）	八瓊室金石補正
46	范氏	1015-1067	韓絳/妻	著道士服，讀釋老書，施浮屠服玩（1）（3）	彭城集
47	胡氏	1015-1090	錢暄/妻	篤信釋氏，深究性理，惡殺生（2）（5）	范太史集
48	辜氏	1017-1070	俞充/母	喜讀釋氏書，得性命之理（5）	華陽集
49	王文慧	1017-1088	陸琪/妻	側臥若吉祥睡而逝，似學佛者（4）	陶山集
50	呂氏	1017-1094	任孜/妻	好佛書，知緣報大略熟，讀金剛經（3）（5）	淨德集
51	趙氏	1019-1079	王荀龍/妻	日誦佛書以為常（3）	淨德集
52	侯氏	不詳	家定國/外祖母	深於浮圖氏之學，諸講師服之（3）（5）	范太史集
53	楊氏	1019-1090	家定國/母	日誦佛書以祝子孫（3）	范太史集
54	龐氏	1019-1095	陳師道/母	晚奉釋氏，修淨土行，誦彌陀（5）	後山集
55	杜氏	1019-1098	李竦/妻	寡居後歸心於佛，讀其書（3）	張耒集
56	程氏	1020-1068	韓績/妻	喜誦佛書，一志不殆（3）	彭城集
57	樂氏	1020-1093	檀宗益/母	平居好誦佛書，於物無所玩（3）	建德縣志
58	史氏	1022-1077	姜諤/妻	輕善樂施，日誦佛書以自適（1）（3）	全宋文
59	李氏	1023-1069	姚爽/妻	晚年篤信事佛，終日齋居誦佛書（2）（3）	全宋文

60	陳氏	1024-1083	俞備/妻	自少奉佛，中年益篤，多不茹葷，持誦終日（2）（3）	演山集
61	章氏	?	章存道/姊	事佛蔬食不嫁（1）（2）	演山集
62	周氏	1024-1088	劉弇/母	晚讀佛書，誦金剛經，得如實三昧（3）（5）	龍雲集
63	鮑氏	1024-1092	侯正臣/妻	晨興讀佛書不懈，焚香誦佛名號（3）	陶山集
64	王文淑	1025-1080	張奎/妻	晚好佛書，亦信踐之（3）	臨川文集
65	王氏	1025-1091	張仲莊/妻	少好內教，晚而彌篤，晨起誦佛（4）	范太史集
66	邊氏	1025-1093	陸佃/生母	彌陀淨土信仰（3）	陶山集
67	胡氏	?-1093	石秀之/妻	閒而讀佛書五十年（3）	錢塘集
68	尹氏	1026-1087	張景憲/妻	性好禪學（3）	范太史集
69	張氏	1026-1094	王堯善/妻	縞衣蔬食，齋戒從浮圖法（2）	西臺集
70	錢氏	1026-1072	潘興嗣/妻	讀佛書有解（3）	民國江都縣續志
71	龐氏	1028-1102	陳仲銘/繼室	夫死後讀佛書不釋卷（3）	忠肅集
72	安氏	1029-1065	趙世謐/妻	夫死後口不茹葷，手不釋佛書（2）（3）	樂全集
73	楊氏	1029-1095	晁端友/妻	篤信佛事，誦金剛、圓覺等經（3）	全宋文
74	錢氏	1030-1081	張升卿/妻	談內典、論性理、讀曹溪壇經（3）（5）	蘇魏公集
75	蘇氏	1031-1072	張師立/妻	夫死後唯閉閣冥心誦佛書（3）（4）	蘇魏公文集
76	楊氏	1033-1081	馬仲甫/繼室	通佛學悟命理，誦經禪寂不懈（3）（4）（5）	民國江都縣續志
77	吳氏	1035-1084	李介夫/繼室	尤喜讀佛書及唐人歌詩	孔武仲文集
78	趙氏	1035-1100	李旒/妻	嫠居二十年，誦佛書精進不倦（3）	樂靜集

79	鄭氏	1036-1054	趙世智/妻	號誦服圖書	歐陽修全集
80	楊氏	1036-1095	張景儒/妻	平日閱佛書，晚年默悟禪觀（3）（4）（5）	全宋文
81	郭氏	不詳	趙世覃/妻	喜浮圖說（3）	歐陽修全集
82	范氏	1036-1067	韓繹/妻	隨夫學佛（3）	彭城集
83	蔡氏	1037-1075	徐成甫/繼室	蔬食誦佛，散財做佛（1）（2）（3）	淮海集
84	章氏	1037-1098	章積之/女	聞黃龍祖心禪師之說，讀圓覺經（3）	山谷內集
85	吳氏	1038-1101	陸佖/妻	臨死如寓得歸，蓋學佛之力（5）	陶山集
86	聶氏	不詳	韓宗道/妻	大病後誦佛書，喜論無生（3）	彭城集
87	陳氏	1039-1115	汪穀/妻	自少晨起齋祓，誦佛終身不輟（3）	浮溪集
88	楊氏	1041-1090	趙仲參/妻	夫死後每日晨起誦佛書（3）	樂全集
89	蘇氏	?-1097	趙揚/妻	尚吐納服餌，晚探性理寂滅之說（3）	金石萃編
90	葛氏	1045-1117	徐安道/妻	崇信釋氏，日課其書，且奉齋戒（2）（3）	丹陽集
91	彭氏	1046-1103	趙叔干/妻	喜誦釋氏書，朝夕靡懈（3）	摛文堂集
92	陳氏	1046-1073	呂升卿/妻	篤信釋氏，誦佛書習禪宗頓教（3）（4）	蘇魏公文集
93	張氏	1047-1088	楊安持/母	謹於佛事、樂善好施（2）	龜山集
94	錢氏	1048-1110	方淇/妻	與夫皆好佛，施己財與居處為梵刹（1）	慈溪縣志
95	胡氏	1049-1103	趙叔彖/妻	晚喜釋氏，持誦不懈（3）	摛文堂集
96	王氏	1049-1104	李公車/妻	喜誦佛書，持殺生戒甚（2）（3）	學易集
97	翁氏	不詳	趙叔羈/妻	柔婉明慧，知好佛書（3）	王魏公集

98	李氏	995-1038	陳貫/妻	通釋氏書，性慈恕，不妄語（2）（5）	河南集
99	許氏	1001-1072	孫淮/妻	雅好事佛，有所祈則若有物告知（3）	長興集
100	穆氏	?-1095	吳磐/妻	夫死後日夜誦佛書，懂陰陽之書（3）	雞肋集
101	王文麗	1051-1124	汪愷/妻	寡居終日，誦佛書求出世間法（3）	浮溪集
102	胡文柔	1052-1110	李之儀/妻	參圓照宗本，禮觀音懺，行淨業（3）	姑溪居士前集
103	李氏	1056-1078	舒之翰/妻	常誦佛書，頗識其理（3）（5）	全宋文
104	吳氏	1058-1114	崔光弼/妻	晚喜讀釋氏，薰裒精甚（3）	浮溪集
105	程氏	1061-1092	林師醇/妻	篤信內典，渙若有所得（3）（5）	道鄉集
106	江氏	不詳	趙士競/妻	與夫皆好佛書、悟苦空之理（3）（5）	樂全集
107	王氏	不詳	趙子綸/妻	居務節儉，專誦釋氏書（3）	河南集
108	周氏	不詳	宋仁宗/貴妃	夫死後蔬食，屏處一室誦佛書（2）（3）	宋史
109	龔氏	不詳	李處道/繼室	晚事佛誦蓮經，皆千遍，問法圓照（3）	中吳記聞、姑蘇志
110	朝雲	不詳	蘇軾/妾	從比丘學佛，識大義，誦金剛經（3）（5）	蘇軾文集
111	李氏	不詳	石君瑜/妻	夫死後日蔬食誦佛書（2）（3）	丹淵集
112	嵇氏	不詳	張嶠/妻	夫婦奉佛，祈佛得子（3）	樂全集
113	馬氏	不詳	張方平/妻	晚通至道、明性理、游心空寂（4）（5）	樂全集、樂城集
114	謝氏	不詳	黃庭堅/繼室	常修禪定而不廢女工（4）	山谷內集外集別集
115	李氏	不詳	某梁太尉/妻	讀釋氏書，深探其理（3）（5）	祠部集
116	王氏	不詳	某楊少卿/妻	達佛理，故死無怛惻（3）（5）	祠部集
117	楊氏	不詳	晁補之/母	修西方淨土（3）	雞肋集、後山詩註

118	王氏	不詳	朱道誠/ 妻	日誦十句觀音心咒 (3)	聞見近錄
119	范氏	不詳	范珣/女	樂禪寂，讀華嚴，參黃龍死心 (3) (4)	羅湖野錄
120	蔣夫人	不詳	蔣念二/ 妻	誦大乘蓮經萬四千遍，斷除嗜欲 (2) (3)	說郛
121	方氏	1069- 1103	趙叔驍/ 妻	喜誦佛書，能行其所 (2) (3)	摛文堂集
122	邵氏	? -1121	詹成老/ 妻	施食惡鬼秘咒 (3)	毘陵集
123	黃氏	1063- 1121	李綱/岳 母	菩薩乘、禪、淨土 (3) (4) (5)	梁溪集

〔附表 3〕

時間 修行實踐	北宋	
	數目	比例
(1) 布施	15/123	0.12
(2) 持戒	22/123	0.18
(3) 精進	103/123	0.84
(4) 禪定	7/123	0.06
(5) 智慧	26/123	0.22

## 引用文獻

### 佛教藏經

- 《大寶積經》。《大正藏》冊 11，第 310 號。（大藏經刊行委員會編，台北：新文豐出版之《大正大藏經》，以下所列《大正藏》皆同）
- 《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大正藏》冊 17，第 842 號。
- 《大佛頂首楞嚴經》。《大正藏》冊 19，第 945 號。
- 《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尼經》。《大正藏》冊 20，第 1060 號。
- 《大智度論》。《大正藏》冊 25，第 1509 號。
- 《樂邦文類》。《大正藏》冊 47，第 1969 號。
- 《龍舒淨土文》。《大正藏》冊 47，第 1970 號。
- 《明覺禪師語錄》。《大正藏》冊 47，第 1996 號。
- 《佛祖統紀》。《大正藏》冊 49，第 2035 號。
- 《佛祖歷代通載》。《大正藏》冊 49，第 2036 號。
- 《釋氏稽古略》。《大正藏》冊 49，第 2037 號。
- 《續傳燈錄》。《大正藏》冊 51，第 2077 號。
- 《建中靖國續燈錄》。《續藏經》冊 136。（大藏經刊行委員會編，台北：新文豐出版社之《續藏經》，以下所列《續藏經》皆同）
- 《嘉泰普燈錄》。《續藏經》冊 137。
- 《禪林僧寶傳》。《續藏經》冊 137。
- 《黃龍晦堂心和尚語錄》。《續藏經》冊 120。
- 《死心悟新禪師語錄》。《續藏經》冊 120。
- 《僧寶正續傳》。《續藏經》冊 137。
- 《羅湖野錄》。《續藏經》冊 142。

### 古籍

- 《八瓊室金石補正》。陸徵祥。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年。
- 《山谷內集、外集、別集》。黃庭堅。台北：商務印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3-1988 年。
- 《山谷詩集注》。〔宋〕任淵等集，黃寶華點校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

- 《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商務印書館。1983-1988年。
- 《文恭集》。胡宿。台北：商務印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3-1988年。
- 《方輿勝覽》。〔宋〕祝穆。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
- 《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0年。
- 《丹淵集》。文同。台北：商務印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3-1988年。
- 《丹陽集》。葛勝仲。台北：商務印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3-1988年。
- 《孔武仲文集》。孔武仲。濟南：齊魯書社。點校本《清江三孔集》。2002年。
- 《王魏公集》。王安禮。台北：商務印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3-1988年。
- 《中吳記聞》。龔明之。台北：商務印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3-1988年。
- 《白氏長慶集》。白居易。台北：商務印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3-1988年。
- 《白蓮集》。齊己。台北：商務印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3-1988年。
- 《安陽集》。韓琦。台北：商務印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3-1988年。
- 《北山小集》。程俱。上海：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續編》本。1936年。
- 《北磻集》。居簡。台北：商務印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3-1988年。
- 《古今圖書集成》。上海：中華書局。1934年。
- 《古靈先生文集》。陳襄。台北：商務印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3-1988年。
- 《玉井樵唱》。尹廷高。台北：商務印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3-1988年。
- 《石林避暑錄話》。葉夢得。京都：中文出版社。《宋元人說部叢書》本。1980年。
- 《四部叢刊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
- 《四部叢刊續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
- 《民國江都縣續志》。桂邦傑等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 《全宋文》。成都：巴蜀書社。1989年。
- 《夷堅志》。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
- 《西塘集耆舊續聞》。陳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 《西溪集》。沈邁。台北：商務印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3-1988年。
- 《西溪叢語》。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93年。
- 《西臺集》。畢仲游。台北：商務印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3-1988年。
- 《宋元人說部叢書》。京都：中文出版社。1980年。

- 《宋史》台北：鼎文書局。1978年。
- 《宋史翼》。台北：鼎文出版社。影印北京中華書局《宋史》附編。1978年。
- 《宋名臣奏議》。趙汝愚。台北：商務印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3-1988年。
- 《宋會要輯稿》。北京：中華書局。1957年。
- 《武夷新集》。楊億。台北：商務印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3-1988年。
- 《武溪集》。余靖。台北：商務印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3-1988年。
- 《長興集》。沈括。上海：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之《沈氏三先生文集》本。1936年。
- 《姑蘇志》。王鏊。台北：商務印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3-1988年。
- 《姑溪居士前集》。李之儀。台北：商務印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3-1988年。
- 《兩浙金石志》。阮元。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本。1995年。
- 《兩宋名賢小集》。陳思。台北：商務印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3-1988年。
- 《河南集》。尹洙。台北：商務印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3-1988年。
- 《忠肅集》。劉摯。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
- 《東京夢華錄外四種》。台北：大立出版社。1980年。
- 《法藏碎金錄》。晁迥。台北：商務印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3-1988年。
- 《金石萃編》。北京：中國書店。1985年。
- 《冠註輔教編》。契嵩。京都：洛陽書堂。1696年。
- 《後山集》。陳師道。台北：商務印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3-1988年。
- 《後山詩註》。陳師道。上海：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初編》本。1936年。
- 《香溪集》。范浚。台北：商務印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3-1988年。
- 《浮溪集》。汪藻。台北：商務印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3-1988年。
- 《華陽集》。王珪。台北：商務印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3-1988年。
- 《冠註輔教編》。京都：洛陽書堂。1696年。
- 《南陽集》。韓維。台北：商務印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3-1988年。
- 《南澗甲乙稿》。韓元吉。台北：商務印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3-1988年。
- 《毘陵集》。張守。台北：商務印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3-1988年。
-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李心傳。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
- 《家世舊聞》。陸游。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

- 《淨德集》。呂陶。台北：新文豐出版社，《叢書集成新編》本。1978年。
- 《浙江通志》。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
- 《袁氏世範》。袁采。台北：商務印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3-1988年。
- 《祠部集》。強至。台北：新文豐出版社。《叢書集成新編》本。1983-1988年。
- 《梁溪集》。李綱。台北：商務印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3-1988年。
- 《陶山集》。陸佃。台北：商務印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3-1988年。
- 《晦菴集》。朱熹。台北：商務印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3-1988年。
- 《范太史集》。范祖禹。台北：商務印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3-1988年。
- 《范文正公集》。范仲淹。台北：行政院文建會編《范仲淹資料彙編》本。1988年。
- 《范忠宣集》。范純仁。台北：商務印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3-1988年。
- 《張耒集》。張耒。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
- 《淮海集》。秦觀。台北：商務印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3-1988年。
- 《清江三孔集》。濟南：齊魯書社。2002年。
- 《斐然集》。胡寅。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
- 《絜齋集》。袁燮。台北：商務印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3-1988年。
- 《摛文堂集》。慕容彥逢。台北：商務印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3-1988年。
- 《都城紀勝》。耐得翁。台北：大立出版社。《東京夢華錄外四種》。1980年。
- 《彭城集》。劉放。台北：商務印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3-1988年。
- 《雲巢編》。沈遼。上海：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之《沈氏三先生文集》本。1936年。
- 《國老談苑》。王君玉。台北：新興書局。《筆記小說大觀》本。1978年。
- 《湘山野錄》。文瑩。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
- 《景文集》。宋祁。台北：新文豐出版社。《叢書集成新編》本。1985年。
- 《無為集》。楊傑。台北：商務印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3-1988年。
- 《筆記小說大觀》。歷代名人等撰。台北：新興書局。1960年。
- 《傳家集》。司馬光。台北：商務印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3-1988年。
- 《道鄉集》。鄒浩。台北：商務印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3-1988年。
- 《鄖溪集》。鄭獬。台北：商務印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3-1988年。
- 《夢梁錄》。吳自牧。台北：大立出版社。《東京夢華錄外四種》。1980年。

- 《增廣箋註簡齋詩集》。胡穉。台北：商務印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3-1988年。
- 《慈溪縣志》。〔清〕楊亨泰。光緒二十五年德潤書院刻本。
- 《葉適集》。葉適。台北：河洛出版社。1974年。
- 《聞見進錄》。王鞏。台北：商務印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3-1988年。
- 《說郛》。陶宗儀。台北：商務印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3-1988年。
- 《廣西通志》。〔清〕金鉷等。台北：商務印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3-1988年。
- 《壽州志》。〔清〕葛蔭南。光緒15年活字本。
- 《漫塘文集》。劉宰。台北：商務印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3-1988年。
- 《歐陽修全集》。台北：河洛出版社。1975年。
- 《演山集》。黃裳。台北：商務印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3-1988年。
- 《萬曆新修南昌府志》。范涑。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0年影印《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本。1588年。
- 《蔡忠惠集》。蔡襄。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 《雞肋集》，晁補之。台北：商務印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3-1988年。
- 《豫章叢書》。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
- 《學易集》。劉跂。台北：商務印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3-1988年。
- 《樂全集》。張方平。台北：商務印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3-1988年。
- 《樂靜集》。李昭玘。台北：商務印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3-1988年。
- 《鄭氏規範》。鄭太和。台北：新文豐出版社。《叢書集成新編》本。1985年。
- 《簡齋集》。陳與義。台北：商務印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3-1988年。
- 《臨川文集》。王安石。台北：商務印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3-1988年。
- 《龍雲集》。劉弇。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豫章叢書》點校本集部3。2004年。
- 《叢書集成新編》。台北：新文豐出版社。1985年。
- 《龜山集》。楊時。台北：商務印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3-1988年。
- 《鴻慶居士集》。孫覿。台北：商務印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3-1988年。
- 《舊五代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
- 《蘇學士集》。蘇舜欽。台北：商務印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3-1988年。
- 《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

- 《蘇魏公文集》。蘇頌。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  
《續資治通鑑長編》。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  
《欒城後集》。蘇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欒城集》。蘇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靈源和尚筆語》。惟清。京都：小川原兵衛刊。序文1244年。

## 中日文專書、論文

- 中研院史語所出版品編委會（1998）。《中國近世家族與社會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中研院史語所。
- 向世山（1995）。〈以「圓覺經變」石刻造像論宋代四川民間佛教的信仰特徵〉。《中華文化論壇》1。頁87-92。
- 朱瑞熙（1998）。〈一個常盛不衰的官僚家族：宋代江陰葛氏家族初探〉。《中國近世家族與社會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中研院史語所出版品編委會。頁111-137。
- 行政院文建會編（1988）。《范仲淹研究資料彙編》。台北：行政院文建會。
- 昌彼得、王德毅等編（1976）。《宋人傳記資料索引》。台北：鼎文書局。
- 陶晉生（2001）。《北宋士族家族、婚姻、生活》。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 童瑋（1991）。《北宋開寶大藏經雕印考釋及目錄還原》。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
- 黃啟方（2005）。《黃庭堅研究論集》。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
- 黃啟方（2002）。《東坡的心靈世界》。台北：學生書局。
- 黃啟江（1997）。《北宋佛教史論稿》。台北：商務印書館。
- 黃啟江（2006-2007）。〈論宋代士人的手寫佛經〉（上）（下）。《九州學林》14、15。頁60-102、36-83。
- 鄧小南（1998）。〈龔明之與宋代蘇州的龔氏家族〉。《中國近世家族與社會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中研院史語所出版品編委會。頁81-109。
- 鄭永曉（1997）。《黃庭堅年譜新編》。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衢州市文管會（1983）。〈浙江衢州市南宋墓出土器物〉。《考古》。浙江：衢州市文管會。

## 西文專書、論文

- Chung, Priscilla Ching. 1981. *Palace Women in the Northern Sung*. Leiden: E.J. Brill.

- Ebrey, Patricia. 1993. *The Inner Quarters: Marriage and the Lives of Chinese Women in the Sung Period*. Berkeley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Gregory, Peter, edited. 1999. *Buddhism in the Sung*.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Hymes, Robert. 1997. "Review of *The Inner Quarters: Marriage and the Lives of Chinese Women in the Sung Period*,"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57, no. 1 (June), pp. 229-261.
- Ko, Dorothy. 1994. *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s Women and Culture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Ko, Dorothy. 2005. *Cinderella's Sisters : A Revisionist History of Footbinding*.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Mann, Susan and Ann Waltner. 1996. "Recent Scholarship on Chinese Women." In *Sign* (Winter), pp. 410-428.
- Mann, Susan. 1997. *Precious Records: Women in China's Long Eighteenth Centur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Teng, Jinhua Emma. 1996.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Women' in the Western Academy: A Critical Review." In *Signs*, vol. 22, no.1 (autumn), pp. 115-151.
- Yu, Chün-fang. 2001. *Kuan-yin: the Chinese Transformation of Avalokiteśvar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Rethinking Women's Piety towards Buddhism: The Case of Song Elite Families, Part I**

Chi-chiang Huang

Professor

Hobart and William Smith Colleges

### **Abstract**

This is the first part of my article on women's piety towards Buddhism in Song times, a topic barely touched upon until recently. In this portion of my article, I first discuss the "Pious Wives" section of Patricia Ebrey's widely circulated book, *The Inner Quarters: Marriage and the Lives of Chinese Women in the Sung Period*, in hopes of clarifying and modifying some of the major points discussed in the section.

As these points represent Ebrey's pioneering, albeit cursory, discussion of pious wives in Western language, they have already shaped a general image of Song women, particularly women of elite families, and of what they did to show their piety towards Buddhism. A close scrutiny of them results in the finding of some errors arisen from the misreading of original texts and the limited and imbalanced citation of sources. In this article, I outline the twenty examples of Song women's piety that Ebrey randomly selects from numerous commemorative texts produced in the Song. I point out the insufficiency of these examples and delineate why and how Song elite family women actually practiced Buddhism. I cite 123 commemorative texts to supplement the sixteen examples that Ebrey uses for her discussion, address the extent to which women dedicated themselves to Buddhism, and argue the existence of diverse practices of Buddhism among women in the Northern Song—an important fact that is unheeded in Ebrey's "Pious Wives" section. I also contextualize their religious orientation by looking into religious practices of their natal and spousal families, which Ebrey fails to take note of even though she is supposed to, given "marriage and the lives of women" being the very purpose of her book. My discussion and analysis is built upon the framework of five of the "Six *Paramitas* or Six Perfections, i.e., *bushi* (giving; *dāna*), *chijie* (morality; *śīla*), *jingjin* (vigor; *virya*), *chanding* (meditation; *dhyāna*) and *zhibui* (wisdom; *prajñā*), which constitute what is known as "the Bodhisattva ideal." The *renru* (patience; *kṣānti*) *paramita* is

set aside with special note because the effort is not exclusively Buddhist but is inherently Confucian and Taoist. This classification leads to the following findings, which take into account some individuals' embodiment of more than single perfection: of the 123 Northern Song women, 12% were involved in *bushi*, 18% in *chijie*, 84% in *jingjin*, 6% in *chanding*, and 22% demonstrated *zhibui*. While this quantitative schema may not accurately represent the variegated colors of Northern Song women's devotions to Buddhism, it helps to reveal the different levels of religious piety demonstrated by the middle-and upper-class women who were portrayed as pious. On the other hand, my discussion supported by ample evidence further confirms the significant amount of religious autonomy that women from elite families of the Northern Song were able to enjoy, amidst the daunting household chores they took upon themselves to perform.

**Keywords:** Song women; piety; Buddhism; "Pious Wives"; Six Paramitas; religious autonomy